



盛世华诞

1949-2025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6周年

福州党校学报

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FUZHOU

主管单位 中共福州市委

主办单位 中共福州市委党校

编辑委员会

主任：童桂荣

常务副主任：陈 浩

副主任：戴 鸿

编委：李永杰 刘兴旺 魏少辉 丁 飞

吴碧英 张曙婷 林淑周 欧 敏

赵咏梅 钟 诚 曹敏华

主 编：陈 浩

副主编：林淑周

编 辑：丁春华 兰丰丰 陈琴容 郑梅钦 魏璐珂

福州党校学报

双月刊

2025年第5期(总第216期)

· 目次 ·

主管单位:

中共福州市委

主办单位:

中共福州市委党校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674-107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5-1204/C

发行范围:

公开发行人

出版日期:

2025年10月20日

国内定价:

10.00元

印刷单位:

福建东印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新时代新思想研究

5 文化主体性的生成逻辑

杨煌

14 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互动逻辑

龙海平 易慧

党的建设研究

23 党的领导对法治建设的引领作用

赵咏梅

31 历史分期理论视域下中共党史的文明叙事转型
——基于三个历史决议的文本比较分析

张建彬

41 中国共产党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历程、成就与启示

段炼 韩平

50 自媒体时代党员舆论引导力的功能定位与提升路径

郭倩倩

版 权 声 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 (CNKI) 期刊数据库, 维普、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支付的稿酬已含著作权使用费, 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作者不同意网络传播, 请在投稿时声明, 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治理研究

57 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社会治理的四重向度

曹刚川 聂兴旺

67 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探索与启示

吴雨星

75 地缘聚合与党建赋能: 外来务工流动党员管理的“同乡村”模式创新
——基于深圳市罗湖区的实践探索

甘坤玲

干部教育研究

85 心理学视域下党校党性教育的创新路径探析

范玲霞

90 网络培训赋能县级党校抓实基本培训的逻辑、不足与提升路径

张华清

编辑出版:

《福州党校学报》

编辑部

主 编: 陈 浩

副主编: 林淑周

地 址:

福建省福州市

福马路 990 号

邮 编:

350014

电 话:

0591-88199355

电子邮箱:

fzdxxb@163.com

网 址:

<http://fzswdx.gov.cn>

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FUZHOU

The Main Contents

NO.5, 2025

General NO.216

- 05 The Logic of 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Subjectivity
Yang Huang
- 14 On the Interactive Logic between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and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Long Haiping, Yi Hui
- 23 The Leading Role of Party Leadership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Zhao Yongmei
- 31 A Study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vilization Narrativ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Periodization—Based on a Textual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hree Historical Resolutions
Zhang Jianbin
- 41 The Process, Achievements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Summarizing and Applying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Duan Lian, Han Ping
- 50 Functional positioning and improvement path of Party members'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in the era of self media
Guo Qianqian
- 57 Four Dimensions of Social Governance Led by Xi Jinping's Thought on Culture
Cao Gangchuan, Nie Xingwang
- 67 Xi Jinping's Explorations and Revelations on the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evolutionary Old Areas during His Tenure in Fujian
Wu Yuxing
- 75 Geopolitical Aggregation and Party Building Empowerment: Innovation of the "Hometown-Village" Model for the Management of Migrant Party Members from Other Regions — Based on Practical Exploration in Luohu District, Shenzhen
Gan Kunling
- 85 Exploring the Innovative Path of Party Spirit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y
Fan Lingxia
- 90 The Logic, Deficiencies and Improvement Paths of Online Training on Empowering County Party Schools to Strengthen Basic Training
Zhang Huaqing

文化主体性的生成逻辑

杨 煌

(求是杂志社宣传联络部, 北京 100010)

摘要: “文化主体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标识性概念。其既是一个政治性概念, 也是一个具有深刻哲理性、严谨学术性的范畴。准确理解这一重要概念, 需要将其放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中, 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文化生命体”概念, 从文化发生学、中华文化本质特征和中外文化比较中予以阐释和把握。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文化主体性; 文化生命体

中图分类号: G122; D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072(2025)05-005-9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2023年6月2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了“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概念并进行了系统阐释。文化主体性的提出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文化发展规律及文化社会作用的深刻认识。完整把握、准确理解、系统巩固文化主体性, 有利于我们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主题与使命, 以坚定的文化自觉、宏阔的历史视野、深远的战略考量对为什么要树立文化主体性、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是怎样树立的、什么是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如何巩固文化主体性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的思考, 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这既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和创新, 也是新时代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指导和根本遵循。

文化主体性既是一个政治性的概念, 也是一个哲理性、学术性很强的范畴, 需要着力梳理清楚。近来学界围绕“何谓文化主体性”“为何要巩固文化主体性”“何以巩固文化主体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总结一下, 还有一些关键性问题需要深入辨析和考察: 其一, 关于对文化的理解。现在一些研究就文化谈文化, 把对文化理解的学理根基放在西方某些理论之上, 甚至陷入文化决定论的泥沼。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 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角和基础, 对于文化、传统文化就不能正确把握。这是理解文化主体性的基本理论前提和理论基础。其二, 文化主体性的概念需要进一步理清。当前研究对于文化主体性概念往往是从主客体二分的角度来理解阐释, 只有突破西方哲学主客二分的固定模式, 才能真正理解文化主体性问题。其三, 对于文化主体性层次理解单一, 没有挖掘出其深刻的内涵, 没有看到文化主体性是一个具有丰富层次性的概念。其四, 关于文化主体性与

作者简介: 杨 煌, 求是杂志社宣传联络部主任, 研究方向: 科学社会主义、国外社会主义流派、党的建设。

文化生命体的关系。文化生命体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要概念，文化主体性生成和扎根于文化生命体中。当前研究对于文化主体性生成于何种文化以及何种文化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问题尚未达成共识。只有正确认识文化生命体的有机构成和性质，把文化主体性与文化生命体结合起来进行理解和研究，才能正确认识文化主体性的内在依据和发展方向。这些问题是我们进一步着力研究的重点。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化和主体问题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要深入理解和把握文化主体性问题，必须把握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主体问题的基本观点及其对传统文化和观念的基本观点和认识，这是我们正确认识文化主体性的根本思想资源。

认识文化主体性，必须首先了解什么是文化？文化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近代以来文化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仅对于文化的定义和理解就有数百种之多。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就要求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角度理解文化。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和发展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对文化的本质、产生根源、社会功能、发展趋势等问题展开了深刻论述，揭示了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一般来讲，文化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人类创造的包括物质、精神等在内的一切文明成果；狭义的文化则特指精神文化。无论广义狭义，文化都与人息息相关，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

文化具有“人化与化人相统一”的本质属性。从文化的地位和功能看，文化是从属性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作为上层建筑，最终由生产方式决定。对于文化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

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1]这阐明了文化的根源和表现形式。

那么文化的地位呢？“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59]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化建立在物质生活关系之上，是对现实物质生活关系的反映。从文化的作用看，文化又有相对独立性，并非完全被动地受经济基础决定，它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能动性，可以对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先进的文化能促进社会发展，落后的文化则可能阻碍社会进步。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3]恩格斯在给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也写道：“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4]当今世界，文化作为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而文化自信则是“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这是文化反作用力的集中体现。

就人与文化的关系而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化的本质在于实践，人的实践是文化产生的根源，文化是人的实践的必然结果。从文化的存在形态看，作为历史的长期积淀，文化一经形成就极具稳定性，这种稳定性就个体而言体现为人的信仰信念、价值追求、道德观念等，它们不会随着外部环境变化而轻易改变；就群体而言，一定的文化模式会主导一个民族几百甚至上千年的发展，纵然王朝更替、时代变迁，在一定文化模式下形成的思维方式及行为习惯却仍然持久地发挥作用。

从文化的性质看，文化具有阶级性。文化由人生产，而人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表现为阶级的人。“任何一个时代的

统治思想始终都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2]⁵³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时，就已深刻地阐明了思想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及其阶级属性问题，阐述了“统治阶级的思想”何以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例如，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这样指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由人所创造的法律政治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哲学和宗教等文化形式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阶级利益、感情和思想。纵然作为个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超越阶级利益，甚至超越时空限制而创造出具有恒久价值的文化作品，但人类文化作为社会的产物则总是或深或浅地打上了阶级的烙印。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于文化做出了深刻的界定，他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5]这一文化定义充分考虑到人的社会性和实践性，揭示了文化和经济、政治的关系，既避免了单纯从人与文化的关系来解释文化的唯心主义论证思路，又避免了“根据文化自身来解释文化”^[6]的神秘主义论证思路。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上就整体而言往往为少数精英所垄断，诚如毛泽东所说的：“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7]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则彻底打破了以往人民群众与文化相互疏离的状态，从根本上改变了新中国文化的立场和旨趣。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实践中，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共产党人不仅科学地揭示了

文化本身的价值功能和地位坐标，更为重要的是明确提出文化必须为人民群众所掌握，要通过文化来唤醒个体的自我主体性和革命意识。这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的人民立场。人民群众是文化的生产者和享有者，如果离开人民群众的土壤，文化必然会失去生命力。

二、主体、主体性、文化主体性

主体性问题是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在哲学的一般理解中，只有人才构成主体，在人与万物的关系中，人是作为主体而存在的。从人是主体的事实出发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就是哲学所关注的人的主体性问题。根据《辞海》释义，作为哲学范畴的主体性是指“人在主体与客体关系中的地位、能力、作用和性质，其核心是人的能动性”^[8]。可见，主体性作为一个关系范畴，是主体相对于客体而形成的一种意识，指的是人在实践活动中与对象性客体形成的关系、地位、作用和影响的性质，也就是主体通过对象性实践活动主动把握客体的一种特性。

国内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主体性问题展开了持续争论，逐渐形成基本共识，主要是将主体性理解为主体所具有的某种属性，强调要在主体与客体或主体与主体的关系中理解主体和主体性的内涵。具体而言，一是主体一般意义上是指“人”，二是般要有主体的对应者存在，三是主体性往往在主体与客体或另外主体的相互作用中生成，主体性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进而实现双向发展的特性。

就文化主体性而言，文化是主体还是客体？作为人的活动的产物，文化无疑是客体，那么客体如何拥有主体性呢？把主体和客体对立起来，是西方哲学的一般思维方式，所以一些人理解文化主体性就直接归为人的主体性、民族的主体性，这样往往会造成理解的混乱和困惑。对于文化主体性的理解既要考察历史的来龙去脉，又要从文本的具体语境

中确定具体的含义。

知所从来，方明所往；立乎其大，小者弗夺。关于文化主体性问题的讨论，国内学界往往认为肇始于费孝通提出的“文化自觉”概念。1997年，费孝通在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首次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详细阐释，一度受到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并由此引发了对文化主体性的讨论。费孝通“文化自觉”的概念所回应的是作为一个文化主体的民族面对现代化的潮流，其文化从何而来、当下如何、向何处去的追问。有国内学者将其总结为“费孝通问题”，即怎样找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接榫之处和契合之点、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富有张力的平衡并最终迈向一个美好社会。

2004年，费孝通在“北京论坛”的发言中进一步提出：“‘文化自觉’的含义应该包括了对自身文明和他人文明的反思。”^[9]由此，通过文化自觉开启把握文化主体性的双重向度：从历时性的时间维度来看，文化自觉意味着文化主体需要具备“自知之明”；而从共时性的空间维度来看，文化自觉意味着文化主体需要具备“知人之明”。基于对文化“自我”的“自知之明”和对文化“他者”的“知人之明”，一个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才能在现代化进程中构筑起来。这些认识对于我们理解文化主体性提供了方法论和思路的指引。

三、文化主体性与文化生命体

文化主体性的概念兼具学理深度与政治高度，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自觉意识和进行文化创新创造的主动精神。要正确理解这一概念，一定要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另外一个重要概念“文化生命体”，所谓文化主体性，就是从这一“生命体”中产生的“主体性”。那么，如何理解这一“文化生命体”就显得尤为重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

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10]。“文化生命体”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和标识性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成果形态，是中华文明在文化交流互鉴中不断自我革新和超越所塑造的“新生命有机体”。马克思主义是其“魂脉”，马克思主义为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提供了思想指导、价值指引和行动指南，赋予其科学理念和实践智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其“根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新的文化生命体形成发展的根源和血脉，其蕴含的社会理想、治理思想、家国情怀等智慧精华，形塑了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性，为新的文化生命体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和丰厚文化滋养。新的文化生命体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并赋予优秀传统文化以新的内涵、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同时，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构成还包括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伟大斗争中构建的文化，是新的文化生命体不可动摇的基石。它承载着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宝贵精神财富，如红船精神、长征精神等，这些精神是新的文化生命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激励着中国人民不断前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代表着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前进方向和发展要求。它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联结着中华文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形成了支撑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有机结构。这一“文化生命体”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就时代性而言，即是中华文化的当代形态；从实践结果而言，即是中国式现代化形成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从性质而言，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

可以说，这一“文化生命体”既是中华文明延续的“活的载体”，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形态”，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生动实践”，在历史与现实、民族与世界、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成长，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

新的文化生命体既扎根历史传统，又回应时代需求，还面向人类未来，呈现出多维度、深层次的鲜明特征。一是具有根脉魂脉融合的统一性。它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基因，确保文化生命体的民族根基与历史连续性；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赋予文化生命体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导向，为其提供思想引领和发展方向。二是具有古今贯通的传承性。联结中华文明的“过去—现在—未来”，既是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整合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实践成果，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国式现代化伟大进程的文化结晶。三是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性。立足中国实际，敏锐捕捉时代特征，回应时代需求，吸收融合现代文明成果，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内涵；始终与国家发展、民族进步同频共振，与世界潮流并肩而行。四是具有人民主体的实践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既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受益者。坚持文化的实践品格，通过融入社会治理、日常生活、教育传播等具体场景让文化从精神形态转化为人们的行为自觉，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现实力量。五是具有宽广的包容性。对内整合多元文化形态，对外吸收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以开放姿态对待世界各国文化，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六是具有生生不息的创造性。具有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通过“两个结合”的持续深化，不断破解文化发展中的新问题，催生新的文化形态、文化产品和文化实践，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创新潜能。七是具有价值引领的先进性。这一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代表着时代发展的方向，马克思主义

是这一文化的“魂脉”，呈现理论的先进性，在多元文化并存的当代社会，通过核心价值的引领，整合不同群体的思想观念，为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纽带和文化凝聚力。

文化生命体的提出，使我们能够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更深刻的体验来洞察历史发展脉络，实现了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自我与世界在文化生命体中的有机衔接，真正让文化主体性建立在深厚的中华文明“肌体”之上，把握住了生机勃勃的时代脉搏。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新的文化生命体”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现代文明成果，是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这一“新的文化生命体”是源于历史、立足现在和面向未来的生命有机体，是充满生机活力的活泼泼的生命体，从这一角度，作为拟人化的“文化生命体”，显然赋予了文化以人格和意志，文化具有主体性也就理所当然了。一个民族在长期发展中形成文化生命体，这个文化生命体的主体性就是文化的“自我意识”，标明自我的鲜明特征，解决了“我是谁”的问题。当然，这只是理解文化主体性的一个角度和一个方面，其丰富性还有待从不同角度和方面去阐明和理解。

四、文化作为一个有机体

要更深刻理解“文化生命体”这一概念，可以参考《西方的没落》一书的作者斯宾格勒有关文化有机体的论述。在斯宾格勒看来：文化是一种有机体，“世界历史的本质是文化有机体的生死循环”^[1]。把文化看作一个有机体，包含两层意思：第一，每一个文化都是由各个部分有机联系起来的整体；第二，每一个文化都是一个包含着从出生到成长、从衰老到死亡的有机生成过程。如同人体是由神经系统、消化系统、血液循环系统等组合而成的一个有机整体一样，文化有机体也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文化的心灵或精神正是通过各个部分的共同作用来实现或完成自身的，同时也体现于各个部分之

中。因此，文化的各个部分的性质、状态及发展水平与文化整体的性质、状态及发展水平是一致的。一定的艺术形式，总是与一定时代或文化的一定发展阶段的政治、经济、宗教、科学等方面的状况相关联的。因而，对各种文化现象的考察，就不能只抓住其表面的特征，不能将其视作孤立的因素，使其与有机体的整体割裂开来，而是应当在整体中、在与其他部门或领域的通观中，来显示其本质，来揭示这一文化有机体的“形态学关系”。

斯宾格勒把文化看作一个有机体，认为文化有机体是在各自独特的环境或景观中形成和生长起来的，并按照自身独特的节奏走向成熟和完成。他指出不同文化之间即便会发生影响，但各文化本有的精神是不会因此而改变的；文化之间的影响与传播，实际取决于接受者的主体选择和改造，取决于主体文化自身的性质和特性。这实际上就是文化主体性的深层体现。一是其具有独特性与不可替代性。斯宾格勒认为，每种文化如同一个独立的有机体，拥有自身独特的“原始象征”。它决定了文化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创造力，使其与其他文化形成本质区别。例如，中国文化中蕴含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理念。二是这种深层的精神特质也体现为稳定性与连续性。文化不会因外部冲击（如战争、文化交流）而根本改变。即使文化在形式上吸收外来元素，其核心精神仍保持自身特质。斯宾格勒以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的差异为例：中国佛教虽借鉴了印度佛教的表象，但其内核始终与中华文化的伦理观、宇宙观相融合，形成了仅对中国文化有意义的新形态。三是这种深层精神特质与文化有机体具有共生性。它是文化有机体的“心灵”，贯穿于从诞生、成长到成熟的整个生命周期。它通过文化的各个部分（如政治、艺术、宗教）得以体现，并赋予文化整体一致性。

斯宾格勒的“文化有机体”理论，将文化视为一个有着生长期和衰亡期的有机活体，服从的是大

宇宙运动的周期性的命运或生命循环的节律。如同个体的人要经历其生命的各个阶段一样，每一个文化也都有其孩提、青年、壮年与老年时期。斯宾格勒还以大自然春、夏、秋、冬的大循环为意象描绘了这幅奇妙的文化发展的图象。斯宾格勒将文化有机体类比为生物生命周期，仅仅做一个简单的类比，按有机体的特性理解文化，缺乏对文化本身深入的挖掘，对文化自身的特性总结概括不足，带有机械论色彩，忽视了文化通过自我革新实现永续发展的可能性。

五、文化主体性的多层次内涵

文化主体性作为一个有丰富内涵的概念，还应该从不同的维度深入理解和把握。

（一）文化主体性是人类历史实践的产物

文化是人的创造，属人性是文化最鲜明的特性和最高原则。文化蕴含着人类的思想智慧、价值追求，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根基。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彻底清算了以往一切唯心的、旧唯物主义的文化观念，认为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生产决定于社会生产，并将主体性视作人动态的、实践的自我生成，认为决定社会历史前进发展的是广大“行动着的群众”，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文化活动的真正主体。人民群众是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文化的价值主体。文化主体性来源于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的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根植于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和文化实践，凝结了人民群众的实践智慧。文化主体性归根到底是人的主体性的重要体现，而人的主体性的凸显必然要通过文化来启蒙和滋养。可以说，没有人的文化觉醒，文化主体性就无从谈起。

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民族历史实践的结果。中华文化主体性形成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漫长历史中。在黄河流域中下游、长江流域中下游、辽西地区发现有大量新石器遗址。中原地区的华夏文

明蓬勃发展，华夏部族在与其他部族交往的过程中实现文明的交流融合，形成了夏商周时期的早期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是逐渐成型和发展的，特别是经过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之后，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进一步提升，形成了中华文化的文化母体。这一文化母体与统一的秦汉帝国政权相结合，使中华文化主体性得以牢固确立，并且在以后漫长的历史中一直延续发展。中华文化主体性深深扎根于数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建构。从炎黄传说开启历史篇章，到尧舜时代在华夏大地创造早期文明，从周孔之教的人文传统到汉唐之际的国家治理，从宋明程朱理学到陆王心学的兴盛，再到明清中西文化的碰撞，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基因。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相互成就、相互塑造，中华文明既是中华民族创造的结晶，也是塑造中华民族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作为当代中华民族的领导力量，开创了社会主义新文化，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形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铸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主体性，这一主体性最为有力地体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最为有力地体现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

（二）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民族主体性的文化表征

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身具有的与其他文化相区别的特性、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12]也就是说，文化主体性彰显“文化自我”的确定性，体现鲜明文化特质和独特价值体系，凸显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自觉意识和自信程度。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独特性是文化主体性的内在根据，文化主体性主要表现为对自身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精神信仰等的坚持与发展，是文化传承发展的自觉性、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的有机统一。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

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12]中华文明以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性，形成了区别于其他文明的独特禀赋和突出优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思想文化，记载了中华民族在长期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这集中体现在中华民族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中。这些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纵览历史，这种文化基因具有稳定性、传承性与发展性，在中华文明中不断演进和自我修复。

今天，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扎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从传统文化资源宝库中吮吸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养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注入新的文化样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先进思想成果，体现了中华文化发展的现实路径，是从历史中走来、不断赓续发展的文化新样态。

（三）文化主体性是在同外来文化交往交流中体现出的独特文化表征

有比较才有鉴别。文化主体性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民族精神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本条件，是一个国家中的民众相互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也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能够形成世界影响力的根本前提，还是一个国家在世界文化的大花园中

绽放自身文化特色的核心要素。因此，文化主体性既包括对自己文化来龙去脉的文化根脉意识，也包括知己知彼的文化反思意识。我们不仅要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有一个深入全面的认知，还要敢于“睁眼看世界”，了解其他文明。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意识一直非常强烈，在全世界不同文明中，中华文明表现出显著的历史文化意识。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到“天下”观念，表明中华文化在历史比对中国确立起自身的文化主体性。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表达了中华民族文化反思意识背后的开阔胸襟。

从文化哲学视角来看，主体性原则作为现代哲学的基本精神，是解读人类发展史的一把钥匙。“主体”作为一种关系范畴，在与“客体”的对象性关系中彰显出自身的能动性和自主性，是认识和改造对象世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西方哲学中的主体性概念经历了从理性高扬到理性迷失再到理性重塑的曲折演进历程——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确立思维的绝对地位，到康德“人为自然立法”高扬理性的大旗，再到现代性困境中主体性的异化与迷失，最终走向当代哲学对主体性的重新审视与文化重构。这一哲学历程揭示了一个核心命题：文化主体性是人作为文化存在的本质属性。因此，文化主体性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文化层面的自觉意识和自主形态，是其文化身份认同和精神独立性的集中体现。

从哲学视角看，文化主体性首先是一个实践范畴，彰显出作为主体的人在实践中的独立性、主动性和能动性，体现为主体改造客观世界的主动意识和能力提升。其次，文化主体性也是一个认识论范畴，体现着主体对自身存在状态、自身价值、自身未来发展的自觉认知。再次，文化主体性更是一个价值范畴，展现了主体存在的价值以及对自身价值的自觉追求。这种三位一体的理论定位使文化主体性超越了简单的文化自信概念，成为一种深层的、

结构性的文化存在方式。

在中华文化的语境中，文化主体性具有特殊的意义和地位。它既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积淀形成的独特精神标识，也是当代中国在面对全球文化激荡时保持精神独立性的思想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12]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文化主体性对于一种文化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性意义。没有文化主体性，文化就会失去内在凝聚力与外在影响力，难以在多元文化竞争中保持自身的独特性和生命力。

六、文化主体性的内在特性

一个人，有了坚定的主体性，有了坚定的自我意识，才能自信自立自强。一个民族，有了文化主体性，有了文化意义上的坚定的自我，才能拥有文化自信，才能自立自强。文化主体性是国家和民族在文化发展进程中的自觉意识、自主立场和独立创造，是自觉性、自主性和创造性的有机统一。

（一）自觉性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文化自觉，一个民族将成为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的精神流浪者，成为自我与他者区隔中的游移不定者。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自觉是“自知之明”，是对自身文化的清醒认知和坚守，是文化自信的基础，是树立文化主体性的前提。

费孝通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一直在追寻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民族文化的自觉性。他把文化自觉概括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各美其美：就是认识并珍视自身文化的独特价值，理解自身文化在历史脉络中的意义，不妄自菲薄；美人之美：就是尊重并欣赏其他文化的多样性，以开放心态看待不同文化的优长，不盲目自大；美美与共：就是在平等对话中实现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形成多元共生的文化格局；天下大同：

最终实现人类文化的共同繁荣，超越文化上的隔阂与冲突。

费孝通强调“文化自觉”“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3]文化自觉，不仅是文化自信的基础，也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动力，还是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撑。在今天的全球化形势下，文化自觉，也是抵御文化迷失，化解文化冲突，坚守自身文化根基的力量。

（二）自主性

自主性，即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也是我们党百年奋斗积累的宝贵经验。文化自主性是指一个国家、民族在文化领域拥有自我主导权，能够自主选择文化发展方向、守护文化核心价值、掌控文化发展节奏；并在与外部文化互动中保持主体性，避免“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主义”，避免被异质文化强制同化或支配。文化的“自我定义权”与“自主发展权”是自主性的核心，是文化生存、发展与繁荣的前提条件。文化自主性不是对外部世界文化的拒绝，而是在开放中保持主导、在变革中坚守自我。文化自主性是在全球化浪潮中为自身文化锚定“根”与“魂”，既能从容吸纳人类文明成果，又不迷失自身方向，最终实现文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对于后发展国家而言，文化自主性更是摆脱文化依附、实现民族复兴的精神基石。

（三）创造性

文化主体性既是一种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也是一种实践力量和发展力量。创造性是文化主体性的应有之义，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根本途径。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的创造性源于人类实践活动的需求。当生产方式、社会关系发生变革时，旧有文化

形态会“滞后”，而实践中的新问题会催生新的文化表达。因此，文化创造本质上是实践基础上的自我更新。在当今快速变革的时代，一种文化能否持续繁荣，最终取决于其创造新意义、新形式、新价值的的能力。一定的传统文化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的烙印，具有一定的社会制度的属性和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这就需要我们辩证地历史地看待传统文化，明辨良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根据人民需要、社会发展和时代要求来创造性地使传统的文化转化为现代的文化，创新性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51.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0.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462.
- [5]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3.
- [6] 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5：606.
- [7]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9.
- [8] 辞海：第7版[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20：3143.
- [9] 费孝通论文化自觉[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262.
- [10] 习近平.加快建设文化强国[J].求是，2025(08)：4-8.
- [11]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M].吴琼，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5.
- [12]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J]，2023(17)：4-11.
- [13] 费孝通.文化的生与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491.

责任编辑：丁春华

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互动逻辑

龙海平 易 慧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西桂林 541200)

摘要: 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关键议题,二者相互作用、协同推进,共同构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驱动力。全面深化改革从理论、历史、实践三重逻辑层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大动力。在制度保障维度,全面深化改革以制度创新填补空白、以机制优化解决发展难题、以制度强化应对重大风险挑战,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制度根基。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使命,体现在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明确改革方向,以其为指引锚定改革路径,以落实其具体任务为遵循,通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高质量发展等实践路径,确保全面深化改革与现代化建设同频共振。

关键词: 全面深化改革; 中国式现代化; 历史经验; 现实考察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072(2025)05-014-9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中,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是推动国家发展的核心命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策,所取得的实践成就有力证实了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以来,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改革持续深入,更加重视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为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动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科学谋划了围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部署。同时,中国式现

代化作为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全新道路,其独特的发展理念和实践需求,又对改革的深化方向与路径提出更高要求。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剖析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互动逻辑,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升华,也是应对现实挑战、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

一、全面深化改革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动力

中国式现代化动力是一个由内源驱动型动力、效能驱动型动力和价值驱动型动力构成的多元的、复杂的动力系统,在这一动力系统中,改革占有重要地位、发挥重要作用。^[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

基金项目: 2025年广西区级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课题:基于“阅读经典+案例分析”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课程改革研究与实践(JGY202514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龙海平,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易 慧,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破解发展中面临的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除了深化改革开放，别无他途。”^[2]无论是从理论逻辑，还是历史逻辑，亦或是实践逻辑，都深刻论证了全面深化改革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动力这一观点。

（一）从理论逻辑看，不断用创新理论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从毛泽东思想指引“四个现代化”，到邓小平理论指引“中国式的现代化”，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中国式现代化”，三个“指引”为新时代的改革攻坚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也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路径指明了方向。

1. 毛泽东思想指引“四个现代化”。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为我国“四个现代化”的推进提供了关键指引。^[3]“四个现代化”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宏伟战略目标。

在工业现代化方面，毛泽东思想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通过合理规划工业布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举措，为工业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毛泽东思想倡导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这有助于整合资源、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及农产品供应稳定。此外，重视农业科技进步，推动农业机械化和水利设施建设，促进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与生产力的提升。于国防现代化而言，毛泽东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国防建设思想。强调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注重国防科技自主创新，发展现代化国防装备，打造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国防力量，以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在科学技术现代化上，毛泽东同志深刻认识到科技是推动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动力。积极倡导“向科学进军”，鼓励科研工作者开展创新性研究，培养科技人才，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为各领域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2. 邓小平理论指引“中国式的现代化”。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党开辟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战略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即“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4]邓小平理论对“以什么样的中国式的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怎样以中国式的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问题予以了科学回答，进行了科学指引。^[5]

其一，邓小平理论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内涵，明确了其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联系。邓小平强调，中国式的现代化不是追求西方那种高消费的现代化，而是要实现“小康之家”，即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一概念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又符合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邓小平还明确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目标，即到二十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一目标的确立，为中国式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二，邓小平理论系统提出了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战略策略，为中国式的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行动指南。在经济上，邓小平理论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在工业领域，国有企业的改革逐步展开，企业自主经营权的扩大使其更具活力和竞争力，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现代化进程。邓小平理论所倡导的对外开放政策为中国式的现代化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通过设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等举措，中国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这不仅吸引了大量外资，促进了贸易往来，还引进了国外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人才，使中国能够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提升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竞争力，加速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的时代精华，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全方位、深层次的科学指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清晰界定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规划了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这一战略方向为中国式现代化绘制了宏伟蓝图，明确了不同阶段的目标任务。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再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每个阶段都紧密衔接，环环相扣。这一战略规划使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具有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增强了全国人民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和决心。

（二）从历史逻辑看，改革持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经济凋敝的困境，党和国家汲取历史上重视农业基础地位的智慧，开展土地改革，彻底废除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农民获得土地所有权，极大激发农业生产积极性，为农业发展及国家工业化奠基。随后实施“一五”计划，优先发展重工业，初步搭建起我国工业体系框架。在科技领域，传承古代中国在科技攻坚中展现的团结协作精神，举国之力研制“两弹一星”，为科技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此阶段探索虽历经波折，但构建起独立且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

改革开放时期，改革的浪潮从农村扩大到城市，从沿海扩展至内地。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举措汲取了中国历史上多次土地制度变革中激发农民生产活力的智慧，粮食产量显著增长，解决数亿人口温饱问题，为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提供坚实支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聚焦增强企业

活力，国有企业改革逐步深化，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促使国有企业适应市场经济环境，重焕生机。经济特区的设立借鉴了历史上开放口岸促进经济交流的经验，深圳从边陲渔村崛起为国际化大都市，彰显开放的巨大力量。此时期通过渐进式改革路径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为全面深化改革积累雄厚物质基础与丰富实践经验，是对历史上经济发展因时制宜调整体制机制的深刻践行。

进入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经济领域，汲取历史上产业结构调整以适应经济发展需求的智慧，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举措优化经济结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领域，传承古代中国重视学术研究与技术应用结合的传统，加大对基础研究投入，鼓励企业成为创新主体，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创新体系。“天问一号”开启火星探测征程、“嫦娥五号”实现地外天体采样返回、5G技术广泛应用等重大科技成果频现，彰显我国科技实力的跨越式发展，为产业现代化注入核心驱动力。教育领域，汲取历史上教育公平理念与人才选拔制度变革的经验，教育改革致力于促进教育公平与提升教育质量，从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到新高考改革破除“一考定终身”模式，着力培养适应时代需求的创新型人才。中国式现代化在改革中开启、开创，又伴随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不断丰富和拓展着新的内涵。

（三）从实践逻辑看，改革化解社会矛盾激活中国式现代化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人民群众携手共进、众志成城，共同书写了中国发展的壮丽篇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来解决。”^[6]我国正是通过改

革的方式，化解社会中的许多矛盾，激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活力。^[7]

首先，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突出矛盾。党的十九大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作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政治论断。同时，社会主要矛盾贯穿发展全局，在经济、社会、生态等具体领域，衍生产出产业结构失衡、区域发展差异、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多元矛盾形态，这些矛盾在实践层面集中体现为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难点。社会主要矛盾为改革划定了核心攻坚区域，明确了需要着力破解的问题与障碍，而全面深化改革通过化解具体矛盾，在矛盾消解中释放发展动能，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突破的核心路径。

其次，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准确分析中国式现代化过程的矛盾。一方面，当前我国发展格局呈现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双重特征，既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社会矛盾集中显现的特殊阶段。伴随全面深化改革的持续推进，改革的重点领域呈现出矛盾叠加、利益关系盘根错节的复杂局面，这是改革进入攻坚期与深水区的阶段性特征。另一方面，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准确分析矛盾是推动发展的关键前提。只有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准确把握矛盾的主次关系、演变规律，才能靶向施策消解矛盾，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最后，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化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矛盾。矛盾始终在变化，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可能会出现许多矛盾。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发展的观点和系统思维化解矛盾。一方面，坚持发展的观点把握矛盾的阶段性特征和演变趋势。全面深化改革通过前瞻性制度设计和持续性政策调整，主动引导矛盾向有利于发展的方向转化，打破旧有矛盾的束缚，为中国式现代化开辟新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运用系统思维统筹推进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改革，强化各领域之间的协同联动，避免改革碎片化导致矛盾转移，最终激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活力。

二、全面深化改革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制度稳则国家稳，制度强则国家强。在新征程上，同样不能忘记制度的重要性。《决定》中指出：“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从中不难看出，全面深化改革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各领域在制度创新、机制优化和制度强化方面的具体实践与努力，为深入理解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制度维度视角。

（一）从制度创新看，全面深化改革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填补制度上的空白

制度创新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马克思主义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原有的生产关系若不能与之适配，就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此时，制度创新便成为打破僵局、推动生产力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全新的现代化道路，其发展进程中不断涌现出的新情况、新问题，对与之适配的制度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原有的制度框架在某些领域可能难以满足其发展需求，全面深化改革所推动的制度创新，正是为了契合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不断变化的生产力状况，构建更为完善、适配的生产关系，以充分释放生产力发展的活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这一举措针对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制度缺失，从顶层设计层面为数字经济的规范、健康、快速发展提供了制度支撑。通过健全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制度，既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也能够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一是加强统筹协调，构建整体推进的制度体系。二是坚持审慎

监管，建立开放包容的新机制。三是鼓励创新发展，营造富有活力的良好环境。

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的制度创新，还体现在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持续推进上。^[8]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相辅相成，国家制度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与依据，国家治理则是国家制度的实践与运行。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断涌现的新领域、新实践需要与之适配的治理机制与制度安排。全面深化改革通过加强顶层设计与整体谋划，在民主法治、社会治理、基层治理等多个层面推进制度创新。在民主法治领域，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从制度层面保障人民广泛、真实、深入参与国家治理，提升决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在社会治理领域，创新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化解机制，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相关制度，提高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智能化水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从制度创新视角审视，全面深化改革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精准识别制度需求，针对性地填补制度空白，构建起一套更加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推进提供坚实制度保障，助力我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稳步前行。

（二）从机制优化看，全面深化改革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面临多重挑战。在区域协调领域，由于产业地域特性与要素流动政策壁垒，使区域内城市陷入恶性竞争，引发资源浪费。在社会治理领域，人口老龄化加剧与公共服务供给滞后的矛盾突出，城乡教育、医疗资源差距显著，暴露出资源分配机制、服务供给机制的失衡。这些问题相互交织，形成阻碍现代化进程的复杂困局。

全面深化改革围绕上述问题展开机制优化实践。^[9]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建立跨区域利益共享机制，通过税收分成、产业飞地等方式推动发达地

区与欠发达地区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格局。粤港澳大湾区建立的“总部+基地”“研发+生产”跨区域产业协作机制，促进珠三角地区资源要素的高效流动与合理配置。在社会治理领域，机制优化聚焦民生痛点。通过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机制，建立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制度，加大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公共服务投入。同时，创新社会治理协同机制，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机制优化本质上是对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适应性的动态调整。全面深化改革通过机制创新，有效破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结构性矛盾与系统性问题，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生态永续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三）从制度强化看，全面深化改革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应对重大风险挑战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面临着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经济社会转型风险加剧等多重挑战。制度作为国家治理的根本性保障，其强化程度直接关系到国家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与水平。全面深化改革通过完善制度体系、增强制度执行力、提升制度适应性，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效抵御重大风险挑战筑牢坚实屏障。

在国家安全领域，制度强化聚焦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贯彻落实。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制定和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法律支撑。建立健全国家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制度、危机应对处置制度，构建集情报信息、风险研判、应急响应于一体的国家安全运行机制。在社会治理领域，制度强化致力于提升社会风险防控能力。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健全信访工作制度、人民调解制度，推动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和前端化解。建立健全突发事件

件应急管理体系，完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应急预案和处置制度，提升应急响应和救援能力。

制度强化并非一劳永逸，而是动态调整、持续完善的过程。全面深化改革通过制度强化，不断提升制度的系统性、协同性和适应性，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效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使命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围绕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核心任务，全面深化改革绝非孤立的调整，而是承载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与时代担当。从使命担当、目标导向到实践路径，层层递进，体现了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关联。

（一）从使命担当看，全面深化改革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

全面深化改革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这一战略布局蕴含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与理论逻辑。

《决定》作为指导新征程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深入剖析了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科学谋划了改革的总体部署，彰显了党中央以改革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的坚定决心。

全面深化改革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任务精准发力。经济领域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破除阻碍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科技创新领域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社会领域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优化公共服务体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生态领域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些改革举措以《决定》为指引，将使命转化为具体行动，形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合力。

未来，全面深化改革需以更坚定的使命担当精

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与艰巨繁重的改革任务，通过持续深化改革，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为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注入持久动力。

（二）从目标导向看，全面深化改革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指引

全面深化改革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指引，本质上是将改革的价值追求与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深度融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发展方向的精准把握与系统谋划。《决定》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与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的制度创新、治理效能提升形成内在呼应，为改革实践锚定了清晰的方向坐标。

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具体目标指引。其一，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要求改革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壁垒，优化资源配置机制。其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促使改革聚焦收入分配制度优化，通过完善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机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推动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切实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其三，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目标指引下，全面深化改革既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又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物质与精神的协同共进。其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目标，则要求改革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立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转化为制度实践。其五，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目标，促使全面深化改革以制度型开放为抓手，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决定》强调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建设更高水平开放

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通过改革增强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谋发展，在国际合作与竞争中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

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指引的全面深化改革，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确保改革始终沿着符合人民利益、推动国家发展的方向前进，实现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惠民生、以民生固根基的良性循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保障。

（三）从实践路径看，全面深化改革以落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任务为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团结最广大人民，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把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这个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落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任务，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10]

1. 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政治保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面深化改革和中国式现代化，驱动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前行。

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决定》明确提到要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创新和改进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只有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确保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定战略规划、统筹资源配置、协调利益关系，将分散的社会力量整合为推动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合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总目标，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系统擘画了改革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为解决“改

什么”“如何改”等根本性问题提供了根本指引。

凝聚资源，破除障碍。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相结合的渐进式改革，在不同阶段精准应对计划经济体制转型、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科技革命浪潮等多重挑战，其核心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作为改革方向的“定盘星”与力量整合的“主心骨”。在突破改革深水区的过程中，党的全面领导彰显出强大的资源整合与共识凝聚能力。面对利益固化藩篱、新旧动能转换等难题，党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放管服”改革等举措，破除阻碍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依托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广泛吸纳多元主体意见，既保障改革决策科学性，又增强社会认同度。这种领导机制确保改革红利持续释放，推动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改革成果向现代化建设全局转化，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

引领驱动，精准施策。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与顶层设计，将现代化建设的多项目标整合为有机整体。“十四五”规划立足新发展阶段，统筹科技创新、绿色转型、民生保障等领域，将改革重点与现代化建设核心任务深度绑定，确保改革方向不偏离、资源配置更高效。在实践中，党的领导确保改革举措形成合力。通过民主集中制广泛凝聚社会共识，通过党的组织体系将改革部署转化为基层行动，有效避免改革碎片化、局部化倾向，实现改革的系统性与现代化的整体性深度融合，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持续动力。

2.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了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动力。”《决定》中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为了深入贯彻这一发展思想，我们必须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

坚持做到改革为了人民。《决定》指出：“聚

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完善收入分配和就业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始终要将人民置于价值坐标的核心位置，通过构建覆盖全民的普惠性民生保障体系，强化基础性公共服务供给，筑牢社会救助兜底防线，切实解决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实际难题。针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建立动态响应机制，确保民生保障精准施策、落地见效。通过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收入差距，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同共进。要通过这些改革举措让发展成果实现更广泛、更均衡的共享，全方位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多元需求，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持久动力。

坚持做到改革依靠人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个平凡的人都作出了不平凡的贡献！人民永远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挑战的最大依靠。”历经持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已在众多领域实现历史性跨越。然而，制约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壁垒依然存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后，更加需要汇聚人民群众的磅礴力量。人民群众既是改革成果的共享者，更是推动改革不断前行的核心主体。只有充分激发人民群众参与改革的热情，让亿万民众以主人翁姿态投身改革实践，形成广泛支持、共同推动的强大合力，才能为改革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一方面，始终坚持群众路线，主动倾听群众呼声，精准把握群众需求，把群众急难愁盼作为改革切入点；另一方面，尊重基层首创精神，鼓励群众大胆探索创新，及时总结推广群众在实践中形成的有效经验。

坚持做到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评判各项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尺，在于人民是

否切实从发展中受益，生活品质是否得到实质性提升，合法权益是否获得稳固保障。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以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核心导向，将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作为检验工作成败的终极准绳。改革成果的检验要回归实践、扎根基层。通过建立多元评价机制，广泛收集群众意见，以基层实践为试金石，以群众反馈为风向标，动态审视改革措施的科学性与实效性。唯有确保改革能够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切实增进民生福祉，才能真正实现改革为民、改革惠民的目标，夯实改革持续深化的群众基础。

3. 始终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作为改革的行动纲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价值指引与实践方向。创新发展聚焦体制机制改革，通过优化科技创新资源配置、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破除制约科技自立自强的制度障碍；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与城乡融合发展机制改革，推动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绿色发展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改革为突破口，构建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制度通道；开放发展通过制度型开放改革，推动国内国际规则衔接，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共享发展则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核心，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为共同富裕提供制度保障。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落实中国式现代化任务的战略路径。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布局，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与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依托自贸试验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等平台建设，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改革，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这种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改革策略，有效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稳定的发展环境。

坚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动能。需要深化科技体制改

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促进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同时，通过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破除人才评价、流动、激励等方面的制度性障碍，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

结语

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二者的互动逻辑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全过程。全面深化改革从理论、历史、实践逻辑出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动力，通过理论创新引领方向，汲取历史智慧推进进程，落实改革举措激活活力；同时，以制度创新填补空白、机制优化解决问题、制度强化应对风险，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制度保障。而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使命，体现在以其为目标、指引和实践遵循，坚持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聚焦高质量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深化改革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协同共进中，不断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1] 于安龙. 论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意涵[J]. 学术界, 2025(04):27-37.

- [2]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10.
- [3] 亓利, 沈航.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J]. 理论探讨, 2024(02):103-110.
- [4]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164.
- [5] 贺新元. 邓小平开辟了以中国式的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新路[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4(08):109-117+156.
-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8:69.
- [7] 樊士博.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10):12-21+181.
- [8] 杨文圣, 代汝欣. 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J]. 求知, 2024(08):25-28.
- [9] 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聚力攻坚[J]. 经营管理者, 2024(08):17-23.
- [10] 陈理. 深刻理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中心任务[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4(06):1-10+196.

责任编辑：陈琴容

党的领导对法治建设的引领作用

赵咏梅

(中共福州市委党校, 福建 福州 350014)

摘要: 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 为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其中, “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之一。基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 深入探讨党的领导引领法治建设的逻辑依据, 包括理论渊源上党的领导与法治建设目标的一致性, 实践逻辑中二者相互支撑的关系。从应对社会治理挑战、破解法治难题以及把握发展方向等方面, 阐述新时代法治建设对党的领导引领的现实需求。同时从历史经验与国际对比角度, 揭示党的领导引领法治建设的历史必然性。进而从方向、体系、实践三个维度, 探索党的领导引领法治建设的实践路径, 并提出健全协同机制、强化队伍建设、完善监督问责机制等保障措施, 旨在为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习近平法治思想; 党的领导; 法治建设; 全面依法治国

中图分类号: D920; D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072(2025)05-023-9

法治兴则国兴, 法治强则国强。^[1]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 明确提出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2]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2]18}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在法治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引领作用。研究习近平法治思想视域下党的领导对法治建设的引领作用, 对于深入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 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

本质与规律,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党的领导引领法治建设的理论逻辑与时代必然

(一) 党的领导引领法治建设的历史必然性

1. 我国法治建设的百年历程, 始终镌刻着党的领导这一鲜明印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党在局部执政实践中开展了开创性的法制探索: 《井冈山土地法》首次以法律形式确立农民土地所有权, 延安时期形成的“三三制”政权组织原则与马锡五审判方式, 构建了人民司法的雏形, 这些实践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法治为民的基因底色。新中国成立后, 1954年《宪法》的制定, 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作者简介: 赵咏梅, 中共福州市委党校法学教研部主任、副教授, 研究方向: 法理学、行政法学。

等根本政治制度，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初步法治框架；尽管经历曲折，但党在总结经验教训中深刻认识到“法律是治国之重器”^[2]，为后续法治建设积累了历史镜鉴。改革开放以来，党以巨大政治勇气推动法治领域拨乱反正，1997年将“依法治国”确立为基本方略，2011年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实现了从无法可依到有法可依的历史性跨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法治建设进入系统集成阶段。通过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强化顶层设计，推动《宪法》第五次修改、《民法典》编纂等重大立法工程，深化司法责任制等关键领域改革，法治中国建设呈现出立法质量提升、执法效能增强、司法公信力提高的新格局。历史经验证明，党的领导既是法治建设的压舱石，也是破解发展难题的金钥匙，这一规律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法治实践中得到了持续验证。

2. 中西法治模式的本质差异，根植于政治体制与价值取向的根本分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鼎立”模式，以权力分立制衡为核心架构，其理论预设是通过机构间的相互掣肘防止权力专断。但在实践中，这种模式逐渐演变为利益集团博弈的工具。美国国会因两党对立导致重要立法长期难产，法国行政权与司法权的权限争议多次引发治理危机，这些现象暴露了其“制衡有余、协同不足”的结构性缺陷，难以形成符合国家整体利益的制度共识。

我国在党的领导下形成的法治模式，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制度效能。这种优势体现在三个维度：其一，通过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机制，实现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的有机衔接，彰显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法治效率；其二，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载体，将党的主张与人民意志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其三，在应对重大公共危机时，党的领导能够突破部门壁垒与地域限制，快速实现法治资源的全国性调配。这种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法治协同模式，既超越了西方权力制衡的机械思

维，又彰显了社会主义法治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韧性，为全球法治文明贡献了中国智慧。

（二）党的领导引领新时代法治建设的现实需求

1. 应对复杂社会治理挑战的破解之道，在于构建法治协同治理体系。在经济社会转型期，我国社会治理面临的复合型挑战日益凸显，诸如新兴领域的法律空白、网络空间的治理困境、多元利益博弈的加剧。单纯依靠行政手段或司法裁决难以实现实质公平。党的领导作为这一体系的核心枢纽，通过三重机制整合治理资源。在立法层面，通过顶层设计推动重点领域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在执法层面，依托党委政法委的统筹协调功能，打破部门壁垒，建立跨区域、跨部门的联合执法机制；在社会参与层面，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闭环治理模式。这种以党的领导为轴心的法治合力，既保障了治理过程的规范性，又提升了应对复杂问题的制度弹性，为超大规模社会的动态平衡提供了坚实法治支撑。^[3]

2. 法治建设深层次问题的解决，依赖于超越局部利益的系统性改革。当前我国法治建设面临的深层次问题，本质上是制度供给与治理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法律体系的适应性不足；二是执法司法的规范化程度有待提升；三是法治监督体系存在协同短板。党的领导通过三重机制破解体制机制障碍。在制度设计层面，依托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的顶层统筹，推动《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等纲领性文件落地，打破部门利益对立法进程的掣肘；在实践推动层面，以政治权威破除改革阻力；在监督问责层面，将法治建设成效纳入党政领导干部考核体系，建立党委督查、纪检监察、舆论监督联动机制。这种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改革推动力，为破解法治领域的利益固化藩篱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政治保障。^[4]

3.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对法治建设提出了系统性升级要求。法治建设的高质量发展,是从有法可依向良法善治的范式跃迁,其核心在于实现法律体系的完备性、法治实施的有效性与治理效能的适配性三者的有机统一。在科技创新领域,需要构建激励创新与风险防控并重的法治框架;在共同富裕进程中,需通过法治手段调节收入分配、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维度,需实现法治与德治、自治的协同增效。党的领导为这种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方向性引领与系统性保障。在顶层设计层面,党通过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等机制,将法治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全局。在制度创新层面,党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引立法方向。在实践推进层面,党通过强化法治督察问责,确保法律实施效果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

(三)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党的领导与法治建设”的内在统一性

1.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国家与法的论述为党的领导与法治建设的内在统一性奠定了理论基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著作中深刻揭示,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无产阶级专政巩固政权的工具,也是实现人民解放的制度载体,这一论述明确了无产阶级政党运用法治手段治理国家的必然性。从理论逻辑看,党的领导与法治建设的价值目标具有高度同构性。二者均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追求,以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价值导向,在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等核心命题上形成了理论共鸣。我国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不仅在序言中明确了党的领导这一最高政治原则,更通过总纲条款将其转化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规范。这一制度设计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原理,又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理论创新性。^{[5]45}

2.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要义,其实践逻辑贯穿于我国法治建设的历史脉络与制度运行全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领导制定《共同纲领》作为临时宪法,奠定了法治建设的政治基础;改革开放后,通过确立“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推动法治建设从恢复走向体系化发展。这一过程印证了党的领导对法治建设的方向性引领。在立法环节,党通过法定程序将重大决策转化为国家意志;在执法层面,党通过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机制,监督行政机关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同时,法治建设为党的领导提供了制度化保障。《中国共产党章程》与《宪法》形成的规范合力,将党的领导纳入法治轨道,通过“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的机制设计,实现党的执政行为与法治原则的有机统一。这种双向互动的实践逻辑,通过制度创新强化了党的领导与法治建设的关系。

二、党的领导引领法治建设的实践路径与核心维度

(一)方向引领:确保法治建设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1.党的政治领导在法治建设中的属性,本质体现为对社会主义法治方向的根本引领与人民立场的坚定坚守,这一属性通过制度设计与实践运行形成了完整的逻辑闭环。从政治哲学维度看,党的政治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统一性,根植于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与法治为民价值追求的高度契合,而党的领导正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核心实现形式。在实践中,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法治建设的具体指引。例如,在医疗领域,围绕健康中国战略,《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将“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确立为法定目标;在住房保障方面,通过“房住不炒”的政策定位,引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配套法规完善保障性住房制

度。这些实践表明，党的政治领导并非抽象的原则宣示，而是通过将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转化为具体法律规范，使“以人民为中心”从政治理念变为可诉的权利条款，彰显了社会主义法治的政治属性与人民属性的高度统一。

2.党的思想领导在法治领域的核心体现，是通过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武装，塑造法治工作队伍的政治品格与专业素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根本立场、正确道路等重大命题，为法治实践提供了思想旗帜与行动指南。对法治工作队伍而言，这一思想不仅是知识体系，更是必须内化于心的政治准则与价值标尺。实践中，思想引领通过制度化学习机制实现深度渗透：在法院系统，“双百”活动（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将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公正司法理念转化为审判流程规范；行政执法队伍则依托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将依法行政要求具象为执法裁量标准。思想引领的制度化运作，确保了法治工作队伍在司法改革、执法创新等关键环节始终与党中央决策部署同频共振，形成理论清醒、政治坚定、实践自觉的良性循环。^[6]

3.党的组织领导为法治建设提供的组织保障，核心在于构建科学的法治人才选拔任用与管理体制，确保关键岗位始终由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执掌。在选拔标准上，坚持政治标准首位与法治素养过硬相统一，将是否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首要条件，同时把法治思维运用能力、依法办事水平作为重要考核指标。立法机关选派兼具政治判断力和专业洞察力的干部参与重点领域立法；为执法部门配备既懂业务又通法律的复合型人才；在司法系统，通过上下交流、跨部门轮岗培养全能型法官检察官；管理监督方面，建立法治政绩考核体系，将依法决策正确率、执法司法公信力等纳入干部考核，对法治建设失职失责

者严肃问责。这种组织保障机制，既守住了政治忠诚底线，又提升了法治专业能力，彰显了党的组织领导在法治建设中的核心保障作用。

（二）体系引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完善发展

1.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贯穿于法律体系构建的全流程，形成了战略引领、机制保障、实践创新的闭环体系。在顶层设计层面，党通过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统筹立法规划，将国家发展战略转化为立法议程。在立法协调机制上，党通过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协同、社会参与模式破解利益博弈难题。这种领导模式既确保立法紧扣国家治理现代化需求，又通过立法调研吸纳民意，使法律体系既保持社会主义属性，又兼具回应时代问题的开放性，实现了党的主张与人民意志在法治层面的高度统一。

2.党对法治各环节的统筹协调，构建起执法、司法、守法的闭环管理机制，为法治体系高效运转提供了系统性保障。在执法环节，党通过党委政法委牵头，推动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破解多头执法困局。司法环节的统筹聚焦于独立公正与系统协同的平衡。党领导的司法责任制改革，通过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压实司法责任，同时建立跨区域司法协作机制。在守法环节，党创新普法责任制，将“谁执法谁普法”纳入党政考核体系。通过宪法宣传周、民法典进社区等品牌活动，结合新媒体普法矩阵，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基层党组织主导的法治积分制、村规民约法治化等实践，更让守法意识融入群众日常生活，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的行为自觉，彰显了法治环节统筹的民生温度与治理效能。

3.党对法治领域改革的引领，体现为以系统思维破解体制性梗阻、机制性障碍与保障性短板，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螺旋式升级。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中，党以顶层设计破解深层次矛盾：针对刑事诉讼中侦查中心主义弊端，通过中央

政法委员会统筹，推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建立公安、检察、法院证据标准统一机制，强化庭审对定罪量刑的实质化作用。在公共法律服务领域，党主导的改革聚焦均等化、便捷化、智能化三维突破。通过将公共法律服务纳入地方党委、政府考核体系，推动建立县乡村三级服务网络。这些改革既着眼于司法权运行的机制重构，又关注法律服务的民生温度，体现了党对法治改革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效率提升与公正保障相结合的统筹驾驭能力，为法治体系的动态完善提供了持续动力。

（三）实践引领：破解法治建设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1.党对民生法治需求的精准回应，是社会主义法治“人民性”本质的集中体现。其核心机制在于将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转化为具体法律规范与制度供给。在就业领域，针对平台用工关系模糊、拖欠农民工工资等突出问题，党通过顶层设计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修订，明确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条款，建立工程建设领域工资保证金制度。面对群众对舌尖上的安全的迫切期待，党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增设网络食品交易监管、食品安全追溯等专章。在社会保障领域，党以立法推动保障体系从制度全覆盖向人群全覆盖跨越。这些实践表明，党领导的民生法治建设是通过问题导向、政策转化、法律固化、实施监督的闭环机制，将群众获得感转化为可量化、可感知的法治成果，印证了法治为民的价值真谛。

2.党对权力运行的法治监督构建了多元协同、纪法衔接的立体约束网络。在监督体系架构上，以党内监督为轴心，通过《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确立的党委（党组）全面监督、纪律检查机关专责监督机制，串联起人大监督的法律巡视、民主监督的协商评议、行政监督的层级督查、司法监督的诉讼纠错等多元监督形态。这种协同模式通过监督信

息共享平台实现效能叠加。在纪法衔接层面，形成纪律红线、法律底线的双重防控机制。《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与《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构建起阶梯式责任体系，对违反政治纪律、滥用职权等行为实行先纪律审查、后法律追责的双轨处理。通过违纪必纠、违法必惩的刚性执行，使法无授权不可为成为权力运行的常态。这种监督模式既通过制度协同破解了监督孤岛难题，又以纪法刚性维护了法治权威，为权力在法治轨道运行提供了双重保障。

3.党对基层法治建设的引领，是打通法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关键机制，其核心在于将国家法治统一要求与基层治理实际需求有机融合。在组织保障层面，在乡镇（街道）设立法治办公室，配备政法委员统筹协调法治工作，推动法官、检察官、律师等专业力量下沉社区（村）。在文化浸润层面，党的思想引领转化为具象化的法治宣传教育，通过法治文艺汇演、田间地头普法课等形式，将抽象法律条文转化为群众易懂的生活逻辑。在矛盾化解层面，党领导构建的“三调联动”机制展现出独特优势：村（居）党组织主导设立矛盾纠纷调解室，吸纳老党员、乡贤等参与人民调解，与司法所、派出所形成联动，将大量纠纷化解在诉前。这种党组织引领、多元参与、法治保障相结合的治理模式，既维护了基层社会的动态稳定，又培育了群众对法治的内生性认同，为国家法治建设筑牢了根基。

三、党的领导引领法治建设的保障机制与优化路径

（一）健全党的领导与法治建设的协同机制

1.党委领导法治建设的议事决策机制，是实现党的领导与法治建设有机统一的制度枢纽。从制度建构看，需以职责清单、程序规范为基础，明确党委在法治建设中的决策范围，如涉及法治建设的重大战略、重大改革、重大举措等，均应纳入党委议

事决策范畴。法治建设领导小组作为常态化议事机构，承担着顶层设计与统筹协调双重职能。在实践维度，重大立法项目中的党委领导模式具有重要示范意义：党委通过审定立法规划、提出立法建议等方式把握政治方向，人大则依据法定程序将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这种政治引领与法定转化的互动机制，既确保了立法符合党的路线方针，又彰显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立法权威，将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法治建设的制度效能。^[7]

2.法治建设成效考核机制是将党的领导转化为法治建设实效的关键制度设计。法治建设成效考核机制通过量化评价与价值引导的双重功能，构建以考促建、以评促改的治理模式。从制度属性看，该机制将法治建设成效纳入党的领导评价体系，既体现了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的战略定位，又为各级党委和政府履行法治建设领导责任提供了刚性约束；在程序维度，关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率、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通过率等过程性要素；在效果维度，引入公众法治满意度、法治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等民生导向指标，避免唯数字论的形式主义倾向。考核结果的应用是机制效能的关键落脚点。将其与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评先评优直接挂钩，形成法治绩效与政治前途的正向关联，培育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

3.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协调机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内部协同的核心纽带，其价值在于通过制度整合消除规范冲突，形成法治合力。从法理层面看，二者虽分属不同规范体系，但在价值取向上具有同质性，均以保障人民利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在调整对象上存在交叉性，尤其在党员干部行为规制领域形成互补。构建该机制需强化顶层设计的统筹性：在立法规划环节建立联动审查制度，由党委法治建设议事协调机构牵头，对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制定计划进行合规

性研判，避免出现调整范围重叠或规制标准冲突。在规范制定阶段，注重效力位阶的衔接，明确党内法规不得突破国家法律底线，同时国家法律需为党内法规预留制度空间，如对党员干部的更高标准要求可通过党内法规细化落实。这种衔接模式既维护了法律的普遍约束力，又彰显了党纪严于国法的原则，最终推动形成党内治理与国家治理的法治合力。

（二）强化法治工作队伍中党的领导核心作用

1.政治思想引领是确保法治工作队伍建设正确方向的基础性工程。政治思想引领的核心要义在于通过系统化的价值塑造，将党的法治理念内化为法治工作者的职业信仰。从法学视角看，立法、执法、司法队伍的政治素养直接关系到法律实施的价值取向。通过党史学习教育能够帮助法治工作者深刻理解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的历史必然性；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则通过刮骨疗毒式的自我革命，强化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职业伦理。此类思想淬炼活动提升了法治工作者的政治判断力，强化政治执行力，将党的法治决策转化为具体司法行政行为。其终极目标在于构建党性与专业性相统一的职业共同体，使法治工作者既精通法律专业知识，又坚守社会主义法治信仰，在个案办理中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5][47]}

2.党员法治工作者的专业能力提升是新时代法治队伍建设的核心命题。党员法治工作者的能力水准直接决定着法治实践的质量与效能。从职业伦理与专业素养的辩证关系看，党员身份赋予的先锋模范责任，要求其在法律适用中既保持技术理性，又彰显政治担当。实践层面，党员法治工作者的示范引领作用体现在双重维度：作为执法司法者，需以同案同判维护法律统一适用，通过典型案例释法说理传播法治精神；作为党员，应在疑难案件处理中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将政治智慧与法律智慧转

化为纠纷化解实效。这种专业引领、党性示范的双重效应，既能带动法治队伍整体能力提升，更能强化社会公众对法治权威的认同，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人才支撑与实践动能。

3.完善法治人才培养体系是筑牢法治建设根基的战略性工程。法治人才培养体系的核心在于构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相适配的育人机制，确保人才培养始终锚定党的领导这一根本方向。在法学教育领域，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体现在对育人方向的全程把控：通过强化高校法学院党委建设，将党的法治理论与育人目标深度融合，在课程设置、师资建设、科研导向等环节发挥主导作用，防止法学教育陷入去政治化误区。^[8]课程体系改革需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机渗透。这种培养模式既强化了人才的专业能力，更培育了其对党法治事业的认同，最终形成政治过硬、业务精湛、兼具实践智慧的人才供给链，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可持续的智力支撑。

（三）完善党的领导引领法治建设的监督与问责机制

1.强化党内监督保障。党内监督作为法治建设的核心保障机制，其制度效能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法治化的推进深度。在规范权力运行层面，党内监督通过与国家法治监督体系的有机衔接，构建起预防领导权滥用的双重防线。^[9]实践中，党内巡视制度以“政治体检”为核心，重点排查在决策环节是否存在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倾向。这种监督模式不仅强调对违法违规行为的事后查处，更注重通过制度刚性约束实现源头预防。从治理现代化视角看，强化党内监督对法治建设的保障作用，本质上是通过对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确保党的领导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最终实现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统一，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制度支撑。

2.畅通社会监督渠道。社会监督是法治建设中多元监督体系的关键环节，其制度价值在于通过公众参与形成权力制约的社会合力，与党内监督构成协同治理格局。从法治理论看，社会监督的本质是人民主权原则的实践形态。实践中，需构建监督、反馈、处置的闭环机制。一方面，明确新闻媒体对违法违规行为的调查报道权，通过立法保障舆论监督免于非法干预；另一方面，完善网络举报平台等便捷投诉渠道，建立举报人信息加密保护制度，从程序上杜绝打击报复风险。对社会监督反映的问题，重大事项处理结果需通过政务公开平台全程公示，以程序透明提升公众对法治建设的认同度。社会监督既弥补了国家监督资源的局限性，又通过公众参与增强了法治建设的社会基础，最终在党内监督与社会监督的良性互动中，实现法治公信力的持续提升。

3.建立失职问责制度。失职问责制度是强化党的领导法治化的重要制度支撑，其核心在于通过权责利对称的机制设计，构建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的治理模式。从法学视角看，该制度以权责一致原则为基础，将党委和领导干部的法治建设领导责任纳入规范化轨道，通过制定精细化的权力清单与责任清单，明确不同层级、不同岗位的责任边界，区分主体责任、监督责任与直接责任的认定标准。在问责机制构建上，需严格遵循过罚相当原则，明确问责启动的法定情形。问责程序应贯穿调查、审理、复核的全过程，确保依据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作出惩戒决定，既防止问责泛化，也避免问责不力。这种制度设计的实践价值在于形成刚性约束的倒逼机制，通过公开问责案例强化警示效应，促使领导干部将法治建设责任转化为具体履职行为。

党的领导是新时代法治建设的根本保证，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对法治建设的引领作用，既是对我国法治建设历史经验

的深刻总结，也是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必然选择。通过从理论逻辑、实践路径和保障机制等多方面深入研究，我们清晰地认识到党的领导在确保法治建设正确方向、完善法治体系、破解法治难题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在未来的法治建设征程中，需要进一步深化对党的领导与法治建设关系的理论认知，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引领法治建设的实践机制，将党的领导全面、深入、系统地贯穿于法治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持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以法治建设的新成就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277.
- [2]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2.
- [3] 张文显.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J].中国法学，2022(06):10.
- [4] 黄文艺.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司法改革理论[J].比较法研究，2021(02):1-12.
- [5] 吕廷君.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历史渊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J].前线，2021(02):45-48.
- [6] 莫纪宏.论习近平法治思想理论体系的二元化逻辑结构和功能[J].行政管理改革，2021(03):4-12.
- [7] 蒋传光.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内容[J].学习与探索，2021(01):61-68.
- [8] 孔庆江.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全球治理观[J].政法论坛，2021(01):3-15.
- [9] 苗炎.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不断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J].法制与社会发展，2021(01):15-24.

责任编辑：陈琴容

历史分期理论视域下中共党史的 文明叙事转型

——基于三个历史决议的文本比较分析

张建彬

(广西艺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22)

摘要: 历史分期理论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在总体上理解和把握党史的关键。传统历史分期范式在阐释历史复杂性时存在忽视社会内部变革、阶层互动、文化观念变迁以及历史主体主观能动性的局限,而多维时空体理论从时空压缩、主体重构、文明维度等方面实现突破,为党史研究带来新视角。通过对三个历史决议叙事特征对比分析发现:《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革命语境下问题导向的线性叙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改革语境下反思性的辩证叙事,《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是在复兴语境下全景式的系统叙事。这种叙事演进对国家发展战略规划、社会文化建设、党史学习教育与党建工作等均能提供理论指引和实践启示。

关键词: 历史分期理论; 中共党史; 三个历史决议; 文明叙事

中图分类号: D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072(2025)05-031-10

历史分期理论作为洞悉历史演进内在逻辑的关键路径,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科学且系统的历史分期,是精确梳理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深度挖掘历史规律的核心要素。胡绳先生以革命史观为基石构建的分期理论“须要具体的考察中国近代历史的特征”^[1],通过“社会性质转变”轴线揭示中国革命逻辑,为早期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理论支撑;其晚年“建议打通1840年至1949年,作为完整的中国近代史”的观点,更是突破了传统研究的局限,从更宏观的视角拓展了党史研究的范围。传统分期理论虽在构建历史叙

事框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阐释历史发展进程时,它是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分析路径,对把握社会演进的多元动力机制及文明形态的复杂性存在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历史解释的完整性与丰富性。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第三个历史决议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历史叙事的核心线索,创新运用文明史观,突破了传统分期理论中“革命—建设”的二元对立认知模式,为中共党史研究开辟了新的理论空间与学术增长点,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觉。在此理论转向背景下,构建“革命阶段—建设阶段

作者简介: 张建彬,广西艺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党史党建、思想政治教育。

一复兴阶段”三维立体的分期框架，不仅对既有研究范式实现了有机整合与理论超越；也通过整合不同理论视角的分析优势，对历史发展阶段性特征中的内在连续性与演进逻辑有精准把握；对推动中共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当下，“大历史观”作为分析工具被引入党史研究领域，强调从长时段、宽视野审视历史。在“大历史观”视野下，立足多维时空体理论，从革命进程、现代化进程、文明形态演进三条相互关联又各具特色的轴线对党的三个历史决议进行深入剖析，揭示中共党史叙事范式从革命史叙事主导，逐步向现代化叙事萌芽、深化，进而迈向文明史叙事复兴的转换过程。

一、历史分期理论的中国化进程与突破

（一）传统分期范式的实践困境与局限性

历史分期理论作为史学研究的分析框架，深刻影响着学界对历史演进逻辑的认知与路径阐释。历经长期的传承与学术积淀，中国传统历史分期范式形成了以“王朝更替（古代）—社会形态更替（近代）—革命阶段论（现代）”为基本架构的线性分期体系。这一范式虽为历史知识的系统化梳理提供了基础框架，但对政治史的过度侧重导致经济、文化等维度的研究被遮蔽；对阶级斗争的单一强调忽视了社会阶层的多元互动；对线性进步的预设简化了历史演进的复杂性与偶然性。这些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史学研究对历史现场的完整还原，难以充分展现中国历史进程中文明形态的多样性与发展逻辑的丰富性。

在古代史研究中，传统分期范式“以朝代兴衰和更替为单位划分历史。严格说，这只能是一种历史编纂的习惯，除朝代更替、治权变换外，没有其他意义，距真正的历史分期似乎还有一定距离”^[2]，忽视了社会内部深层次结构性变革。以秦汉为例，秦统一六国，构建中央集权封建王朝，推行郡县制，对后世政治架构影响深远。然而，传统分期忽视了秦汉时期土地制度的动态演变，如从秦代“黔首自

实田”到汉代土地私有制发展，土地兼并现象重塑社会阶层结构与经济运行模式未得到充分阐释。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转型阶段，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鼎盛，其开放政策推动了丝绸之路贸易与文化交流；宋朝经济取得突破性进展，商业经济高度发达，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唐宋时期市民阶层兴起、壮大与重构城市社会结构，催生新文化消费需求，推动通俗文化如宋词、话本等兴起，但是在传统分期范式下这些深层次社会文化变革被边缘化，未得到充分挖掘与阐释。

进入近代历史场域，传统分期范式以“决定历史分期，生产方式是根本的”为根本划分标准^[3]，虽然强调社会形态根本性转变，但在方法论上陷入对单一经济基础的过度依赖，导致对社会阶层互动与文化观念变迁的研究缺失。例如，鸦片战争后，中国自然经济解体进程中，新兴民族资产阶级与农民阶级在实业救国实践中的利益关联、矛盾调和及其对社会变革的推动作用，尚未得到系统研究。在文化观念层面，鸦片战争后的西学东渐，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政治体制变革的思想探索，不同社会阶层在中西文化碰撞中的价值分歧与实践路径差异，在“社会形态更替”的宏大叙事中被简化为线性进步链条上的注脚。这种研究偏向使得近代中国复杂的文化转型历程，沦为经济基础变革的被动反应，未能彰显其作为独立历史维度的能动性价值。

“在党史研究中，‘革命史’范式一直处于主导地位。”^[4]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叙事逻辑，客观上形成了对经济建设、文化发展与革命进程互动关系的研究遮蔽。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例，既有研究对“一五”计划所奠定的工业体系基础给予充分探讨，但对同期传统文化现代转型路径、外来文化本土化实践等文化建设议题的研究仍显薄弱。例如，在三次“左”倾错误主导中央领导

权的历史阶段，毛泽东等党内领导人通过调查研究、军事实践等方式，持续进行了理论反思与实践纠偏。然而，这些蕴含历史辩证法的实践探索，在“错误路线—正确路线”的二元对立的叙事框架中未能得到完整呈现，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历史演进的复杂样态，未能充分展现历史进程中多元力量的博弈轨迹与动态平衡机制，导致部分研究对党史发展规律的把握存在认知偏差。

在历史哲学层面，传统分期范式受机械决定论思维范式的影响，其理论预设将历史演进简化为单一线性进程，过度强调发展规律的必然性。这种研究取向在阐释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转变时，往往聚焦于西方列强侵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张等外部因素，相对忽视中国社会内部多元主体的历史能动性，使义和团运动中农民阶级反帝自主性、戊戌变法中资产阶级维新派制度探索主动性，在既有研究框架中未获得充分的学术观照。在社会主义建设史研究中，“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尽管存在严重失误，却客观上反映了党和人民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对社会主义建设路径的大胆尝试，蕴含着广大群众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与实践热情。这类体现人民群众主体创造性的历史实践，在传统叙事中往往被简化为阶段性政策失误的例证，其背后所承载的探索精神及历史主体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主动作为，未能得到基于具体历史语境的辩证分析。

（二）多维时空体理论的创新性突破与应用成效

时空压缩是多维时空体理论的重要维度之一。它突破了传统分期范式中对历史阶段的孤立认知，强调将不同历史时期置于一个有机的整体框架中进行考察，实现“历史长周期”与“战略机遇期”的有机叠合。以第三个历史决议对百年党史的梳理为例，决议指出：“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党和人民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这一划分将新民主主义革命至新时代的历史进程纳入“长周期”框架，印证了时空压缩理论中“阶段递进性”与“整体关联性”的核心观点。正如秦宣所言：“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从野蛮到文明、从传统到现代，是一个具有连续性的过程。与此同时，人类社会的发展又呈现出阶段性特征。”^[5]这种时空压缩的视角，使研究者能够从宏观历史进程中把握各阶段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清晰洞察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特征，弥补了传统分期范式中对历史发展动态关联呈现不足的缺陷。

主体重构是多维时空体理论的又一关键突破。传统历史研究范式尽管在特定维度揭示了社会变革的动力学机制，但在方法论层面却形成对历史多元性的认知遮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6]的重大论断，重构了历史主体性的认知坐标，其理论内涵与多维时空体理论倡导的“多元主体互动”形成学术共鸣。从文明形态学视角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已突破国家范畴而具有全球文明价值，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 systemic 实践，不仅完成了发展范式的生态转向，更为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中国方案，又如数字经济领域形成的移动支付、电子商务等数字文明生态，正在重塑全球产业格局。这种文明形态的创造性转化，在传统政治经济学叙事中难以获得充分阐释，恰恰需要通过多维时空的文明坐标系予以解构与重构。就民族国家建构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突破了单一民族叙事，构建起多民族交融的历史阐释框架。抗日战争时期各民族形成的命运共同体，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是各民族长期交

往交流交融的结果，各民族只有不断团结融合、自觉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才能拥有更美好的未来”^[7]的重要论断，从学理层面确立了多元主体互动的阐释范式，使历史研究得以超越单一主体叙事，全面呈现各民族、各阶层在文明演进中的协同作用。

多维时空体理论创新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类共同价值”的三维文明坐标系，为深入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文明内涵提供了全新视角。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作为方法论基础，确保了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实践理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仁爱”“道法自然”等思想资源，经创造性转化成为现代文明建设的文化基因；“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8]，构成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价值支点。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作出的碳达峰、碳中和承诺，正是文明三维坐标系交互作用的实践例证，展现了文明维度阐释的历史穿透力。这种理论创新突破了传统史学的线性时间观与单一主体论，通过文明形态的时空重构，使历史阐释既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深度，又彰显中华文明的历史厚度，更兼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高度，为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哲学提供了新的方法论路径。

二、三个历史决议的叙事特征对比

（一）第一个历史决议是革命语境下问题导向的线性叙事

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即第一个历史决议）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性，其时空坐标聚焦于1921—1945年党内路线斗争，以“错误—纠正—统一”构建闭环叙事。这一时期，党内历经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等路线斗争，对党的事业产生重大影响。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大革命后期表现突出，他对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放弃革命和武装领导权，导致1927年反革命政变，党和革命群众遭受损失。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则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显现，照搬苏联经验，实行军事冒险主义，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决议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对党内错误路线进行了深度梳理，不仅从思想认识范式、理论实践张力等多维理论层面，详尽阐释了错误产生的根源性因素，更结合具体历史语境，对错误的实践样态及其危害后果展开学理层面的深度解构。以对“立三路线”的批判性考察为例，在特定历史坐标中，决议对李立三提出的激进革命主张进行了深刻分析，强调其深受当时盛行的“左”倾思潮影响。既缺乏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科学把握，亦未能正确认识革命力量对比现实格局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最终导致革命力量遭受重创，大批革命同志身陷险境，为中国革命进程带来阶段性挫折。这种以“时空维度—理论根源—实践后果”的历史解释链条，能够全面客观地呈现历史事实。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决议起草中强调的：“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9]本质上揭示了决议通过历史语境还原与思想谱系追溯实现党内认知整合的理论逻辑。

在对错误根源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决议还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通过理论创新与实践调适实现自我革新的历史逻辑。遵义会议集中地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为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对决议起草工作进行了七次重要修改，明确要求达成“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标，最终形成“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10]的政治氛围。这种将历史经验总结升华转化为组织建设理论的实践，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通过理论自觉实现政治整合的历史智慧，为革命实践确立了方法论原则。

决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11]为方法论，既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在斗争实践中开辟新境界”的辩证思维，又蕴含着“知行合一”的实践哲学。第一个历史决议通过“错误—纠正—统一”的闭环叙事，成功实现了党内思想的高度统一。这种将学理批判与历史建构相结合的叙事策略，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另外决议的历史分析范式，其理论辐射力持续作用于社会主义改造探索与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认知与政党整合的逻辑基石。

然而，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历史叙事存在显著的时代局限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际格局的演变对中国革命产生深刻影响。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中国抗日战争的进程与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等重大事件形成战略联动，苏联战略重心转移直接作用于中共武装力量的发展轨迹，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更使中国革命成为全球政治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叙事视野主要聚焦于党内路线斗争，未能将中国革命置于二战国际格局的宏观视野下进行系统性分析，对中共如何根据国际形势动态调整战略方针、如何构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等关键问题缺乏深度阐释。这种叙事局限导致对革命历程的理解局限，未能完整呈现中国革命在复杂国际环境中的实践逻辑。

（二）第二个历史决议是改革语境下反思性的辩证叙事

第二个历史决议以宏阔的历史视野与精准的时代定位，将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进程科学划分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及历史的伟大转折时期四个具有鲜明阶段性特征的时期。决议中“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10][92]}的论断，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创新性发展，亦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将普

遍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实践智慧。如在社会主义改造阶段，中国共产党以深刻的历史洞察力与卓越的制度建构能力，通过渐进式社会改造策略，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性跨越。

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阶段，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工业化建设与科技发展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尽管遭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反映了探索过程中的认知偏差，但其背后蕴含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与自主创新精神，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历史注脚。邓小平在决议起草中提出的“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12]的阶段性判断，既肯定前期建设成就，亦不回避探索中的失误，体现了历史解释的实事求是原则。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对国家政治体制、经济基础、文化生态造成了系统性冲击。面对这段复杂历史，决议突破单纯否定性评价范式，既深刻揭露极左思潮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严重背离，又充分肯定党和人民在极端困境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政治品格。通过坚持“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13]的指导原则，党清算实践偏差，实现了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理论创新扫清了认识障碍。这种将历史批判与历史继承相统一的叙事策略，维护了党史叙事的完整性，彰显了党在历史转折关头既勇于直面历史曲折、又善于守护革命遗产的政治智慧，为新时代科学总结历史经验提供了方法论示范。

历史的伟大转折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为标志。会议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一决策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为中国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第二个历史决议“既是启动渐进改革的迫切需要，又是它的基石”^[14]，其通过历史经验的系统总结，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不断深入发展的分析框架。

在历史人物评价领域，决议构建的反思性辩证分析范式尤为凸显。比如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的评价，“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成为决议起草工作不可动摇的最根本原则”^[15]。第二个历史决议运用此方法论，准确清晰地区分了“功绩（必然性）—错误（偶然性）”。决议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16]这种全面、客观、辩证的分析方法，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更科学、严谨、合理的理论工具与分析范式。

第二个历史决议在方法论层面构建了“历史条件—主观努力—客观结果”的三维分析框架。这一范式突破了传统史学研究的单维因果解释模式，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辩证统一”的原理转化为具有方法论价值的分析工具，为历史解释提供了立体化的认知图式。其中，历史条件强调聚焦历史事件发生的时空坐标与结构性基础，涵盖政治制度、经济生产方式、文化价值体系、社会阶层结构等多元要素。这些要素既构成历史实践的物质前提与约束条件，又形塑着历史主体活动的现实场域，形成特定历史阶段发展的客观规定性；主观努力着重考察历史主体在既定历史条件下的实践能动性，具体包括执政党的理论创新能力、决策层的战略选择智慧、领导集体的组织动员效能，以及为达成特定历史任务所进行的制度设计与政策实践。这些内容凸显了人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主体价值，强调思想观念创新、行动策略选择与领导力发挥等主观因素对历史进程的塑造作用。客观结果指涉历史事件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最终呈现样态，既涵盖制度建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等可量化的物质性成果，亦包含思想共识凝聚、社会结构变迁等精神性影响，构成对历史实践成效的综合

性评判体系。这一分析框架将历史条件的结构性制约、主观努力的实践性创造、客观结果的历史性沉淀纳入统一解释体系，为科学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提供了典范性的分析工具。

（三）第三个历史决议是复兴语境下全景式的系统叙事

第三个历史决议通过“纵向贯通—横向关联”的双重维度，确立了“连续性”与“阶段性”辩证统一的叙事逻辑，构建了兼具时空纵深与逻辑严密性的党史阐释框架。这种全景式历史书写既突破了线性进步史观的窠臼，又避免了解读碎片化的局限，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大历史观”的认知范式。

在历史叙事的时空建构层面，决议展现出独特的理论建构能力。决议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书写，将推翻“三座大山”的历史进程置于现代化转型的坐标系中，阐释了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实现为后续历史阶段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将革命胜利置于现代化转型的历史坐标系中，揭示其作为“历史转折点”的深层意义。决议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论述，以“一五”计划实施期间新建156个工业项目为典型案例，将历史实践置于长时段发展脉络中，在历史连续性中把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逻辑，超越了非此即彼的价值评判范式，凸显各阶段之间的政策延续性与经验传承性。决议关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叙事，以制度变迁为主线，构建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到城市市场化转型、从特区试点到全方位开放的渐进式改革的历史发展脉络，确立其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的历史地位。这种“根本政治前提—物质技术基础—制度创新经验”的逻辑链条，将不同历史阶段有机串联，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通古今之变”的优良传统，实现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有机衔接。

在叙事主体性建构维度，第三个历史决议实现

了理论范式的创新性突破。决议明确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7]在延续政党、阶级等传统分析范畴的基础上，首次将“人类文明新形态”确立为历史主体性建构的核心维度。这种叙事策略将中国发展实践纳入人类文明演进的全局视野，既突破了传统国别史研究的局限性，又通过文明比较确立了“中国道路”的全球坐标。

在文明坐标系建构层面，第三个历史决议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进程，置于五千年文明演进的纵深视野中进行考察，特别强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18]的理论定位。这种建构从纵向维度上来看，革命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舍生取义”的价值理念形成历史呼应，印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内在契合；从横向维度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全球治理实践，将中国道路的文明基因转化为人类共同价值的实践载体。这种通过时空叙事、主体建构、文明坐标的三重理论创新，构建起马克思主义史学“通古今之变”的现代形态，既延续了“大历史观”的学术传统，又开创了党史研究的新范式，为新时代历史书写确立了方法论标杆。

三、历史分期理论视域下中共党史文明叙事转型的当代价值

（一）对国家发展战略规划的理论指引与实践启示

多维时空体理论所强调的时空压缩与主体重构，提醒政策制定者在谋划国家发展战略时，要充分考量不同历史阶段成果的连续性与传承性。在科技竞争全球化的背景下，政策制定者需以“一脉相承的五年规划制度”为技术演进框架，将“一五”时期156项重点工业项目奠定的工业化基础，与“十

四五”规划中“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前沿领域”的战略部署相衔接，形成“技术积累—迭代创新—前瞻突破”的三级跃迁路径。这种以历史连续性为基底的战略设计，契合第三个历史决议关于“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19]的论述，确保了新能源等关键领域实现“弯道超车”。因此，在谋划国家发展战略时，需在短期目标制定中立足现有技术生态与市场需求，通过可行性分析确定重点研发项目，而在长期目标制定中则聚焦颠覆性技术前瞻布局，在基础研究领域构建先发优势。这种分阶段推进的策略，实质是将历史分期理论中的“阶段性”与“连续性”原理转化为战略实施的操作框架。

由此可见，三个历史决议的叙事特征亦蕴含丰富的战略方法论启示。第一个历史决议的问题导向矫正逻辑，为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提供了认知模型。面对系统性风险，可建立问题溯源机制，通过跨部门协同迅速锁定风险诱因。例如在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既需构建即时响应体系，亦需根据社会心态变化等动态因素，建立闭环管理机制，实现应急策略的弹性调整与持续迭代。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反思性重构范式，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提供了方法论参照。在制定产业升级政策时，既需要评估计划经济时期工业化积累的要素禀赋（如产业工人队伍、基础设施存量），亦需考量全球化退潮、人口结构变化等现实约束条件，在此基础上确立梯度发展路径。第三个历史决议的整体史观建构，启示国家战略需强化跨代际政策的协同性。以碳中和目标为例，可将改革开放时期乡镇企业的能源利用经验、新世纪以来新能源产业的技术沉淀，与“双碳”战略中的储能技术突破、产业结构重构进行有机衔接，形成“历史经验转化—现实技术创新—未来场景建构”的全链条布局。这种建立在历史连续性基础上的战略设计，本质上是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奋斗史转化为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智慧资源库。

总之，当历史解释框架转化为战略设计工具时，其核心在于把握“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其中不变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变化的是随历史条件演进不断迭代的战略路径。这种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战略思维，既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了认知工具，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奠定了基础。

（二）对社会文化建设的理论支撑与实践借鉴

在历史分期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类共同价值”三维文明坐标系，为社会文化建设指明了清晰的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社会文化建设中发挥“定盘星”作用。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公平正义等理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的重要理论源泉。例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公正”理念，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消灭阶级差别”的终极追求，又通过“三次分配制度”等政策工具转化为现实实践，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传播奠定思想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双创方针，将儒家“仁、义、礼、智、信”为代表的价值体系，通过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诚信”“友善”等理念的对接，形成了具有历史纵深感的文化共识；在全球化文明互鉴的语境下，社会文化建设需建立“本土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人类共同价值中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等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和谐”“开放”形成价值共振，这样中国文化体系在保持主体性的同时，不断吸收异质文化中的优秀元素。这种双向互动不仅丰富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更通过跨文化对话机制的构建，提升了中华文化的国际阐释力，为构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全球发展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方案。

历史决议的叙事特征在社会文化建设方法论

上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第一个历史决议的批判性整合逻辑，为当代不良文化治理提供了历史镜鉴。面对网络低俗文化、历史虚无主义等现象，需要“深化网络管理体制改革，整合网络内容建设和管理职能，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20]，通过建立综合治理机制，既依法取缔低俗内容传播平台，又依托主流媒体开展文化赋能活动，在破除文化糟粕的同时巩固主流价值阵地，实现文化生态的净化与重构。这正是对第一个历史决议“批判—纠正—统一”逻辑的当代转化。第二个历史决议对历史人物与事件的“两分法”分析原则，为历史文化遗产的现代性阐释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在文化传承实践中，部分地区存在“文化资源碎片化开发”“历史符号过度商业化”等问题。为避免此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面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21]，这与第二个历史决议强调的“客观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方法一脉相承，为文化传承提供了科学指导。同样，安徽桐城将六尺巷“礼让精神”与现代“枫桥经验”融合，创新“六步调解法”，印证了第二个历史决议“历史条件—主观努力—客观结果”框架的科学性。第三个历史决议强调多元主体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为社会文化建设提供新思路。决议将“坚持统一战线”确立为党的百年奋斗重要历史经验，通过激活多元主体的历史能动性，“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22]，构建“党领导下的全员参与型”文化发展模式，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提供了主体性建构的理论指引。可见，决议对多元主体作用的强调，本质上揭示了社会文化建设需要激活不同主体的内生动力，在价值共识的基础上形成治理合力的深层规律。这种多元主体性的发挥，既不同于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原子化个体假设，亦超越了传统集权模式下的单向度文化灌输，立足中国实际，构建了“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与多元主体能动性相统一”的

新型文化治理模式。

（三）对党史学习教育与党建工作的实践指导与创新价值

历史分期理论的中国化演进及三个历史决议的叙事特征，在党史学习教育与党建工作领域蕴含重要价值，为深化党史认知、提升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历史分期理论的发展为教育者构建了全面叙事框架。多维时空体理论以动态性、综合性视角，将历史发展视为时空压缩与主体重构过程。此理论使教育者能引导学习者深刻理解党在复杂多变历史条件下持续探索、创新的进程。例如，在解析改革开放初期“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逻辑时，可结合第三个历史决议中“坚持开拓创新”的历史经验，说明党如何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交织的时空压缩中重构发展主体，最终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教学叙事突破线性进步史观的局限，有助于学习者理解“历史阶段的连续性与突破性辩证统一”。三个历史决议的叙事特征为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多层次的认知工具。第一个历史决议的政治方向教育范式，其对党内路线斗争的系统梳理，可构建“政治敏锐性培育”的核心教学模块，引导党员干部理解“政治方向偏差对革命事业的致命性影响”。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实事求是认知框架，对历史事件的“条件分析—过程还原—辩证评价”方法，可转化为“历史解释学”教学的核心内容。第三个历史决议的沉浸式历史再现，其“全景式叙事—数字化还原—情感化共鸣”的教育模式，可构建“空间在场—时间回溯—意义体悟”的三维学习生态，通过虚拟现实技术重构历史场景，使学习者在具象化体验中深化对“初心使命”的精神认同，实现从“知识接受”到“情感认同”的教育层级跃升。

历史分期理论与历史决议的叙事逻辑，为新时代党建工作提供了“历史维度—现实问题—未来导

向”的分析框架。面对社会结构复杂化与治理主体多元化的现实挑战，党建工作需借鉴“主体重构”理论，构建“嵌入式党建”新范式，将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将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融入企业价值观体系，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社会动员能力，同时实现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的深度耦合。三个历史决议叙事特征为党建工作提供了宝贵实践经验。第一个历史决议的思想凝聚逻辑，启示党建工作中可构建“常态化理想信念教育机制”，通过“主题党日+红色资源+情景模拟”的复合式教育体系，强化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认同。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制度反思智慧，提醒党建工作中要发挥“历史镜鉴功能”，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如《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修订过程中，系统梳理历史上“惩前毖后”的执纪经验，确立“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等创新性制度设计，实现历史经验与新时代治理需求的创造性转化。第三个历史决议的经验传承体系，启发党建工作中可建立“百年党史经验数据库”，通过“案例教学—行动学习—实践转化”的闭环培养模式，转化为党员培训的必修模块，最终在基层党组织架构优化、重大风险防控等工作中发挥指导作用。

党史学习教育与党建工作的深层关联，在于共同遵循“历史解释—价值塑造—行动指引”的认知转化规律。这种认知转化规律，本质上是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觉转化为治国理政的现实动能。当历史决议的叙事智慧融入党员教育的日常肌理与党建工作的制度血脉，其价值不仅在于历史经验的传承，更在于为解决“百年大党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时代课题，提供了兼具历史厚度与实践温度的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 [1] 胡绳. 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J]. 历史研究, 1954(01): 5-15.

- [2] 刘林海. 论中国历史分期研究的两次转型[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01):108-121.
- [3] 李新. 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分期问题[J]. 历史研究, 1983(04):3-10.
- [4] 周良书. 百年党史研究“范式”更替和转换[N]. 北京日报, 2021-09-13(11).
- [5] 秦宣. 多维度理解新发展阶段[N]. 经济日报, 2023-11-30(10).
- [6]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1:64.
- [7]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4:4.
- [8] 习近平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N]. 光明日报, 2015-09-29(01).
-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379.
- [10] 中国共产党两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1.
- [11]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952.
- [12]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294.
- [13] 龚育之访谈录[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54.
- [14] 郑谦. 与时俱进的党史书写从第二个《历史决议》到《七十年》和《党史》二卷[J]. 北京党史, 2021(03):19-24.
- [15] 宋月红. 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最根本原则是怎样确立和贯彻的[J]. 前线, 2014(03):121-122.
- [16]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21:97.
- [1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22:10.
- [18]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G].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2:109.
- [19]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3:29.
- [20]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4:34.
- [21] 切实加大文物保护力度, 推进文物合理适度利用, 努力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N]. 光明日报, 2016-04-13(01).
- [22]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3:486.

责任编辑:魏璐珂

中国共产党总结和运用 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历程、成就与启示

段 炼 韩 平

(东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 沈阳 110819)

摘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中国共产党通过对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范式探索、体系建构和范式创新, 揭示了改革开放的重要地位、价值取向、道路方向、战略布局以及策略方法。新时代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历史经验需要发扬历史主动, 运用科学方法, 聚焦改革实践。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改革开放; 历史经验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072(2025)05-041-9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1]。在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 党带领人民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 创造了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社会历史上的发展奇迹, 改革开放成为当代中国最壮丽的景象。一系列创新发展和伟大成就的取得, 是改革开放不断走向深入、走向全面的结果, 更是中国共产党总结运用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结果。

一、中国共产党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历史进程

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革命, 其历史经验的系统性总结与创造性转化构成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法论基础。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抓住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重要纪念和庆祝活动历史时

机, 回顾改革开放历史、总结改革开放经验。总的来看, 党总结运用改革开放历史经验这一行为呈现为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 并根据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一) 经验生成与范式探索: 改革开放初期的隐性总结(1978-1989)

在制度变迁的启动阶段, 经验总结呈现实践先导性特征。党对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总结运用多以“原因”“方针”等形式体现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等重要场合的领导人讲话文本中, 没有对改革开放历史经验进行专门总结, 总体以隐性为主, 未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和规范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构建了改革开放初期经验积累的认知框架。1982年, 党的十二大召开。作为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

作者简介: 段 炼, 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的建设(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副教授, 研究方向: 中共党史党建;

韩 平, 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中共党史党建。

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邓小平在开幕式中明确指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中恢复了正确的政策，并且研究新情况、新经验，”^[2]其中的“新经验”实际就是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尽管并未阐述“新经验”的具体内容，但“新经验”实质就是对“摸着石头过河”改革方法的哲学概括，其具体内涵通过三组辩证关系得以呈现。一是在改革路径上把握“破”与“立”的动态平衡，如废除人民公社制与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二是在发展维度上保持“计划”与“市场”的张力结构，如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三是在制度创新中把握“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如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的有机统一。

1987年，在迎接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的前夕和即将迎来第二个十年的重要历史关头，党的十三大召开。赵紫阳在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总结经验，坚持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进一步确定今后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确定在改革开放中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方针。”^[3]在此基础上，提出并阐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标志着经验总结从具体实践层面向理论建构层面跃升。通过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构建了包含生产力标准论、市场经济兼容论、渐进改革方法论在内的三维经验体系。这一时期经验总结的隐性特征，本质反映改革开放初期历史经验“实践突破理论追认”的演进逻辑，为后续系统化总结奠定实践基础。

（二）体系建构与理论提升：改革开放深化期的显性总结（1989—2012）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在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党对于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总结运用逐渐走向显性。以党的十四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转折点，党对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实现从分散性实践认知向

系统性理论建构的范式转换。江泽民提出的“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必须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以及“必须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即“一个坚持、两个必须”，构建了涵盖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结构的改革开放经验分析框架，改革开放历史经验总结的周期化机制逐渐形成。

一方面，在时间维度上形成“逢十周年”的改革开放历史经验总结机制。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制度化总结层面，逐步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周期叙事范式。通过建立“逢十周年”的纪念机制，实现了历史经验总结从事件性回顾向制度性建构的学理跃升。在纵向时间轴上，通过纪念大会形成的制度化历史叙事，既保持了改革开放进程的连续性记忆，又实现了经验体系的迭代更新；在横向理论维度上，每次纪念活动都构成一个具有理论生产功能的政治场域，推动着改革开放历史经验从实践层面向理论体系的创造性转化。具体来看，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党首次系统全面总结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理论成果即“十一个必须”，首次将改革实践中的零散经验整合为具有逻辑结构的理论体系，实现了经验总结的初步结构化。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胡锦涛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论，构建起包含矛盾对立统一、要素协同发展的以“十个结合”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开放历史经验，使得改革开放经验体系更具辩证性、综合性。

另一方面，在内容维度上构建了“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三维体系。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江泽民以“集中到一点”对改革开放十四年伟大实践的经验进行概括，即“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4]。1997年，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并对其进行了具体阐述，强调其“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党

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是这些年来最主要经验的总结”^[5]，通过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的制度设计，将改革开放实践经验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安排。上述二者与党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和三十周年大会上提出的“十一个必须”和“十个结合”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构成了这一时期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三维内容体系。

（三）系统集成与范式创新：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期的经验升华（2012-2024）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延续过去党在全国党代会、改革开放逢十周年总结改革开放历史经验双轨机制的同时，通过理论创新与实践深化的双向互动，推动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总结与运用，实现双重发展。在方法论层面构建起“系统集成”的实践范式，在认识论层面完成“历史经验”向“改革原则”的理论升华。

从方法论层面看，基于改革开放作为系统工程必须全面深化、协同推进的现实存在，党对改革开放经验的总结和运用更加注重系统集成。2018年，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主题由“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升格为“庆祝改革开放”。这次大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党第一次在改革开放逢十周年历史节点对改革开放历史经验进行整体性总结。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以“九个必须坚持”对改革开放四十年积累的历史经验进行概括总结，围绕“为什么改、改什么、怎么改”的逻辑主线构建起“核心原则、实践路径、保障机制”的改革开放经验体系，这是系统思维的充分运用和集中体现。

从认识论层面看，改革开放历史经验实现了从“宝贵经验”到“重要原则”的升华。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改革开放三十五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召开，标志着改革开放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全会强调“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为全面

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经验”，提出以“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6]即“四个坚持”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开放历史经验，推动改革开放经验总结的焦点转向改革的系统集成。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作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实践续篇，将改革开放四十六年积累的“宝贵经验”系统升华为指导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六个坚持”重要原则，既强调历史经验的继承性，又注重新时代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性，体现了改革的历史连续性与时代创新性的辩证统一关系，标志着改革开放历史经验总结从经验性描述转向制度性建构的范式创新。

二、中国共产党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主要成就

中国共产党基于实践哲学的方法论自觉，将经验总结的理论抽象与实践复归纳入辩证统一的历史进程，使改革开放历史经验既作为实践发展的理论中介，又构成历史性实践的自我确证，最终实现“实践—抽象—再实践”的螺旋上升，揭示了关于改革开放地位、立场、方向、布局、方法等规律性认识。

（一）地位论：揭示了改革开放的重要地位

改革开放的地位并非与生俱来、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以改革开放推动中国实现赶上时代、引领时代、超越时代的伟大实践中逐渐确立并深化的。在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改革开放历史地位的认知实现了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升华，改革开放的历史地位不断得到巩固。

邓小平基于计划经济时期社会生产力停滞的历史教训，认识到“不改革就没有出路”^{[2][237]}，将改革开放定位为突破体制桎梏以进行“生产关系适应性调整”的实践工具。因此，为了实现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我们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从而实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伟大历史转

折,取得了经济发展的飞跃,现代化事业稳步向前,社会主义事业更是“谁也动摇不了”^{[2]328}。邓小平以“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2]113}强调了改革开放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巨大作用,明确指出“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2]328}。

此后,党对于改革开放地位的认识愈发深刻。江泽民将“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作为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十一个必须”主要经验的其中之一,强调“实行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国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历史性决策”。^[7]此外,江泽民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历史方位,着眼于党的十五大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部署,进一步指出“改革开放是新时期中国最鲜明的特征”^[7]。胡锦涛重申“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8]172},强调“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8]172}。

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对改革开放地位的认识不断深化。习近平以大历史观指出改革开放不仅是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更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强调“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没有中国的明天”^{[9]4}。基于中国的今天,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10]224},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10]224}。回应了邓小平当年所提出的“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2]242}这一论断。基于中国的明天,习近平结合党的十八大、党的十九大、党的二十大以来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继承发展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的“一招论”,进一步提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10]225}，“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11]。

(二) 价值论: 揭示了改革开放的价值取向

“为谁改”和“靠谁改”是确保改革开放事业

行稳致远的两个关键问题,关系到改革开放的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十分重视改革的价值取向问题,形成了一系列深刻认识。

改革开放之初,在反思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和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内改革建设的经验的基础上,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认识到改革要想顺利推进就必须“信任群众,走群众路线”^{[2]152}。一方面,改革开放要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要以“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372}作为判断改革性质及成效的标准之一。另一方面,邓小平意识到“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12],因此,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及时总结并加以改进推广。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改革开放加快推进。对于改革开放的价值取向问题,江泽民在总结改革开放二十年历史经验时专门指出“必须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改革和建设的根本出发点”^[7]。特别强调要把个人与集体、局部与整体、当前与长远的利益正确地统一结合,从而确保实现和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胡锦涛从主体能动性与制度规范性的辩证统一层面,提出“必须把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8]159},从“结合”的角度对如何更好地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价值取向进行了新的阐释,强调要通过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更好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作用,从而使得改革开放在中国共产党这一坚强领导核心的带领下凝聚起强大力量,提供政治保证。

新时代以来,党在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历史经验过程中达到了对改革开放价值取向的认识新高度。习近平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经验指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10]226},在改革开放的价值取向上更加重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

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继承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改革评价标准，提出了新的“两个是否”的改革评价标准，其中之一便是“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强调要“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3]，实现改革的可持续，从而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三）方向论：揭示了改革开放的方向道路

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往哪儿改”决定着改革开放能不能始终走正路，不走老路和邪路，进而决定了改革开放的命运。在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并以历史经验的形式进一步揭示其深刻内涵。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内的政治状况的基础上，提出“实现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4]163}，“离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根，没有方向”^{[14]278}。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进一步指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5]。显然，扎根于四项基本原则的方向就是社会主义方向，走的道路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三大将改革开放同资本主义区分划界，重申了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原则，指出“不能以自由化的观点看待改革开放，否则就会偏离社会主义轨道”^[3]，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江泽民继承党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道路的经验，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指出“必须全面、正确、积极地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基本路线”^[7]。“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实际上就是基本路线最重要的内容，起到保证改革开放沿着正确方向道路前进的压舱石作用。胡锦涛在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经验时，直截了当地展开基本路线，明确指出：“必须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

中心，始终保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8]158}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我们的改革是有方向的”^{[9]14}。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总结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四条经验，首要就是“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保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5]14}，充分体现了一如既往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道路的决心。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0]228}成为“九个必须坚持”历史经验的其中之一。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也是永无止境的，要“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13]80}，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

（四）布局论：揭示了改革开放的整体布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立足于改革开放的不同历史阶段，围绕“改什么、怎么改”“先改什么、后改什么”在全国党代会、中央全会等为改革开放谋篇布局，不断开创改革开放新局面。党对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总结和运用，深刻反映了党在特定历史阶段对改革开放的整体布局，是党科学谋划改革全局的生动体现。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2]237}。党的十二大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性胜利，强调“在全面开创新局面的各项任务中，首要的任务是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继续推向前进”^[15]，显然，经济体制改革是改革开放破冰突围的关键，在经济体制改革之中又以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为先，适应农村改革的新形势后逐步推进到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3]。在经济体制改革进行的同时，稳步

推进政治、文化体制改革。江泽民在总结改革开放二十年经验时明确指出“必须建立和完善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必须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共同进步”^[7]，反映了党在这一历史时期对改革开放的布局。

党的十六大之后，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心任务，和谐社会建设与社会体制改革逐渐提上日程。党的十六大上，“社会更加和谐”首次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16]2005年，胡锦涛正式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17]。社会建设和社会体制改革成为党布局改革的重要部分。2008年，党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经验，指出“必须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必须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必须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以及“必须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明确包含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个领域，充分体现了这一时期党推进改革开放的布局。

新时代以来，围绕党的十八大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七个紧紧围绕”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路线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继承“七个紧紧围绕”，进一步提出“七个聚焦”的改革蓝图。可见，系统集成、全面深化成为这一时期改革开放的主要特征，改革开放历史经验也更加注重对改革开放布局的整体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经验指出：“必须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挥和增强我国制度优势。”“必须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不断增强我国综合国力。”^[10]²²⁹⁻²³⁰这两条历史经验正是党在这一历史时期强调以系统观念推进改革的生动体现，将党对改革的布局内蕴在历史经验的阐释中。

（五）方法论：揭示了改革开放的策略方法

改革开放的策略方法是党总结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起着保证改革开放在遵循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上顺利推进的作用。从“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机制到“顶层设计”的系统思维，从“重点突破”的非均衡策略到“全面深化”的协同推进，形成了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相统一的方法论体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对于改革开放这样一项全新的事业，全党并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如何推进改革，邓小平提出要“摸着石头过河”的工作方法推进改革。一方面，胆子要大，勇于打破现有的体制机制；另一方面，步子要稳，要善于从改革实践中总结经验，错了的赶快改正，坚持真理。按照“摸着石头过河”的工作方法，党带领人民摸索出了一条从易到难、从点到面、自下而上的渐进式改革路线，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绩，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

江泽民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关于改革方法论的主张，指出：“在深化改革中，要坚持按照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两句话去做，胆子要大，步子要稳。”^[18]在此基础上，他提出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改革是动力，稳定是前提，发展是硬道理，三者密不可分，“好比是我国现代化建设棋盘上的三着紧密关联的战略性棋子，每一着棋都下好了，相互促进，就会全局皆活”^[19]。在总结改革开放二十年经验时，指出“必须维护和保持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7]，进而实现改革、发展和稳定的相互促进。2008年，胡锦涛再次重申：“必须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坚持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统一，确保社会安定团结、和谐稳定。”^[8]¹⁶⁷

进入新时代，改革的综合性、复杂性、深刻性日益显现，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推进改革开放的方法论愈发系统深刻。在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历史经验

时,对于方法论层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10]223}这是党总结改革开放历史经验以来对改革开放方法论最系统的概括总结,是继承和创新的统一。一方面,其包含着继承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改革开放方法论的思想;另一方面,更加强调要以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方法论推动改革开放行稳致远。例如,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相结合、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守正创新、坚持系统观念等,在继承中国共产党一系列改革开放方法论的基础之上,习近平立足于改革开放的客观实际,科学把握改革开放的内在规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改革开放的方法论宝库。

三、中国共产党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现实启示

历史中蕴藏着智慧、体现着方法、指明了未来。党对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发展是永无止境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历史主动的精神状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着眼于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

(一) 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历史经验要善于发扬历史主动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明确指出:“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顺势而为,奋发有为,我们就能够更好前进。”^{[20]4-11}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重要成就离不开对历史主动的深刻把握。只有更好发扬历史主动,我们才能不断取得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历史成就。

1. 坚持历史自觉,充分认识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重要作用 and 地位。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是透过改革开放纷繁复杂的历史活动表象认识、把握其内在本质的认识成果,其本身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

践意义,进而决定了其重要地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始终以高度的历史自觉把握改革开放历史经验,将总结改革开放历史经验放在重要位置,先后强调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是极为宝贵的财富、弥足珍贵的财富,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2. 把握历史机遇,推动总结改革开放历史经验制度化、常态化。善于抓住历史时机总结改革开放历史经验不仅是党的优良传统,更是把握历史主动的本质要求。改革开放之初,党并未对改革开放历史经验进行过专门总结,随着改革开放的向前推进,逐渐形成了以改革开放逢十周年纪念作整体性总结和在全国党代会或中央全会作阶段性总结的历史习惯,使得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历史经验逐渐走向成熟定型。这充分反映了党对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总结和运用是一个从自发到自觉,从自觉到自信,不断发扬历史主动的过程。

3. 注重历史创造,及时主动将改革开放历史经验上升为制度。正如把握事物的本质规律一样,党对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总结和运用也是一个从浅到深、从分散到系统、从感性到理性的螺旋式不断上升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党始终将制度建设摆在改革的重要位置,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明确提出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作为在改革实践中总结出的成功经验,及时将其上升为制度成果方可使其持久稳定地发挥作用,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制度保障。

(二) 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历史经验要坚持运用科学方法

在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党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改革开放的实际出发;坚持人民立场,始终将实现和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总结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辩证思维,注重历史经验的连续性与发展性、注

重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相结合等。

1.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方法，就是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某种原则或主观想象出发，进而获得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正确认识的方法。^[21]党对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把握始终建立在尊重历史的科学精神充分认识改革开放历史的基础之上，以改革开放的历史事实作为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养料和来源。在总结改革开放二十、三十和四十年的历史经验时，对改革开放历史的回顾总结始终在前，而后才是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阐述。

2.坚持人民立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立场，也是党推进改革开放的根本立场。在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过程中，一方面，党及时将群众的创造性实践转化为经验。邓小平曾指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22]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更加重视汇聚民智民意，强调要“尊重人民群众在实践活动中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10][22]}。另一方面，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历史经验要以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经验好不好，关键要看其运用在实践过程人民群众的反馈评价好不好。要通过调查研究及时了解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并将其体现在党对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总结运用中，从而使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真正体现人民群众的呼声和情感。

3.坚持辩证思维。党始终坚持全面、系统地认识、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历史经验。一方面，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统一。尽管改革开放的不同历史阶段所面临的改革状况不尽相同，但党对于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总结和运用在根本立场、方向上始终如一，如强调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实现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等；与此同时，在改革的方法论、改革的具体布局上与时俱进，适应改革的现实需

要。另一方面，坚持总结成功经验和总结失败教训相结合。成功的经验是财富，失败的经验也是财富。对于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曲折失误，党始终不回避、不忽略，以尊重历史的科学精神认真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

（三）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历史经验要聚焦推进改革实践

改革开放历史经验是党推进改革开放的智慧结晶，不仅是历史的产物，更对当下、未来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要通过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历史经验不断强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信心信念，深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规律性认识，增强理论自觉，进而推进改革实践。

1.以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历史经验坚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信仰信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信仰信念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20][4-11]}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总结运用彰显了我们党把握改革开放历史主流本质的历史清醒和坚定改革开放历史自信的精神状态，是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必然结果。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不断强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从而为完成改革的各项任务建立强大的精神支柱。通过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历史经验，正确把握改革开放的历史主流和本质，加强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改革开放历史从而推动改革实践的能力和水平，不断强化“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信心决心。

2.以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历史经验深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规律性认识。改革开放之初，党对于改革开放的具体内容、先后顺序、部署布局等并未形成完整的认识体系。在改革开放的加快推进和总结运用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过程中，我们逐渐形成了对改革开放的地位、方向、道路、布局、方法等各方面的规律性认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六个坚持”重要原则，形成了我们党对于改革

开放规律性认识的最新成果,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和任务的完成,需要持续深化党对改革开放的规律性认识。

3.以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历史经验增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自觉。理论自觉是指理论创见的主体对理论的内容有准备的把握以及对理论的发展有充分的准备和预见的一种状态。改革开放以来,党坚持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改革开放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的探索和实践。作为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发展的经验认识,改革开放历史经验为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提供了理论自觉的重要基础,使得改革开放始终以系统科学的理论整体为指导。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EB/OL]. (2024-07-21) [2025-03-10]. 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7/content_6963770.htm.
-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3] 赵紫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EB/OL]. (2008-07-01) [2025-03-10]. https://www.gov.cn/test/2008-07/01/content_1032279.htm.
- [4]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EB/OL]. (2008-07-04) [2025-03-10]. https://www.gov.cn/test/2008-07/04/content_1035850.htm.
- [5]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EB/OL]. (2008-07-11) [2025-03-10]. https://www.gov.cn/test/2008-07/11/content_1042080.htm.
- [6]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 社,2014:514.
- [7] 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1998-12-19(02).
- [8] 胡锦涛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 [10]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11]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3-12-27(02).
-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350.
- [13]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14]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5] 胡耀邦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EB/OL]. (2008-06-25) [2025-03-10]. https://www.gov.cn/test/2008-06/25/content_1027219.htm.
- [16] 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44-562.
- [17]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5-06-27(01).
- [18] 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67.
- [19]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 [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211.
- [20]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J].党建,2021(04):4-11.
- [21] 王桂泉,徐海峰.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19:19.
- [22] 邓小平年谱:第5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648.

责任编辑:兰丰丰

自媒体时代党员舆论引导力的 功能定位与提升路径

郭倩倩

(中共福州市委党校, 福建 福州 350014)

摘要: 在数字经济时代, 党员可以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算法推荐等技术, 提升舆论引导的精准性和传播力, 为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建设注入重要力量。党员的积极参与不仅丰富了信息传播的内容与视角, 还提升了网络舆论的理性水平。党员作为主流价值观的引领者以及网络社会治理的协同者, 通过利用数字化技术实时分析舆情热点, 快速回应公众需求, 推动社会信任与共识的形成。鉴于党员的自媒体舆论引导的重要性, 可以通过优化话语带动模式、完善舆情治理体系, 以及发挥文化凝聚作用等, 为构建清朗、健康的网络空间提供坚实支撑。

关键词: 自媒体; 党员; 舆论引导; 数字经济

中图分类号: D2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072(2025)05-050-7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为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1], 提出了强化党员在自媒体环境中作用的要求, 明确了在新媒体时代坚持党对舆论导向全面领导的重要性。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 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2]可见, 党中央逐步完善了以舆论引导、意识形态安全、主流价值观传播为核心的自媒体舆论工作体系。自媒体的广泛运用, 为全民参与社会治理、为实现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技术保障和广泛的群众参与基础。^[3]作为运用自媒体平台引导社会舆论的参与者, 党员舆论引导不仅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舆论引导重要论述的有力抓手, 更是应对新时代复杂舆论挑战、维

护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有效手段。因此, 自媒体时代如何提升党员舆论引导力, 以更好地适应自媒体时代的舆论发展新要求, 成为新时代背景下亟待探讨的课题。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媒体时代党员舆论引导力的重要论述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舆论引导与媒体融合发展提出了许多重要论述, 为研究自媒体时代的党员舆论引导奠定了基础。

首先,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 形成了网络强国战略: 阐述了坚持党对网信事业全面领导的极端重要性, 明确了网络强国建设的战略目标、原则要求和国际互联网治理主张。具体包括夯实网

作者简介: 郭倩倩, 博士, 中共福州市委党校经济教研部讲师, 研究方向: 产业经济、数字经济。

络强国理念、抓好网络舆论工作、筑牢网络安全屏障、发挥信息化驱动作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等内容。^[4]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保障网络安全、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等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五点主张”^[5]，对促进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互联互通、交流互鉴、共同繁荣、有序发展和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6]其次，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的舆论引导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舆论导向正确，就能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推动事业发展；舆论导向错误，就会动摇人心、瓦解斗志，危害党和人民事业。”^[1]因此，要坚持以正确舆论引导人，做到所有工作都有利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推动改革发展，有利于增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最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提出要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使主流媒体具有强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让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昂。”^[7]因此，要完成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务，必须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注重网络内容建设，让网络空间正气充盈。

整体而言，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媒体融合发展与舆论引导的重要论述拓展了党在互联网时代的舆论工作思路，强化了党员舆论引导工作的责任担当，为新时代加强党和人民在互联网舆论中的共识提供了强大思想支持，对党员在自媒体中有效引导舆论、构建良好舆论生态以及维护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二、自媒体时代党员舆论引导力的功能定位

（一）信息权威发布与真相守护者：构建网络空间的信任基石

在互联网信息爆炸时代，党员作为舆论引导的核心主体，首要功能定位是成为权威信息的发布者和真相的守护者。自媒体平台迅速发展打破了信息传播的单一渠道，带来了多元信息源与复杂观点的交流，这带来了信息失真、传播速度快且难以控制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党员信息的权威性不仅是社会信任的基石，更是稳定舆论场域、引导公众认知的核心力量。商业平台算法推荐形成了“信息茧房”，自媒体流量逻辑催生出“后真相传播”，逐渐改变了传统社会的信息认知框架，信息权力结构失衡已威胁网络空间秩序。随着社交媒体平台的快速发展，网络空间充斥着海量信息，其中不乏虚假新闻、误导性内容和人为制造的舆情事件。党员承担着维护公共利益的责任，必须通过权威信息发布保障信息传播的时效性与准确性。这种功能定位的深层价值在于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的信息供给机制，抵消市场机制在信息传播领域的负外部性，防止网络空间陷入“真相荒漠化”危机。从社会治理角度看，权威信息发布构成数字时代风险防控的“免疫系统”，能够有效阻断虚假信息引发的社会认知紊乱，维护社会心态稳定。例如，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谣言往往以碎片化、情绪化方式传播，加剧公众恐慌并削弱社会信任。党员依托行政体系的公信力，通过政务新媒体平台、新闻发布会等官方渠道，第一时间发布经过核实的准确信息，有利于压缩谣言传播空间。

自媒体时代赋予了信息发布机构更为高效的技术工具和传播渠道，例如通过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直播平台等多渠道、多层次地发布权威信息。党员可利用自媒体的快速传播特性扩大信息的覆盖面，将权威信息与理性讨论置于推荐优先级较高的位置，让公众更易获取官方权威信息，提升公众

对权威信息的接受度。通过开放讨论、实时回应公众关切，在多层次的互动中强化对官方信息的信任，避免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出现偏差或误读。此外，通过在自媒体平台邀请专业人士、学者等参与权威信息的解读与传播，利用多主体的协同发声进一步增强信息的公信力。党员信息的权威性在自媒体舆论引导中不仅仅是制约虚假信息、谣言传播的利器，更是保障信息流通顺畅、舆论场健康有序的基础。因此，自媒体时代党员的舆论引导力的定位应明确为多渠道信息整合与权威信息维护的结合，既保障官方信息在舆论场的核心地位，又促使公众在理性对话的氛围中吸收权威信息，从而实现自媒体时代更广泛、深层次的社会共识构建。

（二）主流价值观的引领者：构筑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屏障

在自媒体舆论引导中，党员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尤其在正面宣传和推广主流价值观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随着自媒体的广泛普及，信息的传播速度和影响力大大增加，舆论导向在社会治理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自媒体不仅是信息传播的工具，更成为了塑造社会认知、引导公众舆论的重要渠道。在多元价值碰撞的网络舆论场中，党员承担着主流价值观引领者的战略使命，在这一过程中，既是传播正能量的核心力量，也是主流价值观的引领者。当前网络空间存在历史虚无主义、极端民粹主义等思潮，部分境外势力通过文化产品、网络水军等方式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党员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主动设置议题，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转化为网络话语。例如，通过可视化数据与相关展示资料呈现脱贫攻坚、科技创新等领域的主题宣传，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具象化的叙事逻辑，有效对冲西方话语体系中的偏见。

党员作为主流价值观的引领者，该定位的战略必要性体现于自媒体时代下的价值传播呈现“去中

心化”与“再中心化”并存的悖论。虽然网络赋权催生了价值表达的多样性，但算法权力与资本逻辑正在重塑新的价值垄断格局。党员舆论引导的实质是防止网络空间陷入“价值殖民化”危机，通过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文化符号体系，在文明对话中掌握价值定义权。从国家文化安全维度看，这种功能定位是应对“文化冷战2.0”的关键屏障，能够有效抵御西方借助自媒体平台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维护国家文化主权与精神独立性。因此，党员应作为主流价值观的引领者，借助自媒体平台进行正面宣传，积极展示党的方针政策与国家发展成果，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帮助公众建立积极的社会观念和认知，增强社会整体向上的氛围。党员通过强化主流价值观，有利于引导社会成员关注国家建设、增强信心，从而形成团结向上的舆论环境。此外，党员利用短视频、直播和交互式内容等互联网传播形式来积极推广公平、正义、诚信、进取等核心理念，在社会中树立正面标杆，营造良好的网络空间，促使人们向真、向善、向美靠拢，引导广大公众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

（三）网络社会治理的协同者：推动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

媒体技术的发展推动全球进入数字化全媒体时代，由此开启了“全球、全民、全媒”的媒体传播新格局，“短、平、快”成为信息传播新特点。在此情势下，党员的舆论引导亟须从传统“单向管控”向“协同治理”转型，其核心功能定位之一在于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一转型的深层动因源于网络社会生态的复杂性，自媒体技术使得信息传播主体从单一中心转向多元节点，网络暴力、群体极化、算法歧视等新型治理难题，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已难以应对。党员作为舆论治理体系中的“活性因子”，承担着链接多元主体的枢纽功能。党员通过个体化的社会资本网络，能够突破部门壁垒实

现治理资源的重组。例如，在处置网络谣言事件时，具有政府部门工作背景的党员，既能快速对接公安部门的溯源技术，又能协调属地自媒体渠道进行联合辟谣，还能发动社区党员志愿者开展线下科普。这种多线程、多角色、多渠道的协同治理能力，是将党组织的动员优势转化为治理资源的整合效能。

自媒体平台为公众提供了便捷、广泛和平等的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为实现多元主体间的对话创造了新的技术条件和社会环境。首先，党员在自媒体环境中具有推动多元主体信息交流的作用。党员在自媒体平台上不仅是信息的传递者，更是多群体沟通的桥梁。党员利用自媒体平台推动不同群体在同一空间中交汇观点，形成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交流网络，从而促成对话与理解，缓和彼此之间的认知冲突，推动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可见，通过推动理性对话与传播多元信息，党员能够在自媒体平台上有效引导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其次，党员在自媒体环境中具有对多元主体进行思想引领的作用。通过加强内容审核和互动引导，利用技术工具过滤不实信息和极端言论，使舆论引导的功能从简单的信息传播，转向复杂的观点交流和价值传递。这种模式不仅提升了群众的参与感和责任感，还促进了公共领域的健康发展，体现新媒体时代下的现代治理智慧。最后，党员在互联网环境中具有帮助多元主体进行议程设置的作用。党员能够利用自媒体平台将社会关注的焦点与重大议题合理排序，引导多元主体在理性框架下对议题进行讨论，使得各群体意见能够集中在关键问题上，与公众开展更具深度和互动性的对话，将情绪化的讨论逐步引导至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上。因此，党员应发挥“元治理者”作用，积极搭建多方参与的对话平台，将平台企业、社会组织、网民等多元主体纳入治理网络，形成风险共担、责任共负、成果共享的协同治理格局。

三、自媒体时代党员舆论引导力的提升路径

(一) 优化话语带动模式，提升党员自媒体舆论引导的整体效果

1. 确保信息来源，保障话语带动的权威性。这是党员在自媒体舆论引导中树立公信力和发挥积极影响的基石。一是要利用数字技术对信息进行筛选和确认。党员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加强信息来源的追溯与确认。例如，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信息的准确性进行智能检测，利用区块链技术记录信息的来源路径，确保传播的信息具有可追溯性和真实性，从而避免来源模糊的信息传播，以严谨态度确保信息内容的准确性，避免错误信息误导公众。二是要确立与自媒体时代适配的责任意识。数字经济时代的信息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党员在自媒体上发布的每条信息都可能产生广泛影响。因此，党员需强化在数字化舆论场中的责任感，确保发布的每条信息都具有权威性和事实性，使其成为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力量。党员在自媒体上代表的是党和人民的利益，不仅要传达党的声音，更要以扎实的内容和专业的态度赢得社会的广泛认可。三是要在实践中不断提高与自媒体技术融合的专业素养。在数字经济赋能下，信息发布不仅需要事实依据，更需要适应网络传播特点的话语体系来增强内容的亲和力和感染力。党员可以利用自媒体技术研究分析目标受众的偏好与行为模式，设计更贴合受众需求的表达方式。通过保证信息来源的权威性和话语带动的可信性，党员在自媒体舆论引导中不仅是舆论的参与者，更是正能量的传播者，为党和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念在网络空间的传播提供坚实保障。

2. 推动内容创新，增强话语表达丰富性。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推动内容创新、增强话语表达的丰富性，是党员在自媒体舆论引导中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舆论引导亦是如此。”^[8] 推动内容创新，首先要确立积极开放的创新意识。

党员应以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为核心，从群众关注的实际问题出发，灵活运用自媒体表达手段，将严肃的政治内容转化为生动的群众语言，让党的声音更接地气、更具吸引力。二是要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基于自媒体空间丰富多样，党员在舆论引导中应结合短视频、直播、互动问答等新兴数字化传播形式，使党的主张通过多维展示、即时互动实现立体化传播，不断扩大影响力。三是要在创新中保持党的思想路线。内容创新并不意味着放弃原则，而是要通过创新手段更好地传播主流价值观，确保内容的思想性、准确性与时效性，使之成为群众理解党和国家政策的桥梁。因此，在数字经济赋能下，数字创新成为舆论引导的核心动力，党员可以借助自媒体手段和平台优势，更好地传达党和国家的声音，激发群众的参与热情，为党和国家政策的传播打造更强大的舆论支持。在此过程中，自媒体技术不仅有助于升级传播手段，更有利于社会各界形成共同理解和支持的舆论氛围，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拓展传播渠道，确保话语带动广泛性。在自媒体时代下，拓展传播渠道、确保话语带动的广泛性，是党员在自媒体舆论引导中扩大影响力的有效路径。一是要充分利用各类自媒体平台，既包括主流媒体如新闻网站和微信公众号等，也应涵盖短视频、直播平台等新兴自媒体，确保党的声音在多种渠道上传播，以触达更多受众，尤其是青年群体和网络活跃人群。二是要拓宽群众反馈渠道。党员应利用自媒体手段广泛收集群众意见，主动倾听群众声音，以人民的期待和需求为导向，不断优化自媒体内容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并在群众中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传播矩阵，确保内容更加生动、信息传递更为及时。三是数字技术赋能平台间的资源整合和协作创新，党员应主动推动平台之间的内容联动和资源共享，通过联合发布重要信息、策划跨平台传播活动等方式，提升传播效率和影响力。同时，

党员在自媒体中还应保持舆论导向的正确性和权威性，以确保传递的内容符合党的方针政策和主流价值观。通过数字化多渠道联动、强化覆盖，党员能够在舆论引导中充分发挥影响力，为网络空间营造积极向上的主流声音奠定基础，有效推动网络舆论环境的优化，为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舆论支持。

（二）完善舆情治理体系，筑牢党员自媒体舆论引导的安全底座

1.加强舆情动态监测强度。维护舆论阵地，关键在于掌握舆情动态，做到心中有数。从舆情管理的视角来看，一是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实现对自媒体平台舆论的实时监测和动态跟踪，确保信息流动透明、及时，为舆情防控提供数据支持。基于自媒体平台的海量数据与多维度分析模型，可以更加精确地捕捉网络舆情的动态变化，优化预警机制，确保党员能够迅速掌握舆论风向，辨识可能产生的舆情风险，提前做出预防应对。二是要进行舆情研判和及时反馈。依托智能化技术构建的自媒体平台，可以实现自动化的数据采集、分类和分析，极大提高舆情研判的效率和精准性。党员需要通过定期分析网络舆论动向，形成科学、规范的风险评估意识，确保在舆情爆发时能够快速响应，以理性、专业的方式进行危机处理，维护信息权威性，防止负面舆情的扩散和误导。三是要强化党员的舆情意识和危机处理能力，党员在自媒体平台上既是内容的发布者，也是敏锐的观察者，能够有效识别和应对潜在的负面舆论。通过定期培训提升党员的舆情分析和引导技巧，使其在复杂多变的舆论环境中始终把握话语主动。总之，党员在自媒体平台上需要充分利用数字工具，提升自身的舆情管理能力，熟悉智能化舆情引导手段，筑牢党员引导舆论的安全屏障，确保自媒体舆论环境的稳定性和可控性，为营造清朗、健康的网络空间提供坚实支撑，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舆论导向提供有力保障。

2.树立舆论引导的正面形象。新媒体时代,主流媒体对主流价值观传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其舆论引导对于塑造公众的价值导向具有关键作用。^[9]因此,党员在自媒体平台上要树立舆论引导的正面形象。首先,完善舆情分析评估体系。舆情评估不仅是信息的收集,更是科学分析和有效引导的深层次结合。完善舆情分析评估体系,是党员在自媒体舆论引导中保持科学性与实效性的基础。党员必须利用自媒体技术进行舆情评估,通过整合来自社交媒体、电子商务和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的多源数据,构建高效的舆情数据采集与处理手段,实现对热点和话题的精准识别,将纷繁复杂的信息转化为可操作的分析成果,为舆论引导提供决策依据,从而更精准地捕捉舆情变化的趋势和影响力。其次,党员需要强化主流价值观,引导社会成员关注国家建设、增强信心,形成团结向上的舆论环境。党员应借助自媒体平台持续强化正面宣传,清晰阐明主流价值观的重要性,以多样化的宣传形式引导舆论走向,使自媒体成为弘扬党的主张、传播核心价值的重要平台,为社会和谐和国家长远发展贡献力量。再次,展现党员形象,发挥榜样激励作用。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要推动党员在新形势下发挥模范作用,强调要在各类媒体尤其是自媒体平台上树立良好的党员形象,引导网络舆论朝着正能量方向发展。这就要求党员在自媒体时代下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重视互动沟通,注重倾听人民声音,反映群众呼声,以真诚、专业、负责任的形象赢得信任与支持。并且通过真实行动展示党员形象,以一言一行在自媒体中树立榜样,彰显党员的责任与担当。总之,党员要在自媒体环境中树立舆论引导的正面形象,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网络空间中的广泛践行,提高网络文明程度,构建具有强大吸引力、感染力、约束力、公信力的清朗网络空间。

3.加强多方协同合作关系。首先,党员要加强

与各方媒体的交流合作。以党建为纽带串联起政务新媒体、主流媒体和优质自媒体,形成协同合作关系,实现多方信息的实时交换和协作,避免信息孤岛现象,进一步增加舆论引导的多元化渠道。其次,党员应积极与社区、学校、企业等社会各界建立合作关系。党员通过走访收集社情民意、政策解读、新闻报道转载等方式,把多方信息资源汇聚成传播正能量的“同心圆”,让党的声音真正走进千家万户。通过自媒体宣传形成线上线下的联动效应,带动基层力量共同参与网络舆论的引导工作,增强舆论引导的感染力和广泛性。最后,党员要与各部门建立多层次反馈联系。自媒体工具可以实现多维度的实时反馈,根据不同部门的信息反馈情况,及时调整思想宣传方式,确保舆论引导始终符合公众需求和舆论发展方向。因此,通过强化多方协同合作关系,党员不仅能在自媒体舆论引导中树立起权威的声音,还能够有效应对舆论变化,凝聚社会共识,形成推动清朗网络空间的强大合力。

(三)发挥文化凝聚作用,夯实党员自媒体舆论引导的文化根基

1.弘扬优秀文化,增强党员舆论引导的责任。

文化自信是主体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对自身文化的认同、肯定和坚守。^[10]自媒体时代下,党员要发挥舆论引导作用来弘扬优秀文化,首先,需要增强文化认同感,深刻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将其作为传播正能量、引导社会风尚的精神支柱。利用自媒体平台宣扬中华文化中的家国情怀、诚信友善等核心理念,帮助党员在价值引领中凝聚人心、形成共识。其次,党员应利用自媒体手段推动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化,使其在当代社会中焕发新的生命力。自媒体时代要求党员善于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多样化的表达方式,使中华文化的精髓在网络传播中生动呈现,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和认同。再者,党员应将优秀文化的弘扬与时代的创新需求相结合,通过跨界融合,与数字科技、艺术形式结合,

打造既有深度又具活力的数字文化产业，满足年轻一代对文化认知的需求，增强文化引导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最后，党员应利用自媒体平台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软实力。自媒体平台提供了全球化的传播渠道，党员可以通过自媒体平台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例如，通过建立国际化文化互动社区实现中外文化的交流，从而推动中华文化走向国际，进一步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2. 讲好中国故事，提高党员舆论引导的内涵。

讲好中国故事是增强国家软实力和塑造国家形象的关键所在。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不仅需要传统的传播方式，更要善于借助自媒体技术手段，实现内容的精准投放和广泛覆盖。首先，党员要充分挖掘本土实践中的真实案例，用人民的奋斗故事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从平凡人物的经历中展现社会进步的成就，使故事更加接地气。其次，通过自媒体手段提供的多维度数据分析，可以深入挖掘各地基层的鲜活事例，将科技创新、扶贫成就、生态治理等代表性领域的成果纳入讲述内容，展示中国在解决全球性问题方面的智慧。最后，党员应注重故事的文化认同感，通过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如家国情怀、团结协作、勤劳勇敢等，让中国故事成为激励人心的情感纽带。总之，自媒体技术为中国故事的创作和传播提供精准支持，有利于中国故事引发广泛共鸣，增强文化认同，从而形成积极正面的舆论氛围，助力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展现真实、包容、积极的国家形象。

3. 构建文化阵地，促进党员舆论引导的共识。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文化阵地的构建需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数字平台，实现内容的高效传播和互动共建。首先，党员需要建立自媒体平台的互动机制，鼓励用户在评论、分享中参与讨论，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使文化阵地不仅是单向传播的窗口，更成为公众交流思想、共建价值观的平台。其次，打造对外交流的文化阵地，党员要在

自媒体平台上积极推动中外文化的平等对话，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同时尊重不同文化的多样性，避免单向度的文化输出，使文化交流更加开放包容。再者，党员可以利用多语言翻译技术和国际社交媒体平台，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范围。在国际舞台上讲述中国的发展经验和进步时，既要尊重国际受众的思维习惯，又要保持中国视角，通过中西合璧的叙事方式，使故事具有普遍性和吸引力。最后，党员应注重与其他文化阵地的联动，构建跨平台的数字化传播网络，通过策划专题系列、文化讲座等栏目，扩大自媒体内容创作的辐射力。因此，通过线上线下的文化交流互动，党员可以在更广泛的空间中影响和带动社会舆论，增强文化阵地的广度和深度，最终构建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影响力的舆论引导力量，从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

结语

在自媒体时代下，提升党员的舆论引导力不仅是加强党员队伍素质的重要任务，更是积极履行党在新时代的社会责任，推动社会和谐与舆论生态建设的有效途径。党员需要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自媒体领域实现对舆情动态的实时分析与精准引导，提升舆论引导的效率和精准度。唯有紧跟时代潮流，持续创新引导理念、优化传播方式、增强互动交流、提升内容质量，党员才能在复杂多变的网络环境中发挥积极作用，引导公众理性表达，促进主流价值观的广泛传播。因此，党员应始终牢记肩负的使命，以更敏锐的观察力、更扎实的执行力、更广泛的包容力，主动应对互联网舆论中的各类挑战，积极构建清朗、健康的网络空间，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强大的思想和舆论保障。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下转第74页)

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社会治理的四重向度

曹刚川 聂兴旺

(湖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文化是“国之大者”的重要构成,亦是治之要者的核心要素。习近平文化思想从治理资源、治理场域、治理效能和治理保障的向度推动了社会治理优化创新。这具体表现为强调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治理潜能、激活革命文化精神动能、增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效能,全面夯实社会治理的文化根基;要求聚焦乡村、边疆和网络三大场域,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营造清朗澄澈的互联网环境,有力助推社会治理纵深发展;指明在关注文化“创新力”“辐射力”“驾驭力”的过程中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构建大众化话语体系、规制文化资本走向,深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倡导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格局、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铸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切实筑牢文化善治的坚实保障。深入探究习近平文化思想何以引领社会治理,既能拓宽其研究视角,彰显中国特色治理道路的思想文化力量,也能为构筑具有现代文明底蕴的社会治理体系提供价值坐标与实践方略,进而谱写新时代高效能治理新篇章。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社会治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 G1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072(2025)05-057-10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源性支撑,关涉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1]当前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面对利益格局深刻变革,多元思潮交织激荡和人民精神新需要,社会治理模式亟须升级转型和完善。作为社会和谐的“黏合剂”^[2],文化能够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实现社会善治。重视文化和社会治理的作用,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理

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人继承与创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形成了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勾勒出文化强国的图谱和光景,为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提供根本理论遵循和行动指南,而且从文化向度推动中国特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深入探讨习近平文化思想何以引领社会治理,既能够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道路的思想文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高质量发展主题委托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GD23WTD03-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曹刚川,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聂兴旺,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化力量，也能促成以文资治，全面发挥文化在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过程中的结构性力量，为构筑具有现代文明底蕴的社会治理体系提供价值坐标与实践方略，进而谱写新时代高效能治理新篇章。

一、文化治理资源整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社会治理的基本前提

优质文化资源的整合开发是“以文促治”的基础环节。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庆桐城市考察时指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协同发力，打牢社会治理的文化根基。”^[3]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治理潜能，激活革命文化精神动能，增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效能，推动三大文化资源系统整合、活力涌流，为社会治理注入价值养分，全面夯实当代社会治理的文化根基。

（一）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治理潜能

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其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马克思从历史继承性角度看待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对此，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5]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既非另起炉灶，亦非“西方化”翻版，而是扎根历史传统、创造性转化古代治国智慧，实现植根本土与守正创新辩证统一的现代化。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基础上形成的传统文化积淀着丰富的教化规范、道德理念和人文精神，与现代社会治理相互契合又彼此成就，是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文化根基与价值支撑。一方面，二者相互契合，传统文化蕴含的民本、和合、礼法等治道思想与当代治理理念的以人民为中心、多元协商、德法共治等原则相互契合。以“和合善治”理念为例，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六尺巷时强调，要弘扬讲求礼让、以和为贵的传统美德，并

创造性凝练出新时代六尺巷工作法，为社会和谐稳定注入历史智慧滋养。^[3]另一方面，二者相互成就，传统文化在赋能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能焕发出历久弥新的当代价值，社会治理又在优秀传统文化的润泽下提质增效。因此，创新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必须追根溯源、汲取养分，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治理潜能。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将传统文化精华融入治国理政方方面面，既开辟了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新格局、新境界，推动形成新时代崇尚和、善治有序的治理局面，又使传统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6]。虽然传统文化资源对于社会治理意义重大，但必须始终秉持“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7]态度，既系统萃取其中有益于规范社会行为、化解社会矛盾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赋予其现代化社会治理意蕴；也必须警惕将传统文化治理资源简单等同于现代治理方案的认识误区，对其中与现代文明相悖的消极因素保持理论自觉与实践审慎。

（二）激活革命文化精神动能

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8]作为党领导人民在伟大革命斗争实践中凝结成的文明瑰宝，革命文化“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任何时候都不能丢”^[9]，其不仅承载党的初心和使命，是艰辛而光辉的历史见证，同时凭借内蕴的革命精神、道德精髓等内容资源，成为当代社会治理的精神动力源和治理支撑点。对此，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既要注重有形遗产的保护，又要注重无形遗产的传承，大力弘扬红色传统。”^[10]这为推动革命文化繁荣发展与社会治理水平提升有机统一明确了实践方向。因而，激活革命文化治理动能的过程不仅涵盖革命遗迹、文物等物质形态功能的发挥，也包括革命文化经验、方法和精神等无形资源的传承发扬。从物质形态来看，要推进革命文化遗产的开发与保护，例如通过系统整理、深入研究革命文献资料，修缮名人故居、创建博物馆和展览馆等纪念空间，为革命文化有效

赋能社会治理夯实物质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将革命文化工作深度融入党和国家重大事业，多次考察西柏坡、井冈山、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等革命圣地，就革命遗产保护等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呈现崭新面貌，为革命文化生命力和影响力的迸发提供了具象载体。从非物质形态来看，不仅要善于继承与发展中国共产党革命年代治理实践的宝贵经验和工作方法，为新时代社会矛盾化解提供镜鉴和启示；而且应当充分提炼革命文化的精神要义，“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11]，以革命先辈的优良革命传统和崇高理想信念，提升广大社会成员的思想觉悟、道德品质，进而实现广泛的政治引领、价值导向、行为规范等独特治理功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将革命文化资源转化为“开展爱国主义和党性教育的生动教材”^[12]，坚持知识传授与情感浸润并重，推动革命精神融入血脉、根植心灵，为筑牢党的执政根基、坚定人民群众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提供有力支撑。总之，激活革命文化治理动能，实现从革命历史记忆向治理资源的形态跃迁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社会治理的应有之义。

（三）增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效能

先进文化是社会和谐进步的灵魂。基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揭示了文化先进与落后之分，并深刻阐释其判断标准，即真理、价值、历史尺度。经由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结合和创新形成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人民大众愿望、把握文化发展规律，是真理、价值和历史尺度统一的先进文化形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仅是我国文化强国建设的战略根基，更因其具备的价值引领力与社会整合效能，成为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的核心要素和本质特征，深度融入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整体逻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13]这赋予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丰富的治理意蕴。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突出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明确必须增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效能，强调唯有将先进文化的精神力量转换为社会治理的实践力量，方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治理支撑。具体而言，一方面，强化价值驱动，以核心价值观为社会治理导航定向。核心价值是文化的精神实质和显著标志，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中国“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7]54}。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注重“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经济发展实践和社会治理”^[14]，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15]。正是在这一基础工程的贯彻落实下，主流价值和舆论在各种文化交汇融合中进一步巩固壮大，全党全社会思想上更加团结统一，全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社会治理效能显著提升。另一方面，强化需求驱动，以先进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文化需要为社会治理注入内在动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源于人民、服务人民。要增强其引领效能就必须厚植人民精神生活沃土，为先进文化潜在治理效能的释放提供坚实依托。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呈现蓬勃发展的崭新气象，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持续满足，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更加稳固。

二、治理场域延展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社会治理的必然趋向

场域是治理的空间载体，其内涵与外延必然随着时代发展与社会需求不断延展深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洞察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治理格局演变，主动适应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强调要将“以文促治”

这一方法延伸运用至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和前沿地带，这表现为既要深耕乡村这一关键区域，也要固守边疆这一核心地带，更应关注网络这一新兴空间。三大场域各具特性，共同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赋能社会治理的立体化实践版图，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实践伟力在治理领域的生动彰显。

（一）关键区域：聚焦乡村治理，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作为社会治理的基层单元和关键区域，农村是否“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16]，直接影响社会治理的整体质量。“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17]，优秀乡村文化“能够提振农村精气神，增强农民凝聚力，孕育社会好风尚”^[18]，这深刻揭示了乡村文化繁荣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根基所在，更是维系乡村良性运转、保障治理高效能的关键支撑。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与治理现代化同频共振，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延展和内在要求。习近平文化思想凝结着中国共产党对“三农”工作的文化思考和理论探索，要求从外部扩大农村文化服务总量，从内部激活现有文化存量，从效能层面释放文化治理活力，拓宽了文化赋能乡村治理的崭新思路。一是基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聚焦“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19]，为乡村文化治理系统外部扩容。相较于城市，乡村文化治理面临着主体流失、资源短缺等困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城乡文化发展鸿沟，畅通城乡文化要素流动，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乡村，促使乡村公共文化治理体系建设逐渐朝着“有标准、有人才、有网络、有内容”的方向纵深发展。二是依托内生性资源，系统挖掘和保护农耕文明并进行现代性转换与价值重构，实现对现有文化存量的内部创造性激活。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与城市文明的冲击，传统农耕文明与乡贤文化日渐式微，亟须构建新的乡村伦理秩序与价值规范。而这种文化心理

秩序唯有建立在“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20]的基础上，方能发挥其联系乡村人民情感和团结乡村力量的现实功能。其三，以文化浸润为抓手促进乡风文明建设，构建文明有序的乡村文化生态，切实释放文化资源的治理效能。良好乡风规约经济、生态、治安等多方面秩序。新时代以来，各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载体，持续深化移风易俗，在培育良好乡风、完善乡规民约、提升农民科学文化素养等方面，绵绵用力、下足功夫，推动乡村焕发文明新气象、展现发展新风貌。

（二）核心地带：强化边疆治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边为国垣，垣固邦兴。基于多民族聚居、毗邻多国等特殊特性，边疆始终是党治国理政的战略前沿与治理要地，不谋边疆治理则无以谋国家治理全局。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了文化建设方面的“十四个强调”，其中“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不仅是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边疆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求，为新时代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注入了不竭动力。作为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创新成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旨在培育中华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共同体命运意识，其精神基础和实践前提在于“增进文化认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21]⁶⁶。将其延伸到边疆治理依旧适用。新时代边疆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关键，在于将文化认同作为治理的“根脉工程”，推动治理模式从“物理整合”向“精神共生”跃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文化润疆”工程，并将其与依法治疆、团结稳疆、富民兴疆并列作为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强调弘扬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登山精神等西藏特色时代精神。其根本考量都在于强化边疆各族群众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意识。而这种共同性意识的形成，必须以

消除民族间和疆域间的文化隔阂，构建多元一体的文化共识为基础。这就要求，一方面，不断夯实中华文化的共同文化心理基础。“中华文化认同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21]67}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推进边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就是要通过中华文化符号的具象化、共同文化记忆的生活化，不断“构建和运用中华文化特征、中华民族精神、中国国家形象的表达体系”^{[21]68}，让共同体意识“有形、有感、有效”，让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历史叙事深入边疆各族群众之心。另一方面，在交流交融中拓展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是主干，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21]67}因而，还要坚持包容文化差异，着力搭建多层次文化交流平台，积极培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嵌格局，促进各族民心相知相通相亲，最终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治理愿景。

（三）新兴空间：优化网络治理，营造清朗澄澈互联网环境

网清则利民，浊则害民。伴随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网络已深度融入社会生产生活，并日益凸显民生与意识形态双重属性，网络治理由此成为社会治理的重点领域与新兴场域。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社会治理突破传统物理空间限制，向虚拟场域延伸拓展，“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21]76}，“网络文明是新形势下社会文明的重要内容”^[22]。网络空间作为亿万民众共同精神家园，其治理是一项极为复杂而系统的综合工程，具有与现实社会治理的共性特征，又因自身特殊性需要理性审慎；既需制度法治的刚性保障，又需思想文化引领的柔性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网络文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坚持走中国特色治网道路，推进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建设，使网络空间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清朗澄澈的网络蓝图徐徐展开。习

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把握网络文化治理内在规律，推动网络文化内涵式发展与规范性建设相统一。从民生属性看，注重网络文化发展的内涵式建设，着力“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21]77}，为亿万网络群众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习近平总书记对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明确提出“强治理惠民生”的工作导向。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就要重点“加强网络文艺精品创作，推出更多健康优质的网络文艺作品”^[23]，持续以先进而非落后文明成果滋养和丰富亿万网民群众的精神生活。从网络发展的意识形态属性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注重网络文化生态的规范性建设，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网络空间是一个巨大的舆论场，其治理需确立“举旗帜聚民心”的目标，努力实现“防风险保安全”稳定局面。一方面，要毫不动摇地贯彻落实“党管互联网”“正能量是总要求”^[24]等理念，把准网络文明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要提高网络文化法治化程度，推动网络规章和政策的落实，规范网络文化生态。正是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引领下，新时代网络主流思想巩固壮大，网络文化生态持续好转，网络安全篱笆得以铸牢，助力网络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三、治理效能提升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社会治理的关键驱动

治理效能提升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赋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着力点。面对新形势下文化领域的新特征、新挑战，必须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深刻把握文化发展规律，在关注文化“创新力”“辐射力”“驾驭力”的过程中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构建大众化话语体系、规制文化资本走向，进而创新文化治理技术路径，增强文化传播力影响力和维护文化产业良性生态，最终为推动构建更高效、更精准、更可持续的社会治理文化支撑体系创造有利条件。

(一) 注重文化“创新力”：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创新文化治理技术路径

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25]“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25]，这深刻揭示科技创新与文化融合的必然性，并指明数字化浪潮下文化治理效率提升的实践路径。而作为新质生产力在文化领域中的具体呈现样态，文化新质生产力正是以技术革命性突破为基础、创新主导、生产要素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的先进文化生产力质态，^[26]不仅是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也凭借其解决文化供需矛盾和提升治理精细化水平等方面的显著效能与创新活力，逐渐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背景下提高文化领域治理能力的关键驱动力。强调要发挥文化“创新力”，以文化新质生产力助力社会治理，就是要将先进技术与文化建设的各要素相结合，并不断进行加工和再创造，以期激活文化对社会发展和稳定的作用。一方面，着眼“文化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25]，持续解决好文化领域的供需矛盾。总体而言，近年来我国文化软实力显著提升，但不平衡不充分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这仍是文化领域治理需要重点关注的重要议题。文化新质生产力在破解文化领域“有没有”“缺不缺”的结构性矛盾时，通过搭建综合文化资源和服务平台，推动先进文化资源的储存、转化与发展，并促进其向基层和乡村下沉；在解决文化“好不好”“优不优”的品质提升问题上，则以虚拟现实交互等科技为核心驱动，赋能高质量文化产品的生产创作。另一方面着眼“构建文化数字化治理体系”^[27]，这要求以文化新质生产力为支撑，持续提升治理精细化水平。比如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工具对文化安全领域实行动态监测，对文化数据要素市场有效监管，并不断提高文化数字化服务效能，从而推动文化领域治理模式由“粗放管控”向“精准服务”转换。

(二) 着眼文化“辐射力”：构建大众化话语体系，增强文化传播力影响力

文化要切实发挥润泽人心和凝聚共识的治理效能，既不能束之高阁、囿于象牙塔，也不能曲高和寡、脱离生活场，而是要构建大众化话语体系，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让人民群众可感可知、可亲可近。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28]。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将人民性置于核心位置，“忘记了人民，脱离了人民，我们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一事无成”^[29]。从话语创造来看，无论是文化内容抑或形式都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原则。“内容为王”是传播的基础，坚持文化内容上的人民中心原则就是要准确把握人民需求，以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为创作源泉，做到“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21]82}，让文化的百花园不断为人民绽放；坚持形式上的人民中心原则就是要将真实性和艺术性结合起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30]，既歌颂美好又直面挑战，充分激发人民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美好愿景和奋斗热情。从话语表达来看，要坚持话语表达的普及性。要多采用人民群众听得懂、易接受、习惯性的思维逻辑和叙事方式，注重将正式文本语言有效转译为人民群众通俗易懂的朴实表达，不断“创作生产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21]81}，形成既新鲜活泼又喜闻乐道的文化气派和文化风格，增强人民的情感共振。从话语的传播来看，要做好宣传，推动文化传播实现从单一渠道到全媒共振的转换。宣传的方式与手段是提升文化影响力的重要因素，文化的治理效能的发挥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传播的效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方式展示中华文化魅力”^[31]，使优秀文化的传播触手可及、优秀文化的影响无时不有，充分增强先进文化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感召力和行为引导力。

(三) 强化文化“驾驭力”：规制文化资本走向，维护文化产业良性生态

文化生态健康与否直接关系民族复兴的精神根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资本正深刻重塑我国文化产业的生态格局。作为资本在文化领域的具象化延伸，文化资本虽能带动各类文化要素高效集聚和优化配置，但因其“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32]，便逐渐暴露其本身的无序扩张性和激进逐利性，并衍生出泛娱乐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现实问题。因此，持续深化对我国文化资本及其作用的认识，规范引导文化资本健康发展，已成为提升文化资本治理效能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文化产业发展既要发挥资本的“有用性”以释放文化发展活力，亦要不断强化对文化资本的驾驭，遏制其负面效应，使之始终服从和服务于人民和国家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要正确把握“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21]81}，这一论断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产业发展方向的深邃思考，也为新时代驾驭文化资本提供了根本遵循。利用资本是驾驭文化资本的前提，首先“要历史地、发展地、辩证地认识和把握”^[33]文化领域内资本的存在，尊重和鼓励社会资本介入文化生产，不断发挥其作为市场要素的正向作用，持续“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当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文化产业“绝不能沾染铜臭气，当市场的奴隶”^{[21]83}。

“以人民为中心还是以GDP为中心，以内容为中心还是以资本为中心”^[34]，这一命题是文化产业发展必须回答好的基本命题，从根本上规定了治理文化资本的社会主义价值指向，即要把能否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能否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等社会效益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根本评判标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规范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推动各类文化市场主体蓬勃成

长，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获得感显著提升，文化产业生态焕发盎然生机。

四、治理保障嵌入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社会治理的稳固支撑

没有坚实的治理保障就没有治理现代化的稳固根基。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为社会治理注入价值引领与精神动力，更通过倡导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格局、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铸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等实践路径，有效激活“文化善治”的内生动力、创造活力与安全能力，从而为实现“以文促治”提供强劲有力的主体力量、科学完备的制度保障和牢不可破的思想防护，有力绘就了文化繁荣发展的生动图景。

(一) 主体保证：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格局，凝聚文化治理强大合力

多元主体协同是“强国善治”的重要基石。治理与管理的本质区别在于，它是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为运行主体的多元共治过程。因此，凝聚多方合力、打造治理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治理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文化思想既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文化治理的全面领导，又突出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既要求在治理场域中政府必须“有为”，又明确社会必然“有位”。第一，立足政党这一领导力量，一方面“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21]17}，以确保各项任务目标朝着正确方向有序推进、全面落实。作为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政党，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一百年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涤荡文明尘埃，振奋民族精神，实现了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另一方面，要着力提升党领导文化工作的科学化水平和能力。伫立在新的时代境遇，中国共产党又始终保持清醒、审时度势，迸发空前的历史主动精神，切实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两个结合”中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不断巩

固文化主体性，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第二，立足人民群众这一主体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执政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治理活动，都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拜人民为师。”^[35]只有不断落实“人民之治”，把人民群众作为创造者、评判者、享有者，激发人民群众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为推进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赢得最可靠、最广泛、最活跃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第三，坚持政府负责与全社会广泛参与的统一。社会治理责任在政府，活力在社会。其中，政府效能直接关乎文化治理成效。为此，应“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握有所为与有所不为的边界，依法履行文化工作宏观管理职责，聚焦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有效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强化政策保障。同时，社会力量是文化治理的重要依托。当前，扩大多元社会力量参与，深入推进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合作是我国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走向^[36]。

（二）制度革新：深化管理体制体制改革，释放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37]体现在文化领域，唯有在科学制度框架内推进管理体制体制改革，方能充分释放文化创新创造的内在活力，进而为“以文化人”“以文促治”“以文兴邦”之治理愿景实现提供良好制度环境与政策支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体制改革，他指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38]并进一步阐明把激活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作为改革的“中心环节”。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坚定引领下，文化领域改革发展蹄疾步稳、纵深推进，取得的成效显著，极大地推动了宣传思想文化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职能优化与机构重组方面，将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改组为文化和旅游部，有效促进文旅深度融合；将新闻出版管理与电影管理职责划入中央宣传

部，同时组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解决职能交叉问题并加强了党对重要思想阵地的直接统一领导。在法治化建设方面，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为统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为核心主干，配套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的文化法律法规体系框架。在深化人才制度改革方面，通过完善职称评定制度、加强文物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等举措，为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此外，在经费保障、奖励机制、监督管理等方面的改革也取得创新突破，一同汇聚成强大制度力量为文化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是一个动态过程，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尚存许多还未突破的艰巨任务，必然随着文化强国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健全完善。在新的时代方位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用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总结运用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文化领域深化改革的经验，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心任务和党的二十大关于文化的战略部署，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更加定型、优势更加明显，为把我国先进文化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文化治理效能开辟新路径、激发新动能。

（三）思想防护：铸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防范化解思想文化风险

作为党治国理政中极端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对社会具有导航定向、凝魂聚气、形塑行为等显著功能，是现代化治理的“灵魂”所在。马克思在揭露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虚伪性时阐明了其本质，即统治阶级为维系其统治合法性将自身的意志普遍化和合理化的思想表达形式，“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39]⁵⁵⁰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指明了无产阶级打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枷锁、构建反映自身阶级利益的思想体系的基本任务，要用科学理论武

装群众以发挥其维护阶级社会稳定的功能，“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39][11]}。对此，毛泽东有深刻认识：“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40]可以说，党的百年奋斗征程不仅是一部披荆斩棘、改天换地的创业史，也是一部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纽带，熔铸思想共识、凝聚人心的精神锻造史。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文化思想既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党的这一优良传统，又立足新时代的相互激荡、错综复杂的宣传思想文化环境，提出诸多关于“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1]的原创性实践方略，在防范化解宣传思想领域风险、兜牢文化安全底线、巩固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中进一步夯实了社会治理的思想基石。比如，从强调“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2][15]}以指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根本任务，到“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2][16]}以统一思想认识、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再到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2][49]}，以提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学理支撑等等，无不深刻体现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于筑牢社会团结精神纽带、凝聚中国人民思想认识“最大公约数”的根本性引领作用。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 人民日报，2022-10-26(01).
- [2] 习近平.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6：289.
- [3] 习近平在安徽考察时强调：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N]. 人民日报，2024-10-19(01).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69.
- [5]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N]. 人民日报，2014-10-14(01).
- [6]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2017-10-28(01).
- [7] 习近平. 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 [8]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139.
- [9] 在科学发展道路上阔步前进——习近平在江西调研考察纪实[N]. 江西日报，2008-10-17(01).
- [10] 张广智. 让红色资源成为发展支撑[N]. 人民日报，2015-10-09(07).
- [11]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36.
- [12] 习近平到韶山[N].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03-24(04).
- [13]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22.
- [14] 中共中央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N]. 人民日报，2013-12-24(01).
- [15] 习近平.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23.
- [16] 习近平. 论“三农”工作[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278.
- [17]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150.
- [18] 习近平. 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228.
- [19] 习近平. 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20-09-23(02).
- [20]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92.
- [21]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

- 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24.
- [2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 2022: 319.
- [2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80.
- [24]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论贯彻落实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精神[N].人民日报, 2023-07-17(01).
- [25] 锚定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不断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N].人民日报, 2024-10-29(01).
- [26] 谢加书, 段文婷.文化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逻辑、主要特征与价值意蕴[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08):18-27.
- [27]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EB/OL].(2022-05-22)[2025-04-10]https://www.gov.cn/xinwen/2022-05/22/content_5691759.htm.
-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103.
- [29] 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6:15.
- [30]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
- 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 2015:10.
- [3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202.
- [3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269.
- [33] 习近平经济文选:第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5:450.
- [34] 胡惠林.热点辨析:以人民为中心才能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 2018-09-16(05).
- [35]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14-09-22(02).
- [36] 蔡武进.我国文化治理现代化70年:历程和走向[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03):25-35.
- [37] 习近平关于城市工作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3:77.
- [38]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摘编[G].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 2023:319.
- [3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 [4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194.

责任编辑:陈琴容

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 关于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探索与启示

吴雨星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福建 福州 350001)

摘要: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探索与实践根植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中。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强调饮水思源、勿忘老区,推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责任意义重大;要求领导干部带着感情去关心革命老区建设,全力支持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嘱咐革命老区的工作要一任接着一任干,福建在接续推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上卓有成效。对于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探索的研究,有利于系统把握习近平革命老区振兴发展重要论述,指导推进福建乃至全国革命老区高质量振兴发展。

关键词: 福建; 革命老区; 振兴发展

中图分类号: D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072(2025)05-067-8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考察革命老区(以下简称老区),他亲切慰问老区人民,强调要把老区建设得更好,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2021年2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随之国家逐步健全支持新时代老区振兴发展的“1+N+X”政策体系。习近平对老区振兴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是一以贯之的,2016年他考察安徽省金寨县时表示:“在地方工作时,我一直抓老区建设,同老区很有感情。”^[1]福建是著名的老区,是习近平工作了17年半的“第二故乡”。习近平在闽工作期间,关心与支持老区振兴发展。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如既往支

持福建老区振兴发展,2022年3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建设闽西、赣州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系统梳理习近平在闽工作期间的有关探索,对于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老区振兴发展重要论述,在新的历史征程上指导福建老区振兴发展,尤其是建设好闽西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更好推进全国老区振兴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一、“饮水思源,勿忘老区”: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老区振兴发展的逻辑起点

习近平曾多次深情表示,饮水思源、勿忘老区。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仍要在新的历史征程上,持续推进为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

基金项目: 2023年度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博士扶持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革命老区发展重要论述在福建的孕育与实践研究”(FJ2023BF001); 2025年度福州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点调研课题“数智化赋能福州滨海新城高质量发展研究”(FZXSX2025C002)。

作者简介: 吴雨星,博士,中共福建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

义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老区振兴发展。

(一) 推进老区振兴发展是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推进老区振兴发展是党的历史使命与责任。习近平深情表示：“忘记老区，就是忘本，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2]53} 习近平对老区有很深的感情。他来宁德报到后几天，在地委、行署班子及老同志见面会上作了一个讲话，开场白就亲切地称呼宁德为“闽东老区”：“我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到闽东老区来工作，为老区人民奉献自己的一分力量。”^{[3]2} 习近平赴任宁德的第二天，轻车简从来到福安柏柱洋，瞻仰闽东苏维埃政府旧址，看望烈士后人。习近平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时分管老区建设促进会（简称“老促会”）工作，在福州市老促会成立大会上，他强调：“关心支持老区的建设与发展，是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2]60} 到福建省委工作后，习近平下基层的第一站就选在闽西老区。习近平在省委、省政府工作期间，经常到闽西、闽北等重点老区苏区调研，多次强调，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老区及老区人民的巨大贡献，让老区人民过上好日子，是党的庄严承诺。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始终强调并践行着党“饮水思源，勿忘老区”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推进老区脱贫与发展。

(二) 推进老区振兴发展是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显著标志

老区孕育了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也应该发挥优越性作用回报老区的贡献，推进老区振兴发展。脱贫是振兴发展的基本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考察老区，强调党中央要特别关心老区、贫困地区发展，致力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习近平指出，脱贫攻坚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正是“因为我们有制度优势，党和国家集中力量抓，全社会都来帮。”^{[4]542} 在闽工作时，习近平就强调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进老区振兴发展。1999年时值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习近平

先后来到闽西、闽东、闽北老区调研，提出了他的“世纪思考”：“老区人民作出了可歌可泣的事业，孕育了革命，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已经50周年了，老区的面貌怎么样，这是一个标志；把一个什么样的老区带入21世纪，这也是一个标志。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与否的体现，也是我们为革命理想而奋斗，最终能否达到理想目标的一个体现。”^{[2]64}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发展成果更好更快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由于老区及老区人民作出的突出历史贡献，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理应彰显制度优势，使老区在推进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发挥先行示范作用。

(三) 推进老区振兴发展有利于弘扬革命精神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先导。习近平强调：“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保证。”^{[5]205} 红色文化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核心构成，其传承发展有利于繁荣发展文化事业，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革命精神是老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习近平在闽工作期间，多次强调老区要发扬革命传统优势，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他在担任宁德地委书记时指出，宁德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是“我们建设闽东精神文明的有利条件与积极因素”。^{[5]151} 在福建省委工作后，习近平也不忘鼓励干部：“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发扬苏区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6]227} 鼓励党员干部及包括老区人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不忘初心，传承与弘扬革命传统，并以革命精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四) 推进老区振兴发展是改善老区人民生活现状的现实需求

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旨归，老区振兴发展旨在提高老区人民的生活水平。闽东、闽西是福建重点老区苏区所在地，但这些地区的人民生活

水平长期相对落后。习近平在担任宁德地委书记时，带领闽东人民谱写并实践了老区“摆脱贫困”的光辉篇章。调研闽西老区永定县，听取县里的工作汇报后，习近平动情地表示：“革命老区过去为革命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和巨大的牺牲，可是今天生活还是那么贫穷落后，我们心中有愧啊！”^{[2]55}老区人民生活依旧贫穷落后，是老区振兴发展要着力解决的现实问题。推进老区振兴发展，归根到底要改善老区人民的生活现状，促进老区人民脱贫致富与全面发展，如此才能充分体现党“饮水思源，勿忘老区”的政治担当与情怀，如此才有助于高度彰显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二、“带着感情去关心老区建设”：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老区振兴发展的推进要点

在深刻认识老区振兴发展重大责任意义的基础上，要“带着感情去关心老区建设”^{[2]55}。习近平不仅从认识上、情感上高度重视老区工作，还讲究策略、方法推进老区振兴发展，全力支持老区脱贫致富。

（一）党和政府都要重视老区工作

党的领导是推进老区振兴发展最根本的保障。习近平强调：“要认识到，扶持老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脱贫致富奔小康，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7]1995年5月，在福州市老促会成立大会上，习近平强调，要采取“政策上优惠、安排项目优先、服务上优质”的措施促进老区发展。^{[2]60}1998年8月，在听取时任福建省老区办主任吴连田工作汇报后，习近平对老区工作提出了四点要求，其中第一点要求就是：“统一认识，加强领导。”^{[2]60}1998年11月，福建省委、省政府专门召开全省老区工作会议。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一把手都要重视老区工作，确定一位领导分管老区工作，真正把老区工作列入议事日程。”^{[2]61}在习近平高度重视与部署下，福建老区建立了各级党委和政府一把手抓老

区工作的工作机制，在政策、项目、资源等方面持续向老区倾斜，有力地保障了老区振兴发展。

（二）老区革命精神是脱贫致富的强大精神支柱

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发扬老区革命精神，并将其内化为老区脱贫致富的动力。福建是著名的老区，革命精神是一大财富。他在宁德时指出，老区是闽东的特色，要弘扬革命精神脱贫致富。发扬革命精神，每一个人都要“爱中国共产党、爱社会主义、艰苦奋斗、滴水穿石、锐意进取、无私奉献”^{[5]156}。老区发展的相对落后，要“继续发扬自力更生、吃苦耐劳的精神，铁心拼搏，尽快走上致富之路”^{[2]66}。习近平客观分析闽东老区发展的相对落后是由诸多复杂因素导致的，闽东老区的发展不可能一下子抱得“金娃娃”，而是要滴水穿石、久久为功。老区党员干部、老区人民要发扬大无畏的、开拓进取的精神，锐意进取战胜贫困。老区的脱贫致富绝不是依靠“单干”“个人主义”，而是要克服“集体主义观念有所淡化”等问题，强化集体主义教育，发展集体经济。^{[5]150-151}习近平还十分重视通过革命纪念馆的建设弘扬老区革命精神，闽东革命纪念馆、省革命历史纪念馆等都是在习近平的关心与指导下建立起来的。

（三）结合实际加快老区经济发展的步伐

老区振兴发展，关键要通过老区的经济发展来推动。针对闽东老区的贫困问题，习近平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闽东脱贫致富的根本出路。”^{[5]153}针对闽西老区发展的实际，习近平强调老区、山区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推动新一轮创业。老区要结合市场需求，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经济。“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5]6}，这是习近平因地制宜探寻地方经济发展的思路。闽东老区要唱好“山海经”。一方面，立足于山区特色，发展茶叶、果蔬等山区经济作物，支持发展食用菌等“短、频、快”的产业实现快速脱贫致富，鼓励造林致富，三赴宁德周宁县七步镇后洋村黄振芳家庭

林场的事迹传唱至今。另一方面，习近平鼓励闽东发展海产养殖，以科技兴农，支持大黄鱼养殖成为闽东重要产业。而闽西、闽北等重点老区具有良好的森林资源，习近平注重协调推进老区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充分发展林业及林下经济，着力支持闽西、闽北等老区推进长汀水土流失治理、推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闽西老区永福镇花卉产业就是在习近平大力支持下快速发展起来的，至今永福镇大部分的人仍从事与花卉相关的产业。

（四）深入调研解决老区民生问题

民生是最大的政治，解决老区民生问题是推进老区振兴发展的基本要求。调研是了解并解决老区民生问题的重要方法。习近平历来高度重视调研，在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在闽工作时，习近平同样重视调研，而且强调要经常到老区、贫困地区调研。习近平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干部：“要经常深入老区调查研究，及时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2]61}他赴任宁德后，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就走遍了宁德下辖9个县域。担任福州市委书记后，习近平亲自率队到永泰、闽清、闽侯、罗源等县开展调研，慰问老区人民。在闽工作期间，习近平分别19次、17次、11次到龙岩、南平、三明等重点老区苏区考察调研。习近平经常看望慰问老红军和革命“五老”人员，特别强调：“我们下基层要多跑困难的山区，多看看老区基点村，多往那些交通不便甚至不通公路的山村走走。”^[7]老区村的用水、用电、交通等众多基本民生问题就是在调研考察中解决的。1999年7月，习近平到泰宁县革命基点村调研，要求尽早完善“五通”基础设施。当年，解决老区建制村“五通”问题被列为2000年省委和省政府15件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习近平不断争取政策、集聚力，促进棉花滩水电站、赣龙铁路、梅坎铁路、温福铁路等多个老区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启动或竣工投用。

（五）举全社会之力支援老区建设

新时代，习近平强调要举全社会之力帮助老少边贫地区实现脱贫奔小康。老区发展的相对落后，不能仅仅依靠党和政府的支持，须争取全社会的支援。在福建工作时，习近平强调：“加大扶持力度，举全社会之力支援老区建设。”^{[2]61}为了促进老区的发展，1990年7月，全国性非营利性社会团体中国老促会成立。老促会主要成员由热心于老区建设事业的党政军离退休老干部和爱心单位、爱心人士组成。1990年前后，各省、市、县等各级人民政府陆续设立老促会。1989年闽西老促会成立，1994年福建省老促会成立。1995年福州市老促会在时任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习近平的关心与支持下成立，在成立大会上，习近平作书面讲话。老促会在老区宣传、组织调查、项目引进、沟通联络等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梳理各地方老区发展史，为地方老区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区域对口协作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福建老区的振兴发展。时任省委副书记习近平亲自谋划与推动“山海协作”战略，福建老区多为山区，山海协作有利于推动山区老区发展。实施的挂钩帮扶政策，瞄准的也均是欠发达老区县。全社会的支援极大地缩小了老区与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有力地促进了共同富裕。

三、“老区的工作要一任接着一任干”：福建秉承习近平重要论述精神接续推进老区振兴发展的生动实践

习近平强调党政干部要抱有“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政绩观^{[8]77}，指出“老区的工作要一任接着一任干”^{[2]61}。在习近平调离福建后，福建始终秉承习近平有关重要论述精神，接续推进福建老区振兴发展。

（一）加强党和政府的领导：强化老区振兴发展的制度保障

福建秉承初心使命，高度重视老区工作，强化

对老区振兴发展的组织保障。随着21世纪初农村扶贫工作的深入推进，福建老区建立了领导挂钩、部门参与、联动共建的工作机制，营造“大扶贫”格局。2010年省民政厅加挂“福建省革命老根据地建设办公室”牌子，增加原省革命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的职责，指导全省老区建设工作。2012年成立福建省老区扶建领导小组，2017年进一步完善扶建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会议制度，由副省长挂帅组长，省民政厅（老区办）统筹指导，各部门协调推动老区经济社会发展。近20年来福建省出台的与老区振兴发展有关的法规政策文件30余项。2007年11月，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福建省革命老区发展的意见》。2012年9月，发布《福建省促进革命老区发展条例》，2020年1月予以修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两次赴闽考察，均强调要关心支持老区发展。福建省高度重视学习贯彻新时代习近平有关重要讲话精神，制定实施新时代支持福建老区脱贫与振兴发展的政策文件。2019年5月，福建出台《关于做好革命老区中央苏区脱贫奔小康工作的实施意见》。2022年2月还出台了《福建省“十四五”老区苏区振兴发展专项规划》。福建省近20年来制定的相关法规政策大多数都强调，倾斜支持原中央苏区、欠发达老区发展。在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下制定的系列政策法规，为推进福建老区振兴发展夯实了制度基础。

（二）筑牢红绿双色优势：建设全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福建是原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闽西是原中央苏区的核心组成地区，红色资源丰富，森林资源也位居全省榜首、高居全国前列。2022年3月，国家发改委印发《闽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方案》，指出闽西老区要在红色文化传承、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重要示范引领作用。^[9]习近平指出：“福建是革命老区，党史事件多、红色资源多、革命先辈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具有独特优

势。”^[10]福建老区高度重视红色土地、红军故乡、红旗不倒“三红”精神的传承和发展，充分利用红色资源开展党员干部及群众的教育活动。福建老区还大力推进以闽西老区上杭县古田镇为核心的红色文旅产业发展。习近平在闽工作期间，十分重视推进闽西等地的生态文明建设。近20年来，闽西持续强化绿色发展优势，荣膺国家森林城市、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全国林业改革发展综合试点市等“绿色桂冠”称号。2022年龙岩市水土保持率提升至94.16%，长汀县列入全国水土保持高质量发展先行区。^[11]闽西老区在创新林业普惠金融产品、林票制改革、林业碳票改革方面始终走在全国前列。^[12]

（三）聚力特色优势产业：循序渐进推进老区跨越式高质量发展

由于自然、历史等种种因素，老区发展长期处于相对落后的位置。习近平指出：贫困地区摆脱贫困，要发挥“滴水穿石”的精神，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适时实现“弱鸟先飞”。福建秉承此精神，循序渐进推进老区发展取得突出成效。闽西、闽北、闽东等重点老区GDP近20年（2003-2022）分别增长了7.86、5.88、10.5倍，尤其是宁德GDP增速高于全省平均增速，实现跨越式发展。2021、2022年宁德GDP增速均保持两位数，位居全省首位，GDP由全省第8跃升至第5。宁德的跨越式发展并非出于偶然因素或瞬间的跨越，而是基于“滴水穿石”般从量变到质变的累积。“闽东发展的动力在于工业”^{[5]7}，2010年9月习近平到宁德视察调研时，看到宁德发展条件逐步成熟后，对宁德提出了多上几个大项目，多抱几个“金娃娃”，加快跨越式发展的殷切期望。近年来，宁德遵照习近平的重要指示要求，把发展工业、做强产业作为重中之重，找准时机，抱上了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青拓集团、上汽集团、东南铜业等一批“金娃娃”，培育国际级产业集群，实现跨越式高质量发展。^[13]

（四）构建振兴发展共同体：感召社会力量推动老区共同富裕

老区发展的相对落后，单靠官方力量的支持还远远不足。习近平强调，全社会都要关注与支持老区振兴发展。福建持续推进挂钩帮扶、山海协作等战略举措，实现社会资源向老区对口倾斜。老促会在联结社会力量促进老区振兴发展方面发挥着突出作用。习近平在闽工作期间，鼓励老促会发挥优势为老区发展多作贡献。福建省老促会自成立至今近30年来持续运用政治、经验、威望、时间的独特优势，一方面在老区发展史梳理、法规政策汇编、经济社会发展数据整理等文献编撰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定期组织开展调研，深入了解老区发展存在的问题，充分发挥参谋助手、桥梁纽带、平台载体作用，积极为老区振兴发展建言献策。福建省老促会还积极联络黄仲咸教育基金会等慈善组织，资助老区建设，支持老区人民生活、教育与发展。近10余年来福建省还积极组织企业、社会组织帮扶老区发展，如开展“百龙联百村”活动，“百村”当中就包含诸多老区村；^[14]大力推进“阳光1+1”活动，组织1000个社会组织对接帮扶1000个老区村发展，为老区村发展持续助力。^[15]此外，福建也积极探索与尝试激活慈善组织、社工组织等社会力量服务与融入老区新发展格局，推进老区高质量发展。

四、“无论我们走得有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老区振兴发展探索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强调：“无论我们走得有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16]²⁴⁷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新时代以来，老区振兴发展取得了突出成效；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仍要持续推进老区振兴发展。从福建这个著名的老区溯源习近平关于老区振兴发展的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指导意义。

（一）有利于更系统地把握习近平关于老区振兴发展的重要论述

从陕北梁家河的知青岁月，到河北正定，再到福建，习近平与老区结下深厚的情缘。陕西、河北、福建均是著名的老区。习近平曾深情表示：“黄土地哺育了我，红土地培养了我。”^[17]⁸⁹⁰这里的“黄土地”指的是陕北，而“红土地”主要指的是福建。地方履历中，习近平在闽工作的时间最长，福建又是原中央苏区所在地，宁德地区隶属于闽东苏区，在福州市及省委、省政府工作期间分管老区工作，对老区脱贫与振兴发展倾注了心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两次入闽调研，都强调对老区的关心与支持。习近平新时代关于老区振兴发展重要论述的应然、实然主要探索与实践溯源地在福建，对于福建的溯源研究，能够更深刻、全面地把握习近平关于老区振兴发展重要论述的情感因素、客观背景与发展脉络。党的十八大结束伊始，习近平来到著名的老区河北阜平考察，开门见山地指出：“我这次来的目的，就是慰问革命老区群众。”^[18]¹⁹他在考察中，对老区及老区人民表达了浓烈的情怀，强调党中央要特别关心、支持老区及贫困地区的发展。后来，他在考察老区时多次强调勿忘老区。这份老区情怀与其在地方工作，尤其是在福建工作时的情怀是一以贯之的。脱贫是振兴发展的基础，党的十八大至2020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期。无论是从政治还是经济因素看，全面脱贫奔小康决不能少了老区。2013年习近平在考察湘西老区时正式提出了“精准扶贫”理念，而他在福建对老区扶贫的探索，尤其是在闽东著就的《摆脱贫困》对老区精准扶贫开展了深入的思考；基于绿色资源优势及生态脆弱敏感劣势，习近平尤为重视闽西、闽北等老区的生态发展，这亦是因地制宜推进生态扶贫的重要实践。上世纪末，习近平强调老区发展面貌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与否的重要体现；新时代新征程，老区虽然取得了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但老区

以什么样的面貌接续推进振兴发展同样是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阶段性成果暨优越性的呈现。2021年以来,国家致力于建立健全“1+N+X”老区振兴发展政策体系,正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老区的最新呈现。习近平关于老区振兴发展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对于习近平老区振兴发展的地方溯源研究能够拓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视域,丰富后者的研究体系。

(二) 有利于更好地指导新时代新征程福建老区乃至全国老区振兴发展

福建作为原中央苏区所在地,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对福建老区振兴发展给予倾斜性的关怀与支持,赋予其从老区脱贫攻坚示范区跃升为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的使命担当。对习近平在闽工作期间关于老区振兴发展探索的研究,有助于更深入地把握有关老区振兴发展的发生背景及环境,分析福建老区的优势与特点,统筹福建老区的发展脉络,更有针对性地指导新时代新征程福建老区振兴发展。深入贯彻习近平关于老区振兴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要持续发挥制度优势,统筹政府及社会资源对口支持老区振兴发展,同时,更加注重激发内生动力,协调好内外发展动力的关系;要厘清重难点,关注闽西、闽东、闽北等重点老区苏区、欠发达老区振兴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寻各个老区特色振兴发展之路,持续运用好福建老区红绿色资源优势,书写红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利用好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深耕特色产业。福建老区既富有老区的个性,也具备全国老区的共性,原中央苏区所在地闽西、闽北地区位于多省交界的山区处,全国老区也多位于省际处、边远山区处。以习近平关于老区振兴发展的重要论述来指导闽西等重点老区苏区振兴发展,总结发展经验与模式,能为全国老区高质量振兴发展提供借鉴范本。目前,闽西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已经过中期评估,进入后期调

整、巩固、提升阶段,闽西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仍然要科学、全面地贯彻习近平老区振兴发展重要论述精神,扬长补短,为全国老区高质量发展总结参考经验。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老区的现代化发展同样具有突出的政治示范意涵,推进老区现代化发展同样要关注欠发达老区、老区的乡村地区,以老区的高质量现代化发展推动实现共同富裕。^[19]

新时代习近平高度重视与支持老区振兴发展。福建是著名的老区,是习近平关于老区振兴发展重要论述的重要孕育地与实践地。在闽工作期间,“饮水思源,勿忘老区”、“带着感情去关心老区建设”分别构筑了习近平关于老区振兴发展的逻辑起点与推进要点,福建在“老区的工作要一任接着一任干”的嘱托中,接续推进老区振兴发展取得突出成效。对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老区振兴发展探索的研究,有助于系统把握习近平关于老区振兴发展的重要论述;有助于以习近平老区振兴发展重要论述为指导,引领新时代新征程包括福建老区在内的全国老区高质量振兴发展。

参考文献:

- [1] 吴兢,李翔,魏本貌,等.总书记始终惦念咱老区人(总书记的人民情怀)[N].人民日报,2018-02-12(02).
- [2] 闽山闽水物华新——习近平福建足迹(上)[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2.
- [3]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习近平在宁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0.
- [4]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5] 习近平.摆脱贫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 [6]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习近平在福建(上)[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1.
- [7] 魏章官.习近平等到闽东老区基点村少数民族村调研时强调:加快山区老区建设,加大扶贫攻坚力度[N].福建日报,1999-06-11(01).

- [8]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论丛: 第五辑[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 [9] 闽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方案[N]. 闽西日报, 2022-04-14(01).
- [10] 习近平在福建考察时强调: 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展现更大作为,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福建篇章[N]. 人民日报, 2021-03-26(01).
- [11] 2022年龙岩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23-03-16) [2023-05-15]. http://www.longyan.gov.cn/hd/hyqg/202303/t20230316_1987952.htm.
- [12] 王玮彬, 李珊. 福建省三明市林票制度改革实践与探索[J]. 林业资源管理, 2021(04): 17-22.
- [13] 梁伟新.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宁德篇章[J]. 党建, 2022(11): 41-43.
- [14] 夏英, 李芸, 吕开宇. 中国贫困革命老区扶贫开发报告[M]. 北京: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
- [15] 福建省举办“阳光1+1(社会组织+老区村)牵手计划”视频签约仪式[EB/OL]. (2020-05-17) [2022-03-24]. <http://www.mca.gov.cn/article/xw/dfdt/202005/20200500027513.shtml>.
- [16]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
- [17] 闽山闽水物华新——习近平福建足迹(下)[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22.
- [18] 习近平论“三农”工作[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 [19] 吴雨星. 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革命老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 2023(04): 129-136.

责任编辑: 魏璐珂

(上接第56页)

- [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67.
- [3] 程璐, 黄明理. 自媒体舆论的泛政治化批判倾向之批判[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03): 24-30+146.
- [4] 庄荣文. 网络强国建设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学习《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J]. 求是, 2021(3): 48-53.
- [5] 习近平. 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 [6] 侯宪利.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的理论建构和原创性贡献[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05): 30-39.
- [7] 习近平. 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J]. 奋斗, 2019(06): 1-5.
-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 335.
- [9] 蒋芳. 新媒体时代主流媒体舆论引导的风险挑战和应对策略[J]. 新闻论坛, 2024(04): 108-110.
- [10] 曹萍. 把握文化主动的科学内涵、重大意义和实践伟力[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23(05): 18-23+157.

责任编辑: 兰丰丰

地缘聚合与党建赋能：外来务工流动 党员管理的“同乡村”模式创新

——基于深圳市罗湖区的实践探索

甘坤玲

(陕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摘要：改革开放后，城乡流动加速催生了具有地缘特色的“同乡村”社群，其内含大量流动党员。深圳市罗湖区创新实施“同乡村”基层党建模式，有效应对流动党员管理挑战，为超大型城市基层党建提供创新范本。通过数字赋能，打造“党员智慧系统”，实现党员组织关系智能匹配、学习内容精准推送和服务需求精准对接；实施“头雁培育计划”，提升流动党员的互联网思维、政策协调能力和群众工作本领；建立“双向考核”机制，压实流入地属地管理责任，强化流出地源头治理效能，形成双向监督闭环。这一模式为超大城市流动党员管理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通过地缘聚合与党建赋能的深度融合，实现了流动党员“离乡不离党”的治理模式。

关键词：地缘；外来务工流动党员；“同乡村”；模式创新

中图分类号：D2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072(2025)05-075-10

在深圳这座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涌入，形成了独特的“同乡村”现象，反映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和文化的融合。^[1]然而，流动人口的增加带来了一系列治理挑战，产生了诸如社会治安、社会融入等现实需求和合法化组织缺失等实际问题。为应对这些治理上的挑战，深圳探索出“同乡村”基层党建模式，这一模式通过强化党员身份意识和党建领航作用，将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为城市基层

党建和社会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一、地缘聚合：流动党员管理的结构性基础

(一) 超大城市流动人口“地缘再聚合”现象
在当今中国城市化浪潮的推动下，乡村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2]随着这股流动潮，一种特殊的社会单元——“同乡村”应运而生，它不仅承载着外来务工人员的乡愁与梦想，还深刻地反映着中国社会特有的地缘、血缘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变迁和文化融合。^[3]

作者简介：甘坤玲，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党的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乡二元格局逐渐被打破，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城市。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它的高速发展吸引了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在城市中找到发展机会的同时，也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构建起自己的“同乡村”。^{[4]89}这些“同乡村”往往以地缘和亲缘为纽带，聚集着来自同一地区或同一民族的外来务工人员。外来务工人员在这里共同生活、工作，形成了富有特色的社区文化，这种文化既是对原乡文化的传承，又是对城市文化的吸收和融合。^[5]

“同乡村”作为乡村社会时空在现代城市中的延伸，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网络体系。这个网络体系不仅涵盖血缘、地缘、友缘、业缘等多种社会关系，更在这些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独特的乡土社会秩序和文化认同。^[3]对于远离故土的外来务工人员而言，“同乡村”的这种认同感和秩序感，给予他们在城市中的归属感和安全感。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深入研究了以“地”的关联派生出的社会关系，认为“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6]，同乡关系和同乡情谊在深圳“同乡村”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

（二）传统单位制党建在流动人口管理中失灵

传统单位制党建模式以固定单位为核心，依赖稳定的组织架构和层级化管理体系，其制度设计本质上是“属地管理”与“单位负责”的二元结合。^{[7]45}然而，在深圳“同乡村”这一特殊场景中，外来务工党员的流动性、分散性和异质性特征，使得这一模式面临根本性挑战。^[8]流动性导致党员与党组织联系断裂，部分党员因工作变动长期脱离组织关系；分散性使得党员分布于不同行业、企业甚至城市角落，缺乏集中管理基础，基层党组织难以开展常态化教育；异质性则表现为党员年龄、职业、文化背景差异大，传统“一刀切”的管理方式难以满足个性化需求。这些特性直接冲击了传统党建模式的组织形态，使得“自上而下”的管理逻辑失效，

党组织难以动态掌握党员信息，服务供给与需求脱节。^{[7]56}

与此同时，深圳作为典型“移民社会”，其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进一步加剧了治理困境。外来务工党员在城市中面临身份认同双重困境：一方面，户籍身份限制使其难以享受城市公共服务，缺乏归属感；另一方面，原乡文化与城市文化的碰撞导致其社会参与意识不足，对城市治理的认同度较低。^[1]这种身份认同的模糊性，使得外来务工党员对传统党建模式的认同度下降，参与组织活动的积极性不足。^[9]此外，传统党建模式中“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缺乏“自下而上”的参与机制，信息不对称和利益表达受阻，导致党组织在服务群众时“力不从心”。^{[10]78}在“同乡村”基层党建的实践中，这种参与渠道的缺失尤为明显，外来务工流动党员的需求难以通过正式渠道反映，党组织的服务供给与实际需求存在显著偏差。

此外，传统党建模式未能有效解决外来务工党员的“空间融入”问题，导致其在城市治理中缺乏话语权。外来务工党员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生活，缺乏对城市的归属感，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有限。这种“空间融入”的失败，进一步加剧了外来务工流动党员的边缘化，使其在城市治理中难以发挥积极作用。^[11]

（三）地缘关系在超本地化中的韧性

地缘韧性指地理空间在面对外部冲击时，通过空间重构、社会网络联结与制度创新维持功能稳定的能力。超本地化则强调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性资源通过创新机制重新激活，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二者的结合体现在：地缘韧性为超本地化提供空间载体，超本地化通过激活地方性资源增强地缘韧性。在深圳“同乡村”基层党建模式中，地缘韧性主要体现在通过“以党员带群众、以同乡管同乡”的方式，利用流动人口的地缘关系来增强社区认同感，促进社会治理、服务流动人口。深圳“同乡村”

基层党建通过外来务工党员党组织建设，将碎片化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组织化力量，正是地缘韧性在超本地化中的实践体现。^[12]

地缘韧性是超本地化进程中的关键支撑，其核心在于通过空间重构、社会网络联结与制度创新，将地方性资源转化为治理优势。^[5]在“同乡村”这一特殊的城市治理场域中，地缘要素展现出独特的韧性特质，构建了一套完整的超本地化治理体系。这种韧性机制体现在文化认同的粘合效应上，通过方言系统、地方习俗和传统节庆等文化要素，形成了强大的情感连接和组织动员能力，乡情纽带成为外来务工党员参与社会治理的情感基础。深圳“同乡村”基层党建模式作为基层治理创新实践，深刻体现了地缘在超本地化中的韧性。这一模式通过将外来务工党员的组织建设与地缘关系结合，党建模式突破物理空间限制，善用地缘文化纽带，在流动人口聚集的“同乡村”中构建起新型治理网络，为超本地化治理提供了重要启示。^[13]

二、党建赋能：“同乡村”党建模式的创新实践

(一) 组织建设创新：构建坚实堡垒，凝聚地缘力量

1. 首创“地缘党支部”模式，按籍贯建立党组织。深圳首创“地缘党支部”模式，依据流动党员的籍贯进行科学编组，建立起一个个温馨的“党员之家”。老乡见老乡，情感天然亲近，在地缘关系纽带的联结下，流动党员迅速凝聚起来，有效改变了以往流动党员分散难管理的状况。深圳设立了湖南籍、湖北籍等多个地缘党支部，每个党支部都成为凝聚同乡党员的重要平台。在这些党支部里，党员们用熟悉的乡音交流思想、分享心得、开展活动，归属感油然而生。各“地缘党支部”积极开展组织活动，充分发挥党员的特长和优势，为党员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14]

2. 推行“双向任职”制度，流出地干部到深圳挂职。“双向任职”制度的推行进一步强化了组织

力量。流出地干部奔赴深圳挂职，既把家乡的风土人情、治理经验带过来，又深度融入深圳党建体系。这些挂职干部在流入地和流出地党组织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成为信息传递的“信鸽”，让两地党组织的沟通协作更加顺畅无阻。挂职干部积极参与深圳的党建工作，协助当地党组织开展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和服务工作。^[15]他们利用自己对家乡情况的了解和对流出地党员的熟悉，为流动党员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和指导。同时，他们还积极向流出地党组织反馈流动党员在流入地的工作、生活和思想状况，促进两地党组织对流动党员的共同管理。

3. 建立“党群会客厅”，打造“15分钟服务圈”。“党群会客厅”的建立是深圳流动党员党建服务前移的关键举措。它巧妙布局在流动党员工作生活的社区、街区，打造出“15分钟服务圈”。党员们下班后步行不久就能踏入这个温馨港湾，咨询政策、寻求帮助、参与活动。“党群会客厅”配备了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党员提供一站式的服务。会客厅里设有政策咨询窗口，为党员解答关于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政策问题；法律援助窗口为党员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服务，帮助他们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心理辅导室则为党员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缓解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压力和困扰。此外，“党群会客厅”还定期举办各类活动，如政策宣讲会、法律知识讲座、心理健康讲座、创业经验分享会等。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党员的业余生活，还为他们提供了学习和交流的平台，帮助他们提升综合素质和能力。通过“党群会客厅”这一平台，党组织与党员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党员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得到了进一步增强。^{[10]95}

(二) 管理机制创新：科技赋能治理，精准激发活力

1. 开发“深圳智慧党建”系统。“深圳智慧党建”系统是深圳流动党员管理的“数字大脑”。它录入每个流动党员的基本情况、学习轨迹、参与活

动等海量信息，实现数据动态更新。党组织通过后台一键发布学习任务、活动通知，党员们随时在线“签到”参与，与党组织紧密相连。该系统具有强大的功能模块，包括党员信息管理、组织生活管理、学习教育管理、考核评价管理等。通过党员信息管理模块，党组织可以实时掌握流动党员的基本信息和流动情况，实现对党员的精准管理。组织生活管理模块则方便党组织发布活动通知、签到考勤、活动总结等，提高组织生活的规范化和效率。学习教育管理模块为党员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包括党的理论知识、政策法规、业务技能培训等，党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自主选择学习内容。考核评价管理模块则对党员的学习表现、参与活动情况进行量化考核，激励党员积极参加党组织活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4]135-136}

2. 实施“积分制”管理，量化考核党员表现。

“积分制”管理让党员表现有了量化标尺。深圳制定了详细的积分规则，将参与志愿服务时长、建言献策采纳次数、业务技能提升等级、遵守纪律情况等多方面因素都纳入积分考核范围。^[16]每月对党员的积分进行公示，年终进行综合评优，积分高者还能获得城市景点门票、技能提升课程等奖励。这一制度充分调动了流动党员参与党组织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党员们为了获得更高的积分，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主动建言献策，为党组织的发展出谋划策；努力提升自身业务技能，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同时，“积分制”管理也为党组织提供了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标准，有助于发现和培养优秀的流动党员，激励全体党员不断进步。

3. 建立“三色预警”机制，动态管理党员。“三色预警”机制紧盯党员参与度，对连续不参加活动的党员先黄牌提醒，再橙色催促，最后红色严肃警示，动态督促党员“上线”，让流动党员时刻保持政治生命的活跃度。具体来说，党组织通过“鹏城

先锋”智慧党建系统对党员的参与情况进行实时监测。对于连续一个月未参加党组织活动的党员，系统会自动发出黄色预警，提醒党员及时参加活动。若党员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仍未参加活动，则升级为橙色预警，党组织将主动与党员联系，了解情况并进行督促。若党员连续三个月以上未参加活动，则启动红色预警，党组织将对其进行严肃的谈话教育，帮助其改正错误，增强党员意识。通过“三色预警”机制，党组织能够及时掌握流动党员的参与情况，对不及时参加活动的党员进行有效的督促和管理，确保每个党员都能正常参与党组织生活，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三) 服务供给创新：贴心理解需求，全方位暖心保障

1. 开设“乡音党课”，增强认同感。“乡音党课”是深圳为流动党员打造的特色精神食粮。为了更好地满足流动党员的学习需求，深圳组织部门邀请老乡党员骨干担任党课讲师，用家乡话分享红色故事、解读方针政策。在湖南籍流动党员党课上，讲师用地道湘音讲述焦裕禄在兰考的感人事迹，党员们听得热泪盈眶，乡音共鸣让党的理论在心田扎根。“乡音党课”的内容丰富多样，涵盖党的历史、党的理论、党的政策等多个方面。通过讲述革命先辈的英勇事迹、党的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事件以及党的最新政策解读，让流动党员在熟悉的乡音中深入学习党的知识，增强对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这种授课方式也更容易激发党员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果。

2. 建立“同乡互助基金”，解燃眉之急。“同乡互助基金”如同冬日暖阳，为陷入困境的流动党员送去希望。该基金由党员们自愿筹集、社会捐赠以及政府适当补贴等方式汇聚而成。当同乡党员遭遇重大疾病、突发灾害等意外情况时，互助基金第一时间伸出援手，为其提供经济援助。基金的管理和使用有严格规范的流程。党员可以根据自身情况

提出申请，经党支部审核通过后，即可获得相应金额的救助。同时，基金的使用情况会定期向党员公示，确保资金使用的公开透明。例如，有位广西籍流动党员在工作中突发重病，高额的医疗费用让他的家庭陷入了困境。得知情况后，“同乡互助基金”紧急拨付资金，帮助他支付了部分医疗费用，解了燃眉之急。这一举措让流动党员在异乡也能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增强了党员之间的互助互爱精神。

3. 打造“就业直通车”服务平台。“就业直通车”服务平台精准对接党员就业创业需求。党组织积极与企业深度合作，开设专场招聘会，为流动党员提供海量岗位；组织专业导师开展就业辅导，从简历优化到面试技巧全方位指导；还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帮助党员提升就业竞争力。该平台通过收集企业的用工需求和党员的就业意向，进行精准匹配，提高就业成功率。同时，平台还为党员提供就业后的跟踪服务，及时了解党员在工作中的情况和需求，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依托“就业直通车”服务平台，众多流动党员从流水线工人成长为技术骨干、部门主管，甚至自主创业当上老板，实现了人生的价值和梦想。

深圳“同乡村”党建模式的创新实践，以扎实的组织建设为根基，凭借智能管理机制的高效运转，搭配暖心服务供给的全方位保障，打造出流动党员党建的“深圳样本”。它有力破解了流动党员组织难、管理散、服务弱的痛点，使流动党员在鹏城大地稳稳扎根。这一创新模式为全国流动党员党建工作照亮前行方向，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可借鉴、可复制的先进经验，持续书写着流动党员党建的崭新华章，在新时代的党建领域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三、“同乡村”党建模式的内在逻辑与局限挑战

（一）“同乡村”党建模式内在逻辑

1. 组织赋能的实现路径。一是地缘社会资本转化为组织资源。在“同乡村”基层党建模式中，地缘社会资本的转化是激活组织动能、提升治理效能

的关键。地缘社会资本以地缘关系为纽带，涵盖社会网络、信任关系、文化认同及潜在资源，其转化需通过结构嵌入、信任强化、资源整合三大路径，形成对党组织建设的系统性支撑。第一，以组织重构嵌入地缘网络。通过“网格化覆盖”与“双重身份认同”，将党组织延伸至自然村、流动人口聚居区，推动党员兼任“家乡代表”与“组织成员”，实现组织与地缘群体的深度融合。第二，以情感联结强化信任关系。依托方言、习俗、宗族纽带等文化认同，开展“乡音党课”“宗祠议事”等活动，激活党员与群众的情感共鸣。第三，以资源整合激活组织资本。建立“在地党员+流动党员”信息库，分类标注其专业技能、资源优势，实现“人岗匹配”；成立“同乡互助基金”，为党员创业、村民应急提供资金支持。“同乡村”基层党建模式充分利用了流动人口的地缘和血缘关系，将地缘社会资本转化为组织资源，为党组织的建设和活动提供了坚实基础。

二是“柔性管理”对刚性制度的补充。在“同乡村”基层党建实践中，刚性制度与柔性管理形成“刚柔并济”的治理生态，二者相辅相成，共同破解流动人口治理难题。刚性制度以组织架构、规章制度为骨架，为党组织运行划定底线、明确规则；柔性管理则以情感联结、需求响应为脉络，为制度执行注入温度、激活效能。^[17]刚性制度为党组织提供了“底线保障”，确保治理方向不偏移、组织运行不散。然而，其过度依赖规则约束的局限性，也催生了柔性管理的补充需求。依托乡音、习俗、宗族纽带等文化符号，构建“乡情共同体”。例如，深圳罗湖区黄贝岭社区的“同乡村”流动党支部，通过举办“乡音党课”“宗祠议事”等活动，唤醒党员的乡土记忆与组织归属感。柔性管理并非对刚性制度的消解，而是通过“制度软化”实现“治理硬化”。在“同乡村”基层党建中，刚性制度是治理的“底线”，柔性管理是效能的“催化剂”。唯有刚柔并济，方能实现组织建设与社会治理的双向

赋能，为基层党建与城市融合注入持久动能。

2. 流动党员的认同建构。第一，从“外来者”到“新乡贤”的角色转变。在深圳市罗湖区的“同乡村”基层党建模式中，外来务工党员的身份认同经历了从“外来者”到“新乡贤”的深刻转变。这一转变不仅是社会角色的转换，更是外来务工党员在城市社区中实现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重要过程。“同乡村”基层党建模式的核心在于利用流动人口的地缘和血缘关系，构建起一种基于同乡情谊的社区治理模式。这种模式为外来务工流动党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社会空间，使他们能够在城市中找到归属感和认同感。外来务工党员通过参与“同乡村”社区的治理和服务，逐渐从被边缘化的“外来者”转变为受认可的“新乡贤”。在“同乡村”社区中，外来务工流动党员不仅是党组织的成员，更是同乡群体的核心力量。他们凭借自身的政治身份和组织优势，积极参与社区事务，推动社区发展。

第二，政治身份与地缘身份的重叠强化。在“同乡村”基层党建模式下，外来务工党员的政治身份与地缘身份相互重叠，这种重叠强化了他们的身份认同，使他们在城市社区中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外来务工党员作为党员，具有明确的政治身份，需要在城市社区中履行党员义务，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同时，他们作为外来务工人员，具有强烈地缘身份，这种身份使他们在社区中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和影响力。^[18]在“同乡村”基层党建模式中，外来务工流动党员通过地缘关系网络，将政治身份与地缘身份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身份认同。“同乡村”基层党建模式通过建立流动党支部，将外来务工党员纳入党组织的管理体系，使他们在城市社区中能够更好地发挥政治身份的作用。同时，“同乡村”基层党建模式利用地缘关系，强化了外来务工党员的社会身份认同。通过组织同乡活动和社区服务，外来务工党员在同乡群体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增强了他们的社会影响力。这种政治身份与地缘身份

的重叠强化，使外来务工党员在城市社区中能够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通过这种双重身份的互动，外来务工党员在城市社区中实现了从“外来者”到“新乡贤”的转变，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

（二）“同乡村”基层党建模式的局限挑战

1. “同乡村”基层党建模式的可持续性需要增强。当前，“同乡村”基层党建模式作为基层党建模式创新的一种形式，在推进党员管理和服务群众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随着实践的深入，其局限性和挑战也逐渐凸显出来。首先，地方党委政府层面对“同乡村”流动党组织建设的持续支持存在不确定性。基层党建创新的可持续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层的重视和支持。然而，随着区、街党委负责人的更替，新上任的负责人对“同乡村”流动党组织建设的态度和支持力度可能发生变化，这直接影响到基层党建创新能否长久运转。其次，流动党支部负责人员的付出与报酬问题成为制约其可持续性的重要因素。作为打工群体的成员，流动党支部班子成员在承担繁重的社区党务和管理之余，仍需依靠各种劳动来养家糊口。然而，由于社区党务和管理任务繁重，这些流动党员不得不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这势必影响其谋生活动。因此，如何平衡流动党支部负责人员的付出与报酬，激发其工作积极性，是一个重要难题。

2. “同乡村”基层党建模式的代际分化需重视。首先，外来务工党员的子女作为在深圳出生长大的一代——“深二代”，成长环境和价值观与老一辈外来务工党员存在显著差异。“深二代”往往更加适应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对家乡的认同感相对较弱，与同乡之间的交流和联系也相应减少。这种差异导致在“深二代”与老一辈党员之间难以形成有效的交流和沟通，影响了基层党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19]其次，“深二代”在融入深圳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社交圈子和生活方式，更多地与同龄人、同事或城市中的其他群体进行交流，而与

同乡之间的联系相对较少。这种社交模式的转变使得乡情、乡音在党建工作中对于“深二代”难以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难以将党的政策和方针传达到更广泛的外来务工党员群体中。

四、“同乡村”基层党建实践模式的提升方案

在流动人口规模庞大、治理挑战复杂的深圳，“同乡村”基层党建模式通过数字赋能、能力提升、制度创新三大路径，构建了“智慧化治理、专业化队伍、协同化机制”的立体化治理体系，为破解流动党员管理难题提供了创新方案，也为全国超大城市基层党建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一)数字赋能：打造“党员智慧系统”，实现治理精准化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和人口流动日益频繁，流动党员的管理成为基层党建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之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破解这些难题提供了新思路。通过智能匹配组织关系、精准推送学习内容、构建“需求-供给”闭环机制，数字赋能流动党员党建，能够有效提升管理效能，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1. 智能匹配组织关系，破解“隐形党员”难题。流动党员由于工作、生活地点频繁变动，容易出现“组织找不到党员、党员找不到组织”的现象，导致部分党员长期游离于组织之外，成为“隐形党员”。数字技术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智能匹配，实现党员组织关系的动态管理。首先，建立党员信息数据库，实现动态更新，依托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整合公安、人社、民政等多部门数据，构建流动党员信息数据库。通过人脸识别、定位等技术，实时更新党员流动情况，确保党组织能精准掌握党员去向。其次，智能推荐属地党组织，实现“一键转接”，利用算法分析党员居住地、工作地及活动轨迹，智能推荐最适合的属地党组织。党员可通过手机APP提交组织关系转接申请，系统自动匹配接收党组织，实现“线上申请、智能审核、一键转接”，

减少人工操作环节，提高管理效率。再次，建立“云支部”，确保流动党员“不掉队”，对于暂时无法落实属地管理的流动党员，可依托数字平台建立“云支部”，通过线上会议、虚拟党小组等形式，确保流动党员能够正常参加组织生活，避免“失联”现象。

2. 自动推送学习内容，实现“千人千面”精准供给。流动党员的学习教育面临时间碎片化、学习内容单一、参与度不高等问题。数字技术可通过个性化推荐和智能互动，提升学习教育的针对性和吸引力。首先，基于党员画像，定制个性化学习方案。利用大数据分析党员的职业、年龄、兴趣偏好等特征，构建党员学习画像，智能推荐适合的学习内容。例如，对年轻党员推送短视频、互动答题等生动形式，对老年党员提供语音播报、大字版课程，确保学习内容易接受、易理解。其次，智能提醒与积分激励，提升学习积极性，结合党员空闲时间，通过APP、短信、微信等渠道推送学习提醒，并采用积分奖励、学习排行榜等方式激励党员主动参与。系统自动记录学习进度，对长期未参与的党员进行预警，确保学习全覆盖。再次，互动式学习，增强学习效果。引入AI虚拟讲师、在线讨论区、直播党课等互动形式，增强学习的趣味性和参与感。党员可随时提问、分享心得，系统自动整理热点问题，由党务工作者或AI助手进行解答，形成“学一问一答”闭环。

3. 精准对接服务需求，构建“需求-供给”闭环机制。流动党员在就业、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存在诸多实际困难，传统的服务模式往往难以精准对接需求。数字技术可搭建智能化服务平台，实现“党员点单、组织接单、社会资源配送”的闭环服务机制。首先，搭建“党员服务云平台”，畅通需求反馈渠道，开发流动党员专属小程序，设置“困难求助”“就业指导”“政策咨询”等模块，党员可随时提交需求，系统自动分类并转交相关部门或

社会组织处理，确保诉求“件件有回应”。其次，整合社会资源，提供精准帮扶，对接人社、工会、公益组织等资源，建立“党员服务资源库”。例如，针对失业党员，系统自动匹配招聘信息；针对随迁子女，推荐就近入学政策，实现“一对一”精准帮扶。再次，建立服务评价机制，优化供给质量，党员可对服务进行评分和反馈，系统根据满意度数据优化资源匹配策略，形成“需求采集-服务匹配-效果评估-持续优化”的闭环，确保服务真正落地见效。

(二)能力提升：实施“头雁培育计划”，锻造专业化治理队伍

在信息时代背景下，流动党员党建面临着诸多新挑战，实施“头雁培育计划”、锻造专业化治理队伍成为提升流动党员党建效能的关键举措。当前流动党员管理存在“三难”：组织覆盖难、教育管理难、作用发挥难。破解这些难题，关键在于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流动党员管理队伍。实施“头雁培育计划”，重点培育流动党员的互联网思维、政策协调能力和群众工作本领，提升流动党员管理效能。

1. 培育互联网思维，推动组织生活数字化转型。流动党员因工作地点不固定、流动性强等特点，传统的组织生活模式难以满足其需求，这种情况下培育流动党员“头雁”的互联网思维至关重要。通过开展互联网技能培训课程，使党员们熟悉各类数字化平台的操作，了解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在党建领域的应用前景。在此基础上，推动组织生活数字化转型。建立线上虚拟党支部平台，集党员信息管理、组织生活记录、学习资源共享等功能于一体。流动党员无论身处何地，只需通过网络连接，就能实时参与“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活动。以某建筑行业流动党员党支部为例，以往组织一次线下集中学习困难重重，自搭建线上平台后，党员们利用业余时间在线学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视频会议分享工作心得与体会，组织生活参与度显著提升。同

时，利用互联网的开放性与交互性，创新党组织生活形式。开展线上知识竞赛、红色文化虚拟展览等活动，增强流动党员的参与感与归属感。并且，借助数据分析功能，精准把握流动党员的学习需求与兴趣点，为其推送个性化的学习内容，实现组织生活从传统单一模式向多元化、智能化方向转变，确保流动党员在“流动”状态下仍能过好组织生活，强化党员意识与组织观念。

2. 强化政策协调能力，打通两地治理堵点。流动党员涉及流出地与流入地双重管理，两地政策差异易造成治理工作衔接不畅。实施“头雁培育计划”，需着重提升流动党员骨干的政策协调能力。一方面，组织流动党员深入学习两地的党建政策、人才政策以及社会服务相关政策法规。通过举办政策解读培训班、邀请两地政策制定者作专题报告等形式，使党员们清晰了解两地政策的异同点与适用范围，为其开展协调工作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搭建两地沟通协作平台，选派优秀的流动党员——“头雁”参与其中。他们可以作为信息传递的纽带，及时反馈流入地在党员教育管理、权益保障等方面遇到的问题与需求，同时向流出地传达当地的政策措施与发展规划。例如，在跨区域产业合作项目中，流动党员凭借对两地政策的熟悉，积极协调两地政府部门在税收优惠、项目审批等政策上的衔接，推动项目顺利落地，有效解决了因政策不一致导致的企业运营难题，保障流动党员的合法权益，促进两地在党建引领下的经济社会协同发展，打破治理壁垒，实现无缝对接。

3. 提升群众工作本领，培养基层治理“调解专家”。流动党员身处基层一线，与群众接触密切，提升其群众工作本领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凝聚社会力量意义重大。将流动党员培养成基层治理“调解专家”，需要多措并举。首先，开展群众工作方法培训，涵盖沟通技巧、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心理疏导等内容。邀请经验丰富的基层调解员、社区工作

者分享实战经验，让流动党员学习如何倾听群众诉求、如何运用恰当的语言与群众交流、如何做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其次，鼓励流动党员积极投身基层调解实践。在流入地社区、企业等场所，主动参与化解邻里纠纷、劳动争议等问题。以某流动党员集聚的工业园区为例，党员们组建调解服务队，针对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工资待遇、工作环境等矛盾，开展耐心细致的调解工作。他们利用自身熟悉双方情况的优势，找准矛盾症结，提出合理解决方案，使许多潜在冲突得以平息，成为基层治理中不可或缺的调解力量。最后，建立流动党员参与基层治理的激励机制。对在调解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党员给予表彰奖励，在党内评优、晋升等方面予以优先考虑，激发其工作积极性与主动性，使其在基层治理的舞台上充分发挥“头雁”作用，引领更多流动党员和群众共同参与到和谐社会建设中来。

（三）制度创新：建立“双向考核”机制，构建协同治理新格局

在流动党员党建领域，传统的单一管理与考核模式已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的形势需求。构建“双向考核”机制，成为推动流动党员党建工作的关键抓手。通过流入地考核服务成效、流出地考核管理质量以及党员评议组织效能三个维度，形成双向监督闭环，构建协同治理新格局，从而提升流动党员党建整体效能。

1. 流入地考核服务成效，压实属地管理责任。流入地作为流动党员工作和生活的场所，其对流动党员的服务成效直接关系到党员的归属感与党组织的凝聚力。建立流入地考核服务成效机制，要求流入地党组织明确自身职责，将流动党员纳入属地党员日常管理体系。具体而言，流入地党组织需建立健全流动党员信息台账，准确掌握党员数量、分布、就业情况等基本信息，确保底数清、情况明。同时，要积极开展组织活动，创新活动形式与内容，吸引流动党员主动参与。例如，定期举办

流动党员座谈会、技能培训、志愿服务等活动，满足流动党员的学习、交流与发展需求。并将这些活动的开展情况、党员参与度以及满意度作为考核的重要指标，通过定期检查、随机抽查以及党员满意度测评等方式进行评估。

压实属地管理责任还体现在保障流动党员的合法权益上。流入地党组织要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子女入学等方面为流动党员提供帮助与支持，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将服务成效与党组织的绩效挂钩，促使流入地党组织主动作为，切实承担起对流动党员的管理与服务职责，使流动党员在流入地感受到组织的温暖与关怀，增强他们对党组织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2. 流出地考核管理质量，强化源头治理效能。流出地作为流动党员的原籍地党组织，对党员的源头管理起着关键作用。强化流出地考核管理质量，有助于从源头上提升流动党员的整体素质与党建工作效能。流出地党组织应建立严格的党员教育培养机制，在党员发展环节，严格按照标准与程序选拔优秀人才，注重对入党积极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及培训，确保新发展的流动党员政治合格、素质过硬。同时，对已流出的党员，持续开展跟踪教育，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如线上学习平台、微信公众号等，推送党的理论知识、政策法规以及家乡发展动态，保持党员与家乡党组织的思想联系。

加强与流入地党组织的沟通协作是流出地考核管理质量的重要内容。流出地党组织需主动了解流动党员在流入地的思想、工作与生活情况，定期与流入地党组织交流信息，共同研究解决流动党员管理中遇到的问题。建立流出地党组织对流入地党组织的评价机制，对其配合管理的及时性、有效性进行评估，促使双方形成工作合力。通过考核流出地党组织在党员源头培养、跟踪教育以及沟通协作等方面的工作质量，强化其源头治理效能，确保流动党员在流出地与流入地之间实现无缝对接的管

理,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与纯洁性,为流动党员党建工作的整体推进奠定坚实基础。

3. 党员评议组织效能,形成双向监督闭环。党员评议组织效能是“双向考核”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赋予流动党员对两地党组织工作的评价权与监督权,形成双向监督闭环,促使党组织不断提升工作质量与服务水平。在评议内容上,涵盖党组织在组织活动开展、党员教育管理、服务保障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等多个方面。流动党员可以通过填写评议问卷、参与线上评议平台等方式,对流入地与流出地党组织的工作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提出意见与建议。党组织要高度重视党员评议结果,将其作为改进工作的重要依据。对评议中反映出的问题,要及时进行整改落实,向党员反馈整改情况,并将整改成效纳入下一轮考核与评议范围,形成持续改进的工作循环。通过党员评议组织效能,不仅增强了流动党员的主体意识与参与感,也使党组织的工作更加贴近党员需求,提升党建工作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深圳“同乡村”基层党建以数字技术为驱动、以人才培养为支撑、以制度创新为保障,实现了“管理精准化、服务精细化、治理现代化”,为新时代基层党建注入了“深圳智慧”。这一实践表明:唯有打破传统治理思维,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拥抱数字化变革,方能在流动社会中筑牢党的组织根基,为城市高质量发展凝聚磅礴力量。

参考文献:

[1] 孙祜.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同乡村”现象及其治理的研究[D].复旦大学,2011.

[2]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78.

[3] 曾小龙,胡武贤.多元化治理:破解“同乡村”管理难题的良方[J].求实,2008(01):55-57.

[4] 路云辉.深圳党建创新40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89.

[5] 唐娟.政治嵌入视角下的城市社区秩序建构——基于“同乡村”党组织建设的个案研究[J].社会发展研究,2017(03):114-134+224.

[6] 费孝通.乡土中国[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22:4.

[7] 张雷.中国城市基层党建报告[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9.

[8] 于红.关于流动党员问题的思考[J].求实,2007(08):20-23.

[9] 燕继荣,毛瑞福,张志原,等.从流入到融入:城市流动党员管理方式的转变——以浙江省在京流动党员管理为例[J].行政论坛,2024(01):142-150.

[10] 谢忠平.城市社区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创新[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

[11] 陈亮,李元.去“悬浮化”与有效治理:新时期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逻辑与类型学分析[J].探索,2018(06):109-115.

[12] 黄建宏,谭志军.以创新精神推进“同乡村”党建工作[J].党史文苑,2009(10):30-31+37.

[13] 郑寰,陶周颖.探索基于地域关系的流动党员管理模式[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2(09):54-57.

[14] 基层党组织工作创新100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67.

[15] 部工农.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基层党建新型组织形态研究[J].上海党史与党建,2022(01):80-85.

[16] 高歌.新媒体时代如何实现流动党员的有效管理[J].人民论坛,2018(16):170-171.

[17] 黄晓春.党建引领下的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创新[J].中国社会科学,2021(06):116-135+206-207.

[18] 曹海军.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J].政治学研究,2018(01):95-98.

责任编辑:丁春华

心理学视域下党校党性教育的创新路径探析

范玲霞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 浙江 宁波 315033)

摘要: 新时代, 党校党性教育面临着理论认同浅表化、价值共鸣疏离化、行为转换衰减化等困境, 亟须多学科协同创新党校党性教育。心理学作为研究人类心理与行为的科学, 为提升党校党性教育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从心理学视角, 可以分析当前党校党性教育存在的问题。运用心理学理论, 可以剖析党校党性教育问题产生的根源, 并据此构建“认知唤起—情感共鸣—行为固化”的整合性路径; 运用心理学理论, 可以设计双通道编码课程、运用团体动力机制创设情境化教学场景、依托正反馈系统建构长效评估体系等路径创新党校党性教育。

关键词: 心理学; 党校; 党性教育; 创新路径

中图分类号: D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072(2025)05-085-5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 要健全常态化培训特别是基本培训机制, 强化专业训练和实践锻炼, 全面提高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党性教育是基本培训的核心内容之一, 也是抓实基本培训的关键环节, 必须始终贯穿于党校教学的全过程。新时代背景下, 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 传统单一学科视角的局限性已难以回应党员干部日益多元化、复杂化的认知需求与心理动态, 党校党性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亟须深化和创新。有学者指出, 精神意识与行为之间存在一个中介环节, 即“心”, 无论是称之为精神、意识还是思想观念, 均需转化为一种“心”的形态, 以直接影响行为或实践行动。^[1]这一观点强调了心理转化在精神意识与行为塑造之间的中

介作用, 为心理学视域下党校党性教育的创新提供了重要启示。心理学通过对人类思维、情感和行为的系统研究, 揭示了个体在信息加工、价值认同和行为决策过程中的内在规律。^[2]在党校党性教育中, 这些规律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精准地把握党员干部的认知特点、情感需求和行为动机, 从而设计出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教育方案与方法, 为促进党校党性教育“入脑入心”“刻骨铭心”提供理论视角和实践路径。

心理学视域下党性教育的创新路径具有学理上的合理性与方法论上的可能性。首先, 合理性在于党性教育本质上是对党员干部内心世界的深刻塑造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党性教育是共产

基金项目: 浙江省党校系统社会科学联合会规划课题“以德拒腐视角下廉洁教育助推‘不想腐’的机制与路径研究”(ND24063)。

作者简介: 范玲霞, 心理学博士,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讲师, 研究方向: 社会心理学。

党人的‘心学’，是党员正心修身的必修课。”^[3]党性修养的提升本质上是一个涉及个体认知内化、情感共鸣、价值认同与行为转化的复杂心理构建过程。心理学作为一门系统研究人类心理活动及其规律的科学，其关于认知发展、情感驱动、动机激发、行为塑造等方面的成熟理论框架和实证研究成果，为分析党性教育内在过程的运行机制、揭示党性教育困境的深层根源等提供了重要工具。其次，心理学研究范式具有适配性和解释力。认知心理学能够精准解析理论知识如何从符号记忆走向深度理解与价值内化；社会心理学深刻阐释了组织归属感、忠诚度等高级情感联结的形成机制与强化路径；行为心理学则为理解知识如何转化为能力、信念如何外化为稳定的行为习惯、如何克服行为消退以及建立长效维持机制提供了严谨的科学依据和可操作的干预路径。再次，心理学与党性教育蕴含着深刻的内在的逻辑契合。党性教育的终极目标是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有效引导党员干部的认知发展、情感培育、意志锤炼和行为养成，即需要心理学研究的核心领域的支持。而且心理学对个体潜能激发、积极心理品质培育、有效行为模式建立以及组织效能提升的探索也与党性教育致力于提升党员干部政治素养、道德情操、履职能力的目标高度契合。

因此，通过探讨心理学视域下党校党性教育的困境及其根源，厘清社会认知理论、价值认同理论和行为主义学习等心理学理论在党性教育场域中的嵌入逻辑，构建契合党员干部心理规律的党性教育路径非常必要。心理学将推动党性教育从单向灌输向双向互动转变，从单纯的理论认知向价值内化与行为塑造转化，实现党性教育的质性跃迁，推动新时代党校党性教育走深走实。

一、心理学视域下党校党性教育的困境分析

（一）认知悬浮：理论认同的浅表化困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政治上的坚定、党性上

的坚定都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4]加强对党性修养的理论认知是党性教育最常见方法，是党性教育的基本内容。当前，党校党性教育面临“认知悬浮”困境，表现为党员对理论的认识停留于表层符号，难以深化为价值认同。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其一，教学方式创新不足。教学方式过度依赖单向灌输式讲授，学员主要依赖机械记忆接受理论，理论认知停留在“符号记忆”层面，参与度低导致对理论内核与意义联结理解不足，引发“概念空转”。其二，教学内容与实践脱节。部分课程内容陈旧单一，理论联系实际不够紧密，偏重知识讲解，缺乏鲜活案例与实践环节，学员难以将所学应用于工作实际，致使认知停留于浅层。其三，考核评价设置简单。党性修养是涉及思想、政治、道德、纪律等多维度的复杂内在提升过程。现有考核多是通过活动参与度、书面测试等外在指标进行，存在“重数量轻深度”的问题，精准评估领域难以取得实质性进步，评估无法有效驱动认知深度内化与认同真正形成。

（二）情感脱嵌：价值共鸣的疏离化困境

党性修养落细、落小、落实需要经历由“知”到“情”再到“行”的转化过程，其中情感认同是关键。^[5]当前党校党性教育存在“情感脱嵌”困境，表现为学员情感共鸣缺失、组织凝聚力弱化。一方面，教育模式缺乏针对性。不同层级干部在职业发展、知识经验、心理需求等方面差异显著，但现有课程普遍缺乏分层分类设计，针对性弱，难以有效激发干部内生学习动力与情感共鸣，影响党性教育实效。另一方面，情感互动设计匮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理论宣传上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照本宣科、不求甚解、浮在面上的多，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入脑入心的少。”^[6]实践中，党性教育课程设置缺乏情感体验环节，学员交流常限于文件宣读、理论复述；在党性教育中学员缺乏深度的情感交流与思想碰撞，难以形成积极的学习氛围，阻碍了党员对党组织认同感、忠诚度与热爱情

感的有效激发。

（三）知行断裂：行为转换的衰减化困境

党性修养的最终目标是将坚定的理想信念转化为服务人民、推动发展的自觉实践，实现“知、情、意、行”的有机统一。^[7]然而，当前普遍存在“知行断裂”困境，即学员在培训中建立的认知认同与行动承诺难以有效转化为持续稳定的实践行为，表现为“课堂感动、课后不动”或“表态积极、行动迟缓”。其一，行为能力培训缺位。教育侧重于理论灌输与信念强化，缺乏将政治觉悟转化为具体工作能力的系统培训。学员知晓“应然”，却缺乏“实然”的指导，导致理论与实践脱节。其二，行为强化机制缺失。理想化、高激励培训场景与高压、复杂性的实际工作场域存在显著差异。培训激发的担当意愿返岗后因缺乏持续的强化机制，易被现实压力消解。其三，组织生态协同不足。教育多聚焦个体层面，未充分嵌入组织行为系统进行协同设计。学员的实践创新常因部门壁垒、考核导向偏差或领导支持不足而受阻，产生“孤勇者困境”。

二、心理学视域下党校党性教育困境的根源探析

（一）认知悬浮根源：认知发展阶段关照缺位

党性教育理论认同浅表化困境的根源在于未充分遵循个体认知发展的阶段性规律。认知心理学指出，认知深化需经“浅—深”“表—里”过程，需依赖多样化教学与丰富内容满足不同阶段需求。^[2]传统讲授主要激活学员的分析性认知系统，负责逻辑推理；而直觉性认知系统，负责自动化、体验性信息处理。两个认知系统未能同步构建使得理论认知停留于概念记忆、缺乏情绪记忆，这导致学员对理论知识的掌握停留在表面，缺乏深层次的理解和内化。因此，党校党性教育应注重两个认知系统的协同发展，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丰富的教学内容，同时激活分析性认知系统和直觉性认知系统。例如，采用案例分析、情境模拟、互动研讨等教学

方式，让学员在实践中体验和感悟理论知识，促进直觉性认知系统的构建。结合理论讲解与实际操作，帮助学员将抽象的理论转化为具体的行为准则，实现从概念记忆到深度理解和行为内化的转变。同时，评估方式也应多元化，不仅关注学员的理论知识掌握情况，还要通过内隐观调查、自我反思、行为观察等方式，全面考察学员在党性修养过程中的心理发展和认知内化状况。

（二）情感脱嵌根源：需要层次与价值认同理论适配不足

党校党性教育中价值共鸣疏离化困境根源在于教育目标体系设置未能考虑个体心理需求的层次性差异、未能遵循价值认同形成的客观规律。依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个体需求随着职业和生命阶段动态分层演进。党性教育作为塑造政治灵魂的核心过程，其目标路径必须回应此层次性。因此，党性教育应秉持分层分类的基本原则，精准回应不同干部的核心需求。例如，年轻干部处于职业发展初期，核心需求集中于系统认知党的理论宗旨，实现组织融入与归属感。教育目标应侧重夯实理论根基、强化身份认同与情感联结，重在解决“知党”与“爱党”的问题。中年干部处于职业发展成熟期，需求聚焦于社会价值实现、责任担当与自我价值实现。教育目标应侧重促进价值深度内化与认同，重在解决“信党”与“为党”的问题。价值认同理论表明情感共鸣是连接理性认知与自觉实践的桥梁，^[8]强调个体在理解组织价值（认知）的基础上，通过深厚的情感体验和积极的情感互动，产生对组织价值的喜爱、尊崇、自豪等正向情感联结，从而为最终的价值内化和行为转化奠定坚实的心理基础。

（三）知行断裂根源：行为消退与强化理论应用薄弱

党校党性教育行为转换衰减化困境的根源在于党性教育过程设计未充分尊重个体行为发生与维持的心理规律。根据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消退理

论”，行为改变具有阶段性特征，可分为无行为改变打算阶段、行动阶段和维持阶段；在维持阶段，缺乏持续强化的行为会逐渐消退。^[9]因此，党性教育需从单一信念培育转向行为全链条赋能，秉持分阶段培训的基本原则，建立全过程跟踪评价机制。例如，在无行为改变打算阶段，党性教育目标侧重于激发学员的党性修养意识，让学员认识到提高党性修养、自觉践行党性理论的必要性；在行动阶段，教育目标侧重于提供具体党性行为的指导和支持，通过实践环节和行为训练，帮助学员形成新的党性行为习惯；在维持阶段，教育目标侧重于巩固党性行为提升效果，通过持续的激励和反馈机制，确保党性行为提升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党性行为的维持不仅需要内在动机，还需要外部环境的支持。因此，党校党性教育应注重积极的组织氛围和良好的工作环境创建，为干部的党性行为改变提供保障。

三、心理学视域下党校党性教育的创新路径构建

（一）认知重构的“双通道激活”实践路径

为有效提升党校党性教育的质量，解决传统教育模式中理论认知“浅表化”的问题，我们提出基于双系统加工理论的党性教育策略，即通过激活分析性系统与直觉性系统，促进党员对理论知识的深度理解和内化。首先，设计双通道编码课程。针对分析性系统，采用“问题链教学法”，围绕重大理论命题设置阶梯式问题，引导学员进行深度思考。例如，围绕“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一命题，设计逻辑严谨的递进式问题链，从历史维度、理论维度到现实维度逐步展开。学员通过文献精读、结构化辩论等方式，深入剖析问题，形成系统化的理论认知。针对直觉性系统，开发“政治叙事数据库”，遴选改革开放先锋、脱贫攻坚典型等生涯关键事件，通过情景短剧、纪录片口述等方式呈现，触发学员的经验共鸣。例如，通过讲述“当我面对利益诱惑时”的抉择叙事，让学员在情感上产生共鸣，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党性要求。其次，优化认知图式。

探索运用“党性认知地图”，将抽象理论转化为可视化关系网络，并标注现实案例锚点。例如，将“人民至上”这一抽象理论转化为可视化网络，标记突发应急事件中的党员突击队等现实案例，帮助学员直观理解理论与实践的关联。这种方法能够有效优化学员的认知图式，提升其对理论知识的整体把握能力。最后，构建分层评估体系。编制《党性教育认知深度》量表，从理论理解、实践应用、情感联结等维度，全面评估学员的认知深度。通过多维度的评估体系精准识别学员在党性教育中的认知水平，为后续教学提供科学依据。通过以上策略，有效激活双系统加工机制，促进党员对理论知识的深度理解和内化，解决认知“表层化”问题，推动党性教育高质量发展。

（二）情感唤醒的“精准赋能”实践路径

在党校党性教育中，情感唤醒是激发党员内在动力、提升教育实效的关键环节。“精准赋能”的实践路径通过分层、技术、场域三个维度，实现情感唤醒的精准化与高效化，推动党性教育从认知层面深入到情感层面，进而促进党员的情感认同与行为转化。首先，分层精准赋能。面向年轻干部，构建“组织融入体系”，通过红色家书共创展演、主题演讲分享、线上学习社群等形式，深化其归属感、尊重感与认知提升。面向中年干部，推出“使命强化计划”，组织领衔重大课题研究、指导撰写特定历史时期回忆录、在革命旧址主持专题民主生活会等活动，促进其自我实现与价值认同的内化。其次，技术精准赋能。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现代技术为党性教育提供了新的手段和方法。通过技术精准赋能，能够增强情感唤醒的直观性和针对性。采用生理反馈监测设备与虚拟现实技术实时监测学员情感生理反应，提供沉浸式情境体验，增强情感唤醒的直观性与针对性。最后，场域精准赋能。党性教育的场域不仅是物理空间，更是情感交流与互动的平台。通过场域精准赋能，能够激发群体情感能量，

形成持续的情感激励。运用团体动力学原理构建党性教育场域，精心设计教育情境，激发群体情感能量。例如，打造“政治生日沉浸式体验”，通过仪式唤醒—情感共鸣—榜样示范三级强化机制，形成持续的情感激励，促进教育效果的巩固与深化。

（三）行为塑造的“全周期强化”实践路径

为有效促进党性修养从认知内化到行为外化再到习惯固化的深层次转变，可尝试构建“培训—转化—维持”的全周期行为强化系统。首先，培训阶段聚焦于党性修养意识的深度激活。通过高仿真情境模拟、典型案例深度剖析及结构化行为预演等精准化教学手段，引导学员深刻体认提升党性修养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紧迫性，明晰党性原则内化为思想自觉、外化为行动自觉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要求，为后续的实质性行为转变奠定坚实的认知与情感基础。其次，转化阶段着力于党性认知向稳定行为模式的转化。通过设计结构化实践环节、针对性行为强化训练以及跨单位“党性践履结对”协同共进机制，为学员提供具体、可操作的党性行为指引与持续支持。该阶段旨在弥合知与行的鸿沟，引导学员在真实的组织情境与实践挑战中反复锤炼，逐步克服行为惯性，实现党性要求的知行合一，促进党性修养由认知层面向稳定、自觉的行动层面转化。最后，维持阶段着眼于巩固行为转化成果并实现长效化。建立健全多维激励与动态反馈机制，依托数字化智能监测平台对学员的党性践履表现进行持续性跟踪与精准画像。通过及时的组织激励、同伴认可与个性化建设性反馈，不断强化正向行为，防止行为退化，将培训成效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实现党性行为提升的稳定性、持久性与自我驱动性，最终助力学员将党性要求内化为品格、外化为习惯。

结语

新时代党校党性教育呈现出的认知悬浮、情感脱嵌、知行断裂困境的根源在于对个体心理行为规

律把握不足。心理学的深度嵌入，将党性教育建立在理解党员心理活动规律的基础之上，促进党性教育实效性提升。心理学嵌入党性教育不仅不会弱化党性教育的政治性、原则性，还有助于触及党员灵魂深处、激发内源性动力，有助于将党的要求转化为党员内在的信念、稳定的品质和自觉的行动，有助于培养造就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的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

参考文献：

- [1] 陈艳波, 祝浩涵. 以共产党人“心学”写好党性教育的大文章——《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出版[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4-11-27 (A08).
- [2] 彭聃龄. 普通心理学: 第五版[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6-9.
- [3] 习近平. 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 求是, 2016 (09): 3-13.
- [4] 李凤. “三严三实”视域下构建党性教育新常态的实践路径[J]. 人民论坛, 2016 (14): 56-58.
- [5] 李建华. 情感认同与价值观认同[N]. 光明日报, 2018-05-28 (14).
- [6] 习近平. 在中央党校建校90周年庆祝大会暨202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J]. 求是, 2023 (10): 4-13.
- [7] 薛伟江. 在党性洗礼中坚守初心[N]. 光明日报, 2019-02-28 (05).
- [8] 胡建, 刘惠.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建构的阶段性分析[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7 (08): 67-70.
- [9] John. B. Watson. 行为主义[M]. 李维,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58-62.

责任编辑：丁春华

网络培训赋能县级党校抓实基本培训的逻辑、不足与提升路径

张华清

(中共清流县委党校, 福建 清流 365300)

摘要: 基本培训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着眼全局对提高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作出的重要部署, 是实现全员培训、全面覆盖、全周期实施的关键之举, 契合党校高质量开展教育培训、高水平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网络培训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新质方式, 能够赋能县级党校抓实基本培训: 有效扩大基本培训的受训覆盖面, 有效提升基本培训的供需匹配度, 有效解决基本培训的工学矛盾问题, 有效提高基本培训的教学管理水平。当前网络培训赋能县级党校基本培训仍面临信息化基建存差距、资源获取较单一、组织管理待提升、师资力量难保障等不足。为此, 要加大县级党校智慧校园建设力度、推动优质培训资源有效整合、加强网络培训组织管理工作、切实提升网络培训实际成效。

关键词: 基本培训; 网络培训; 县级党校; 组织管理; 干部教育

中图分类号: D261.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072(2025)05-090-6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健全常态化培训特别是基本培训机制”^[1], 这是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对加强干部教育培训作出的重大部署。2025年8月, 中共中央印发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明确要求开展好基本培训, 持续提升各级党校(行政学院)教育培训质量。“基本培训是指在干部教育培训中具有基础性、主体性、牵引性的培训任务, 是教育培训机构尤其是党校(行政学院)最重要的、必须要完成的任务。”基本培训要求实现全员培训、全面覆盖、全周期实施, 实现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宏观结构与微观质量的优化与提升, 即要形成能够覆盖和满足各层级干部的整体需求的培训结构, 以及促

进培训内容、方式、学制、周期等关键要素融合贯通、优化配置, 包括健全调训机制、合理设置培训班次、优化培训供给、丰富培训内容、提高培训实效等。

网络培训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而发展, 是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提高人的素质能力的教育培训方式, 极大丰富教育的形式和内容, 普遍运用于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大学教育、成人教育以及干部教育培训等。网络培训运用于干部教育培训是健全基本培训机制的必然要求。“干部网络培训是指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开展的干部教育培训活动。”相较于传统干部教育培训形式, 干部网络培训具有网络化、数据化、移动化、多元化、个性化、普惠

作者简介: 张华清, 中共清流县委党校讲师、教务室主任, 研究方向: 公共管理、经济管理、党校教育。

化、便捷化等优势特点，是新的教育培训形式。《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以法规的形式把网络培训明确为干部教育培训的方式之一，要求建立兼容、开放、共享、规范的干部网络培训体系。^[2]网络培训对健全高效的基本培训机制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对县级党校抓实基本培训具有赋能作用。网络培训其网络化、普惠化、开放性等特点有助于实现基本培训的全员培训、全面覆盖，其多元化、个性化等特点有助于实现基本培训的供需匹配和质效提升，其数据化等特点有助于实现基本培训的资源优化与管理保障。

一、网络培训赋能县级党校基本培训的逻辑理路

对标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共中央党校联合下发的文件《关于规范地方党校（行政学院）基本培训班次和课程设置的通知》中关于基本培训班次设置、内容供给、培训实效等方面的要求，网络培训在干部教育培训的实践中对县级党校抓实基本培训具有以下赋能作用。

（一）网络培训能有效扩大县级党校基本培训的受训覆盖面

基本培训要求全员覆盖、应训尽训。就实现培训全员覆盖而言，县级党校是落实基本培训的主阵地，面对的培训对象众多。县级党校基本培训的对象包括乡科级领导干部、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中青年干部和相关职级公务员，基层党组织书记、村（居）委会主任、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基层党员等。而县级党校在师资力量、培训容量等软硬件方面都存在短板，例如，县级党校专业师资人数较少，以福建省三明市清流县委党校为例，现有人员编制14人，其中教师9人，且教师既承担教学科研任务，又兼任学员管理工作，有些教师还承担部分行政工作，这也是三明市域内各县（市、区）委党校面临的共同问题。师资力量较弱是制约县级党校基本培训开班数量、培训规模的重要因素。

而干部网络培训具有网络化、移动化、跨时空等特点，突破了干部教育培训的时空限制。县级党校可以通过举办网络专题培训班、组织学员在线自学、利用上级党校直播教学等方式，有效弥补县级党校师资力量、教学设施容量等不足的短板，有助于实现基本培训的全面覆盖。

（二）网络培训能有效提升县级党校基本培训的供需匹配度

基本培训要求坚持“分类培训，按需培训”原则。按需培训，就是要根据不同类别、不同层级、不同岗位干部的特殊需要来合理设置培训班次、教学内容、培训时长等，增强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培训效果，重点要找准组织需求、岗位需求、干部需求的结合点，统筹推进领导干部和党员基本培训体系化。县级党校由于学科建设不完善、优质理论课程不足等原因，往往班次设置、教学课程安排针对性不足，不论类别、层次、年龄或经历的差异而采取“一锅煮”“大杂烩”的培训方式，不能根据培训对象精选专题，难以满足不同干部的培训需求。

而网络培训平台可以有效整合干部教育培训资源，教学内容丰富，专题设置齐全，为干部学习提供海量课程资源。事实上，全国自上而下已建立庞大的干部网络培训平台。2012年，中央组织部开通中国干部网络学院。目前，绝大部分省区市也已经开通了干部网络培训平台；大部分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中管金融企业、中管企业和中管高校也广泛开展了干部网络培训，逐步形成规模化的网络培训格局。网络培训的大规模运用，以及中央及省市级网络培训平台资源对基层的开放，为县级党校网络培训筑牢坚实的保障。从福建干部网络学院来看^[3]，该平台教学课程达到10425个（数据统计截至2025年1月），内容丰富且多元，设置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经典著作导学、领导艺术、案例启示及福建省情系列课程等多个专栏。福建省各县级党校通过在福建干

部网络学院申请网络专题班次，选择合适的培训课程，满足不同类别、不同层级、不同岗位、不同年龄、不同兴趣爱好的干部对培训内容的多样化需求，提升县级党校基本培训的供需匹配度。

（三）网络培训能有效解决县级党校基本培训的工学矛盾问题

受时间、场地限制，县级党校集中培训学员往往不能做到全脱产，工学矛盾较大，请假问题较突出，客观存在干部调训难、培训任务落实难等问题，影响培训效果。而网络培训学习方式灵活，能够分散、自主学习，克服集中培训和脱产培训的一些局限，尤其是一些网络培训平台推出移动学习APP，干部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学习，有效缓解了工作和学习之间的矛盾。

（四）网络培训能有效提高县级党校基本培训的教学管理水平

县级党校办学经费普遍紧张，培训支出成为地方财政一项比较大的开支。如何使有限的培训资金发挥最大的作用是目前县级党校开展基本培训亟待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而网络培训具有开放性、普惠性等特点，是较为经济的教育培训形式，可以在总投入不变的情况下扩大干部教育培训的办学规模。同时，依托干部网络培训平台，县级党校可以实现对干部教育培训的规范化、信息化管理，降低教学管理成本，达到低成本投入、高效益产出的规模效应。

二、网络培训赋能县级党校基本培训存在的不足

清流县委党校近年来主动适应干部教育培训信息化发展要求，在创新运用网络培训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每年举办1~2期的网络培训班次，组织干部参加网络平台在线学习，运用直播教学等，对推动基本培训有一定成效。但是，在技术设施、课程资源、教学管理、师资保障等方面，网络培训赋能县级党校基本培训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信息化基建存差距

网络培训对技术设备要求较高，需要配备专用网络、高清设备以及专业的技术人才。但是，县级党校在这些方面普遍存在不足。

1. 智慧校园建设滞后。如清流县委党校年办学经费在50万元左右，办学经费较为紧张导致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及硬件设备更新不足。网络培训特别是视频直播培训，必须保障直播培训过程中不出现断网、卡顿等现象，需要配备专门用于网络培训的视频会议室、实训室等功能教室。清流县委党校在这些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不足影响了网络教学的开展。

2. 专业技术人才不足。开展网络培训需要网络信息技术专业人才：需要熟练掌握网络设备调试、维护、使用的专业人才；需要视频课件的制作使用、上传、分享的专业人才；需要掌握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专业人才。清流县委党校机构编制三定方案只有办公室、教务室、外培室三个内设科室，缺少相应的职能保障科室，擅长网络设备维护与使用的技术人员较少。

（二）资源获取较单一

县级党校网络课程一般来源于上级党校网络培训平台及中国干部网络学院等，尽管目前网络培训平台设置有丰富的学习资源，但优质课程资源仍然较为匮乏，主要表现为：

1. 地方特色课程少。网络培训平台的课程主要是引进购买的课程，主要是公共课，基层自主开发和推送的课程较少，尤其是结合地方基层实践的特色课程少。以福建干部网络学院为例，虽然设置了福建省情系列课程专栏，但该专栏视频课程只有97个，占比仅为0.93%，有关三明地方特色课程则更少。

2. 网络培训资源存在“孤岛”现象。由于管理体制或技术壁垒等原因，不同地区、不同省市、不同部委的网络培训平台存在不兼容、不共享等问

题，各地课程资源成为资源“孤岛”。县级党校总体网络课程资源获取渠道单一，尤其是优质课程资源数量仍然偏少，难以满足基层干部培训需求。

（三）组织管理待提升

在干部网络培训中，党校教师、学员、教务人员之间处于时空分离的状态，培训过程中的组织管理成为决定网络培训质量和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1. 约束激励机制不够完善。相较于传统课堂有课堂纪律、考勤纪律等约束，网络培训靠学习时长单一指标来衡量，很难对学员学习情况进行有效监督，即便有些网络培训、课程设置了答题、考试环节，但在网络开放的情形下，答题、考试无从监督，流于形式，学员是否认真完成培训课程，全凭自觉。以清流县为例，2017年开始，清流县要求公务员、部分事业副科级干部参加福建干部网络学院培训，完成规定学时，年完成率大多在60%~80%区间（见表1）。同时，对清流县干部参加网络培训进行的访谈情况显示，部分干部对网络培训存在消极应付心态，将网络培训当成任务来完成，存在挂网、代学的现象，难以达到组织需要的培训效果。

表1：2017-2024年清流县干部参加福建干部网络学院培训完成情况统计表（数据截至2024年12月）

年份	参加人数（人）	完成人数（人）	完成率
2017	1277	893	69.9
2018	1274	944	74.1
2019	1420	1011	71.2
2020	2119	1515	71.5
2021	2105	1622	77.1
2022	1906	1665	87.4
2023	1873	1743	93.1
2024	1829	1828	99.9

注：2023年以来，清流县将干部网络培训学时完成情况纳入年度考核，完成率有所上升

2. 管理方式没有向数字化转变。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要求，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应当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教学、科研、管理和服务的数字化水平。清流县委党校教学管理数字化显然还有差距。首先，学员

调训没有实现数字化，基本培训要求干部培训实现全周期实施，这就需要干部在每个培训周期内参加培训班次、学时情况进行统计，避免漏训、重复培训等情况。但以清流县干部培训调训程序来看，组织部给各单位分配参训名额，再由各单位选送学员，党校组织培训。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建立学员选调数据库，很难做到有效的信息共享。其次，在组织网络培训过程中，对平台后台学员参训数据缺乏有效的统计、分析，未对学员网络培训情况进行监督、评价等。

（四）师资力量难保障

网络培训对教师教学能力提出更高要求，需要具备将课堂教学与网络教学相结合的能力。

1. 教师运用网络培训能力不足。部分教师擅长传统课堂教学方式，对如何运用好网络培训缺乏信心，对后台教学管理功能不会使用或者使用不娴熟，这些因素都影响县级党校网络培训的运用与效果。

2. 培训效果转化不足。在网络培训中，学员之间不能进行充分、有效的沟通交流和互相学习，学员与教师之间不能进行相关的反馈和讨论，教务人员不能对学员的学习过程和效果进行有效评价，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学员的学习积极性和自主性降低，培训质量下降，很难让所学知识固化并提升运用于实践，使网络培训仅仅成为完成培训任务的形式。

三、网络培训赋能县级党校基本培训的提升路径

针对县级党校干部网络培训存在的不足，必须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提升。

（一）加大县级党校智慧校园建设力度

干部教育培训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各级党委应加大对党校办学的保障力度，尤其是要顺应干部教育培训信息化发展的趋势，加大财政支出，保障县级党校网络

硬件基础设施建设。

1. 加大县级党校办学经费保障力度。提高党委办党校的意识，财政预算要充分考虑党校信息化建设经费，推动县级党校网络教学功能室、实训室等智慧硬件设施建设。

2. 强化人才保障。县级党校应重视网络培训赋能基本培训的重要作用，调整内设科室，成立专职网络培训工作的管理科室，强化人才支撑，加强网络信息技术人才储备，建设一支能够服务网络培训的保障队伍，推动教育培训工作数字化转型。

（二）推动优质培训资源有效整合

丰富的网络培训资源是县级党校开展网络培训的基础和支撑，必须充分运用好网络优质培训资源，注重资源有效整合。

1. 整合现有的课程资源。网络培训最核心的资源是师资与课程，必须充分利用中国干部网络学院、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网上党校及其他上级党校网络培训平台的优质师资与课程资源。要完善干部网络培训支持与服务体系，多渠道为干部注册网络培训平台学习账号，对干部开展网络学习进行辅导。要多组织教师网络听课、评课活动，以及对后台干部自学数据进行分析，筛选建立网络培训优质课程清单，形成符合县级党校实际需求的网络课程体系，加大优质网络课程资源在实体培训班的运用。

2. 加大网络培训平台的对接工作。要积极与各省市、各高等院校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对接联系，申请其网络培训平台资源赋能支持。如清华大学远程教育站，依托远程教育优势和继续教育专业能力，本着服务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为基层治理、乡村教育和产业等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的宗旨，已在全国各地建立的远程教学站覆盖500余个县区，累计培训超3000万人次（数据截至2024年11月）。^[4]县级党校尤其是乡村振兴重点县党校可以与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联系对接，争取相关资源，设立远程教育

站。再如，高等院校有丰富的在线教育资源，如MOOC、学堂在线等。运用好这些网络培训平台资源，可以进一步丰富县级党校网络课程体系。

3. 加大县级党校地方特色课程开发。鼓励县级党校教师以及具有丰富基层工作经验的领导专家等兼职教师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符合基层工作实际的优质网络课程，提升设计、编辑、制作水平，推荐至网络培训平台，丰富自主开发和基层推送课程。县级党校教师根据教学需求开发网络课程应计入教学工作量及作为职称评聘的重要指标。

（三）加强网络培训组织管理工作

网络培训组织管理包含办班前的培训需求研判、班次设定、课程安排；培训过程中的教学、纪律管理；培训后的培训效果测评、评价、分析、运用等环节。

1. 办班前：进一步完善干部调训机制。建立干部教育培训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干部培训信息精准记录、标准化管理，动态把握学员选调在类型、结构、数量、进度、学制等方面的科学要求，避免出现漏训或重复调训，确保基层各级各类干部在一个培训周期内有计划、有步骤、均衡地实现足额参训，实现基本培训的制度化和干部学习的整体性、连贯性、有效性。另一方面，加强培训需求研判，健全干部培训需求调研机制，合理设置网络培训专题班次，落实网络课程内容审批制度，推动县级党校网络培训标准化、规范化开展。

2. 培训中：健全监督、考核管理机制。网络培训由于学员参训的时间带有随机性、虚拟性，培训完成的进度主要由学员掌控，网络空间里的出勤率和考核考试结果都可能会与实际情况不一致。因此，干部网络培训的考核不应局限于已有的组织方式、评价机制，应更注重健全和完善培训考核的技术性和制度性建设，不断建立和完善网络培训管理、教育评价、监督反馈等制度。一方面，既要通过大数据、云技术跟踪检查学员参训进度情况，又

要通过在线视频、人脸认证、随机录像等直观视觉方式确保参训学员信息的真实一致；另一方面，可以采取线上培训、线下考试的办法，避免在线考试较易发生的替考、抄袭等作弊现象，提高考核结果的真实性。

3. 培训后：加强干部培训结果运用。将干部参加网络培训情况列入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对干部网络培训期间的学习成绩、学习记录、资源分享、交流互动等进行综合评价，并与干部选拔任用相结合，作为干部任职晋升等的重要依据之一。

（四）切实提升网络培训实际成效

干部网络培训赋能县级党校要注重切实提升网络培训的实效。

1. 提高教师运用网络培训的能力。信息化时代推动各行业数字化转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学网、懂网、用网，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5]“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6]作为党校教师要主动适应信息化要求，提高自身数字素养，创新网络教学的方法与路径。例如，党校教师可以探索引入AI生成图片、视频技术，针对一些具有实践性的课程建立虚拟场景，让学员沉浸于角色之中，应对相应的状况，完成应对策略，从而达到训练目的。

2. 树立数据应用思维。充分挖掘学员的学习数据，对干部在网络培训的学习行为、自选课程、学习成绩等数据进行分析决策，绘制可量化、可评价的干部“学习图谱”，以此来把握学员的特点与

需求，为进一步科学设置网络培训班次、精选网络课程提供依据，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3. 深化线上线下结合策略。线下深化模式是提升网络培训成效的有效方式。要创新运用线上线下相融合、直播录播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学员、教师间的互动交流，如开展线下知识答疑、分享与交流等，切实加强知识的应用、学习成果的转化。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EB/OL]. (2024-07-18) [2025-03-15]. 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24-07/21/c_1130182461.htm.
- [2] 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N]. 光明日报, 2023-10-16(01).
- [3] 福建干部网络学院[EB/OL]. (2025-1-13) [2025-03-15]. <https://www.fsa.gov.cn/index-page#/index-page>.
- [4] 宁夏盐池：召开清华大学远程教学站工作推进会[EB/OL]. (2024-11-20) [2025-03-15]. <https://mp.weixin.qq.com/s/E0bVEoea-BY1wungNs8zRw>.
- [5] 习近平在2022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讲话[EB/OL]. (2022-03-01) [2025-03-15]. https://www.ccps.gov.cn/zt/2022zqb/tpxw/202203/t20220303_153047.shtml.
- [6]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 人民日报, 2021-11-17(01).

责任编辑：魏璐珂

《福州党校学报》2026 年征稿启事

《福州党校学报》是由中共福州市委主管、中共福州市委党校主办的社科类综合性期刊。2026 年本刊辟有新时代新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研究、党的建设、治理研究、经济研究、法学研究、社会与文化研究、党校教育研究、福州发展研究等栏目。2026 年本刊重点选题如下：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2. 习近平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
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研究
4. 党的全面建设研究
5. 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研究
6. 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研究
7.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研究
8.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研究
9. 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研究
10. 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研究
11. 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研究
12.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研究
13. 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研究
14. 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研究
15.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研究
16. 人工智能及其社会化应用研究
17.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福州的孕育与实践研究
18. 福州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路径研究
19. 榕台两岸融合发展研究
20. 福州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欢迎广大读者、作者来稿，来稿要求如下：

1. 来稿内容包括：题名、作者姓名、工作单位、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作者简介。另附题名的英译。如属基金项目成果，应在篇首地脚标注项目名称和编号。
2. 题名应简明、具体、恰当，一般不超过 20 个汉字，必要时可加副题名；摘要一般不超过 300 字；关键词选取 3-5 个能反映文章主题内容的词或词组。
3. 作者简介主要包括姓名、单位、职务、职称、学位和研究方向。在论文末尾注明：单位详细地址、邮编、电子邮箱、联系电话。
4. 正文一般以 8000-12000 字为宜。
5. 参考文献按引文先后在文中标出序号，并与文后参考文献序号一致。
6. 来稿请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本刊电子邮箱：fzdxxb@163.com。作者来稿文责自负，请勿一稿多投；本刊不以任何形式向作者收取审稿费、版面费等。
7. 本刊有权对采用的稿件作适当编辑删改，作者若不同意删改请在稿件上注明。稿件自寄出或发送 2 个月内未收到用稿通知；作者可另行处理，来稿一律不退。

《福州党校学报》编辑部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
生态宜居 产业兴旺 乡风文明

